

甘肅史志



2012.2

甘肅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



5月18日上午，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李虎一行赴甘肃政法学院，向该校图书馆捐赠省志图书34卷、36册。学院党委书记宋秉武代表学校向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颁发了收藏证并讲话。他指出，捐赠图书丰富了学校图书馆馆藏资源，方便了学子了解省情，有助于历史文化传承。要以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鼎力相助为动力，不断积累办学实力和形成办学特色，加快学校发展。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李虎在讲话中指出，地方志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20多年的发展，甘肃省的地方志工作已由起步时的单纯编纂志书发展成为以编纂志书为重点，编辑年鉴、编写地情资料、整理旧志文献、史志资料开发利用和史志信息化建设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地方志事业。他希望通过图书捐赠活动不断加强校地之间的交流合作，共享知识财富。



图书捐赠仪式暨车安宁学术报告会在甘肃联合大学举行。

5月14日下午，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车安宁一行赴甘肃联合大学，向该校图书馆捐赠了甘肃各地方的史志及个人著作40余种近200册，并作学术报告。甘肃联合大学田建中副校长代表学校向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颁发了捐赠证书。

此道不一般

张 慧

回望昨天、昨天的全部鼎盛与衰落、喧嚣与沉寂、显赫与平淡，经无数年月春风夏雨秋霜冬雪或温柔或凌厉的袭掠之后，呈现给现代人的，是一部厚重古朴的线装的典籍，是一座斑驳却又辉煌的古城堡。每一个读到这部宝典和登临这座古城堡的人都应该被这种来自远古的奇伟和庄美折服，如果说这样绝妙的手笔和恢宏的构建都不能使你心旌摇荡，那么你就应该对着冥冥中沉睡的祖先默默祈祷，许能得到列祖列宗的原宥。伟大的先贤不是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吗？

历史就是这样，它向后人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古拙而又新奇，直白而又神秘，浅显而又深邃的文化现象。翻开历史，我们仿佛听得见先祖穴居的洞窟中传出的呻吟和欢歌，看得见古人鏖战的疆场上升起的旌旗和烟尘。我时常敬仰着那些记述历史的人，司马迁、左丘明、班固、范曄……这些名字与五千年文明史一样伟岸和辉煌。我也时常感佩着那些为保留历史付出智慧和心血的人，周之天府，汉之兰台，唐之史馆，宋元之架阁库，明清之内阁大库，在这些皇家的恢弘殿阁中，多少人皓首穷经，焚膏继晷，埋头做着整理、誊录、修正工作。而他们的名字，往往被浩瀚的史册湮没，不留下一丝痕迹。正是有这样不计功利的劳作，拉近了今天与昨天的距离，消融了今人与古人的疏离。那山顶洞人燃起的篝火，匈奴强胡摆下的战阵；秦时明月汉时雄关，大漠孤烟燕山飞雪；去国怀乡、投身汨罗的屈原，不辞辛劳、舍身求法的玄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不就活灵活现、真正切切的呈现在我们这些后来人的眼前吗？

史册已然陈旧，先贤无奈故去，然而兰台续代巍峨，文脉历世不绝。人们不仅应该记住那些创造历史和记录历史的人，还应该记住那些保留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并将历史原原本本奉献给今天和明天的人。夜色沉静的时刻，我阅读着厚重的历史典籍，总想起那些毕生为兰台事业耗尽心血的无名氏们。仰仗他们的精心保护，我们才得以在数千年之后看见先祖跋涉的足

迹，嗅见先祖亲切的气息。如若舍弃了这些无名英雄的悉心守望，时间的腥风血雨早不把这样辉煌的往昔风化殆尽了？尘世的烟云流沙早不把那些雄奇的历史湮没无影了？我们的祖先纵然创下了多么伟大的业绩，这片土地纵然掀起过多么惊天动地的飓风，没有他们，今人面前还不是一片浩渺无垠的荒漠？

每每登临神圣的兰台，捧读那些留下古人墨香的典籍，我的思绪纵横驰骋，一无羁勒，心旷神怡。我总是把那些为了留存历史付出辛劳的人们视为神灵，在心中顶礼膜拜。是他们让那些陈旧的、苍白的事物变得年轻和鲜活起来，是他们拂去了蒙在历史天空的朦胧之气，使现代人得以透过时光的雾障解开一个个历史之谜。历史不再那样遥远那样神秘那样陌生，现代人得以穿越时空的阻碍与遥远的古人真诚对话，再次感受到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充溢的凛然豪气，寻回一个伟大民族一度失落了的精灵之气。

兰台自古就不是喧闹的所在，然而它的魅力无穷。一些人在兰台老去和死去，又有一些人走进兰台。也许这是现代社会最单调最寂寞的事业，却有人甘愿将青春、智慧乃至生命奉献给这项事业。外面的世界正精彩，它正以赤裸裸的绚烂诱惑十足地向现代人煽情，而无数兰台人却无悔地独守一份宁静与淡泊，任窗外花开花落，任天空云卷云舒，抱定一腔忠诚泰然处之。这是怎样一种飘逸和洒脱啊！诸葛先生有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哦，我终于明白：所有轰轰烈烈的事业并不都伟大，所有寂寞的事业并不都无价值；兰台人以其超越世俗的淡泊和宁静，延续着人类文明的精彩与辉煌。

这里其实是一方广阔无边的天地，说什么单调说什么孤寂说什么辛苦，他们承继古人的勤勉和诚实，固守清苦和清贫的兰台精神，在埋头苦千里品味为人作嫁的乐趣，自顾耕耘不问收获，追求的是一种至高至美至真的人生境界。

或问：兰台的事儿怎么样？

答曰：此道不一般呢！

信否？



甘肃史志

季刊

2012年第2期
(总第10期)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1—0098 号

卷首语

此道不一般 张 慧(1)

领导讲话

不断增强依法修志的能力
推动地方志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朱佳木(4)

特 载

江泽民总书记视察甘肃题词辑录 荷 重(12)
甘肃历代修志 车安宁(14)
台湾整理出版的甘肃旧方志简介 王立明(21)
数字甘肃(2011年) 滕 辉(24)

方志研究

浅论志书体例的创新 李升宝(25)
地方志应重视对寺庙的记述 陈启生(27)
地方志资源对城市经济建设的作用 张 兰(33)
当代地方志人物“教化”内容刍议 张 泓(37)
修志行文随笔(续) 张志纯(39)

篇目选登

永靖县志(1986—2005)篇目 (42)

史海钩沉

西路军在大靖组建 李发玉(48)
乞伏国仁建都勇士城 周学海(50)

录

为国藏书——文溯阁《四库全书》落户九州台
..... 张兴国(53)

史地考证

麦积山碑文石刻记载的“山史” 王立武(55)
西汉卤县濯水位置考 薛方昱(57)

历史回眸

甘肃民国大事记(1937—1940年) (60)

乡土民情

华池节日民俗 盖彩凤 姜琳娟(71)

陇原人物

碧血丹心,矢志不渝
——追述丁益三炼狱生活始末 张德馨(74)

转载

历史上的真相难觅 (76)

简讯

《白银市年鉴丛书(2010)》发行 (59)

嘉峪关市委书记郑亚军专题调研市地方志工作
..... (78)

天水市市县(区)综合年鉴编纂工作
多措并举、全面展开 (79)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 任:李 虎
副 主 任:车安宁 钱 旭
李振宇 孙奇明
编委委员:杨东海 李拾良
贺红梅 张正龙
石为怀

主 办 单 位:甘肃省地方志办公室

《甘肃史志》编辑部

主 编:李 虎
副 主 编:钱 旭
编辑部主任:贺红梅
责任编辑:梁兴明 陈 谦
孔令奇 石战涛
司德芳 高天成
王 旭

本 期 责 编:石战涛

联 系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
南路 51 号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8960622

电 子 邮 箱:g sdfz911@163.com

印 刷:甘肃省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电 话:0931-8960384

不断增强依法修志的能力 推动地方志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在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2012年4月19日)

朱佳木

一年一度的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今天在天下闻名的三峡大坝所在地湖北宜昌市召开了。首先，我代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陈奎元同志，向与会的各省、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军和武警部队方志办、领导同志表示亲切慰问，向应邀出席会议的湖北省、宜昌市的领导同志和为会议召开做出重要贡献的湖北省方志办全体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今年的方志办主任会议，是在全国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大背景下召开的。《决定》回顾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推动文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及其对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贡献，强调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强调必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提出文化改革发展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改革开放；要求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使之更好地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并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发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示范引导作用，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着力推出代表国家水准、具有世界影响、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优秀成果。《决定》中的这些重要精神，完全符合地方志工作的实际。这次全国方志办主任会议以及地方志工作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地方志系统全面深入地贯彻《决定》精神，用《决定》精神指导和推动地方志工作，把《决定》精神落到地方志工作的实处。

去年，地方志系统纪念了大规模新编地方志

工作开展 30 周年和《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 5 周年。30 年来,特别是近 5 年来,新编地方志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拓展了地方志编纂的内容,整理了大批历代旧志,产生了大量具有存史、资治、教化作用的志鉴成果;适应了时代要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取得了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显著成绩;开展了方志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创立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方志理论;加强了人员培训和机关建设,形成了老中青和专兼职相结合、具有良好作风的修志人队伍。所有这一切,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正确指导的结果,是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广大方志工作者辛勤劳动、团结奋斗的结果。对于这些,我们必须足够认识,充分肯定,无比珍惜。同时,我们又要清醒地看到,地方志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特别是在依法推动地方志工作方面还有欠缺。这些欠缺,既有体制机制等客观原因,也有地方志系统的主观原因;既有理论水平还不够高、工作作风还不够硬、实际工作抓得还不够紧的问题,也有执法能力还不够强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地方志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能力建设,特别是增强依法修志的能力。

自从 2006 年《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以来,新编地方志工作进入了依法修志的崭新阶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尤其值得一提的,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22 个省、市、自治区和 20 多个有立法权的市及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立法机关,制定了《条例》的实施办法或本地区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管理办法。但是,在工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时常困扰我们的实际问题。例如,有的地方至今没有地方志工作机构,有的虽然有机构牌子,但没有相应的人员、任务、经费;有的地方上下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级别一样;有的地方的地方志工作不能列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年度会议也列入不到省市政府的会议计划中;有的地方二轮修志进展缓慢,甚至首轮修志的任务都没有完成;有的地方二轮志书的书名不统一、上下限参差不齐;有

的地方对志书质量把关不严,审查验收中存在走过场的现象;有的地方在落实志书的著作权和署名权上存在问题;有的地方对志书编纂过程中收集的资料、形成的档案保管不善,没有完整移交档案馆或方志馆;有的地方综合年鉴至今仍然未能纳入地方志工作机构;有的地方重“修”轻“用”、轻“研”,数据库、网站建设进展迟缓,理论研究冷冷清清。其实,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所有这些问题,《条例》几乎都有法律条文给予了相应的规定。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深入学习、真正领会、切实掌握、大力宣传、充分运用。因此,我们一定要对《条例》进行再学习、再领会、再宣传、再贯彻,切实增强依法修志的能力。下面,我就这个问题讲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增强依法敦促地方政府负责人和有关部门履行修志职责的能力

《条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这些规定说明,各地各级政府有责任设立地方志工作机构,并且要给予该机构相应的级别、职责、编制、经费。现在,有的地方的县级以上政府中至今没有设立地方志工作机构;有的虽然设有与其他机构合署办公的机构,但只挂了一块牌子,实际上并没有人负责;有的机构在设置上不尽合理,关系没有完全理顺,给工作开展带来种种不便。这些都是不符合《条例》精神的,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向这些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和有关部门,以及向他们的上级积极宣讲《条例》,促使这些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二、增强地方志工作机构依法履行职责的能力

《条例》明确规定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履行五个职责:第一,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第二,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第三,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第四,搜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组织整理旧志,推动方志理论研究;第五,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现在,有的

地方把地方志工作机构仅仅当成修志的单位,对组织、指导、督促、检查有关部门和下级机构的工作重视不够,在旧志整理、理论研究、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等方面,很少下功夫。尤其有的地方综合年鉴,至今没有划归到地方志工作部门。我们只要认真看看《条例》就会发现,《条例》不仅把组织编纂地方综合年鉴规定为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责之一,而且《条例》所讲的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条例》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志书与年鉴都是记述一定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方面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因此,有关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全面履行《条例》赋予的职责,并通过贯彻《条例》,促进地方政府将综合年鉴的编纂部门划入地方志工作机构中。

三、增强依法制定规划与规划备案的能力

《条例》明确规定:省级政府要制定本行政区域地方志编纂的总体工作规划,并要报国家地方志工作指导机构备案。为此,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2007年制定了建立地方志书编纂规划的备案制度,规定了规划的具体内容和备案的具体要求,要求规划包括指导思想、篇目体例、目标、主要任务、分工、完成时间和实施办法等,上报备案时要附《地方志书编纂规划汇总表》,规划如有调整要及时上报备案。现在有的地方规划制定不及时,规划要素不齐全,规划备案不主动,规划调整不备案。像这类问题,也需要依靠进一步贯彻《条例》精神来加以解决。

四、增强依法统一修志时限和志书上下限的能力

《条例》明确规定:“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每一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完成后,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搜集资料以及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启动新一轮地方志书的续修工作。”这个规定起码说明了以下三点:

首先,地方志书的编纂不是一次性、临时性工作,而是要世代代、连绵不断进行的长期性、永久性工作。一些地方在首轮修志后即将地方志工

作部门撤销,是违反《条例》规定的。

其次,每一轮志书的编纂时间,应当控制在20年左右。新时期大规模首轮修志基本始于上世纪80年代,按照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的规定,其结束时间应当大体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然而至今仍然有1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没有最后完成首轮修志任务(浙江省、西藏自治区首轮修志因与二轮合并除外)。这种情况不能再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了,希望有关单位重新摸一下底,了解一下自己负责区域内究竟还有几本地方志书没有出版或编完,进度到哪里了,原因是什么,下一步打算采取什么措施,然后分别不同情况处理。凡是已经完稿或接近完稿的,要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联合督察,促其尽快组织评审验收,力争年底前结项出版;凡是志稿审查合格仅仅因为经费问题而迟迟不能出版的,要积极争取上级财政部门给予支持,尽快出版;凡是离完稿还有较大距离或由于种种原因短时间内难以通过审查验收的,要动用行政手段,勒令其撤项,并将其并入二轮修志。总之,我们一定要在今年年底,至迟在明年全国方志办主任会议前,彻底结束首轮修志,不要让首轮修志的扫尾工作再拖到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去部署了。

再次,志书的记述时间范围,除首轮因为上限自远古起而横跨数千年外,凡续修都应限制在20年左右。首轮志书的下限既然大体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么,二轮志书的上限就应当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而下限则应当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指组在《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中一开始就指出,二轮志书“内容的上下限,大致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指组制定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中明确提出,记述的时间界限“不随意突破志书的上限和下限,严格控制上溯和下延。”但从现在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二轮志书看,上下限可以说五花八门,有的上限为上世纪90年代,有的下限为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期,有的甚至要下延至本世纪的第二个10年;有的时限为20年,有的为30年,还有的为十来年。我们常说地方志是

一样的,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我们所从事的修志工作,是由党领导的一项意识形态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我们在修志过程中,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上,必须秉持科学的理论观点,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中指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志书编纂“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在“观点”一章中也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记述社会主义时期的内容,应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风貌,全面反映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程和成绩,正确反映历史发展中的曲折和问题。”这些规定都不是套话,不是抽象的、可有可无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必须遵守的。

我多次说过,志书编纂虽然是述而不论,但并不等于没有立场、观点,不需要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同样是志书中有关古代史部分,特别是有关农民起义的部分,例如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等等,封建统治阶级记述与我们的记述肯定不一样。同样是志书中有关近现代部分,特别是有关中国革命的部分,例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起义、五四运动、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等,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记述肯定不一样。同样是东三省志,日本人与中国人的记述肯定不一样。同样是台湾省志,“台独”分子与主张一个中国的人记述也肯定不一样。可见,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所谓客观、全面,从来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

我们经常要求地方志工作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秉笔直书”,从本质上讲,就是要求大家站在党和国家、人民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实际出发来“求是”、来“直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

恩、恩格斯、列宁的基本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学习《宪法》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在志书编纂中才能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熟悉党中央对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评价,才能了解《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才能把历史问题放到特定历史条件下来认识,才能有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才能准确地把握历史的本质和主题、主线和主流,才能掌握评判事件臧否人物的正确标准,才能把好政治关。尤其二轮修志所记述的时段,刚好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由开始到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启动“三步走”战略到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时期。我们只有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准确把握改革开放初期那20年的历史脉络,才能使篇目设置反映那段历史的本质,才能使记述真正做到客观、全面。

我们要对志书质量负责,一定要从始至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切实做到进度服从质量。《条例》规定每轮修志在20年左右,这就意味着二轮修志的截止时间大体在本世纪的2020年左右,也就是说,还有七八年时间。因此,本轮修志的时间还是充裕的,只要大家抓紧部署工作,抓紧组织编纂,抓紧培训队伍,抓紧起草和拿出初稿,反复征求意见、反复打磨修改都是来得及的,不要急于出版。要把好志稿出版前的验收关,防止走过场,要像《条例》要求的那样,“组织有关保密、档案、历史、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参加,重点审查地方志书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和保密、档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全面、客观地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当然,确保志书质量不只限于政治观点正确,还要做到史实准确、布局合理、体例规范、文字简洁、要素齐全、编纂严谨。总之,我们要善于运用《条例》来推动志书质量的管理,努力使我们笔下的志书成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佳志、良志。第四次全国工作会议上宣布,中指组将组织一次全国性

的志书评比活动,方志出版社要组织实施精品工程。这些都是为了促进志书质量提高而采取的措施,希望有关部门要抓紧落实。

七、增强依法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的能力

《条例》除了把“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作为地方志工作机构必须履行的职责之一,规定地方志工作机构在每一轮志书编修工作完成和启动新一轮志书续修的同时要负责“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之外,还列出专条,规定“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该条指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应当积极开拓社会用志途径,可以通过建设资料库、网站等方式,加强地方志工作的信息化建设。”这就告诉我们,地方志工作已经不再是仅仅限于修志的工作,而是必须同时负责开发利用修志的成果;开发利用修志的成果,已经不再是地方志工作机构一项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工作,而是必须做的工作;开展读志用志工作已经不再是仅仅依靠志书改编成简志或专题书、在电视和报刊上开辟专栏那样的工作,而是要利用数字化、网络化的新技术手段将志书制成具备检索功能的光盘,要建立网站使其上网,让读者以最便捷的方式查阅和利用志书。

加快地情网站建设,是信息化时代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最为有效最为重要的手段。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方志工作机构建设的地情网站已有502家,其中省级23家,市级151家,县级328家。这说明,还有很多省、市、县没有建立网站。当前,尚未建立地情网站的机构要尽快建立;已建成的地情网站要继续加以完善。要克服目前志鉴数据库建设中结构单一、数据无统一标准、检索功能不便捷等弊端,逐步建设方志全文库、影像库、书目库,以及人物资源库、事件资源库、文献资源库、地名资源库、景观资源库等专题资源库。要不断优化检索界面,提升检索功能,加强地情网站信息的采集、编写和发布,加快网站内容的更新,提高网站的访问量和影响力。要有意识地培养精通现代信息技术的人才,改进数字化、网络化的技术和设备。要争取地情网站与当地其他网站的合

作,做到互惠互利,实现资源共享。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要积极推进“一网两库”建设,在国家方志馆投入使用后,立即启动地方志系统的全国联网工程。

另外,我利用这个机会再谈谈关于方志馆建设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年和去年的全国方志机构主任会议以及其他场合曾多次谈过,提出凡有条件建方志馆的地方,对方志馆要重新定位,不要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把它当成存放志书和展览修志历史的场所,而应当把它建成地情馆、国情馆,使它成为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的又一个重要手段。方志馆这个东西,古代并没有,民国时才出现,当时指的是修志机构,与我们今天讲的方志馆不是一个意思。今天修志机构的名称已经改叫地方志办公室,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方志馆不是指机构,而是指设施。那么,它应当是一种什么设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方志书,什么是方志办。大家都承认,方志书本质上是地情书,方志办实际上是地情办。既然如此,方志馆就应当是地情馆,即展示地情的设施。然而,我在全国看了很多叫方志馆的地方,印象基本上是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办公楼,与其他办公楼不同的地方在于放图书的面积大一点,有的有介绍志书和修志历史的展览。修志史的展览需不需要呢?也需要。但全国有一两个、两三个就足够了,不必要到处都搞,否则没有多少人去参观,会造成很大浪费。过去国家方志馆和许多省市方志馆申请立项之所以困难重重,与我们对它的定位不准确有很大关系。相反,如果我们把方志馆定位为地情馆、国情馆,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在强调地情教育、国情教育,但却缺少一个进行全面教育的场所。历史博物馆、城市规划馆等虽然也可以进行地情、国情教育,但前者只是纵向展示历史的,并且往往以文物为中心,很少涉及现状;后者虽然介绍的是现状,但主要展示的是城区建设,且往往侧重于远景规划。而作为地情馆的方志馆,则是以一个行政区域为单位,用沙盘、模型、塑像、展板、影视等形式和声、光、电等手段,全面介绍该区域内的城市与乡村、自然与社

会、历史与现状。就是说,要把志书中的文字变成实物,把平面的东西变成立体的东西,用生动形象的现代化手段,全方位展示地情和国情。如果这样给方志馆定位,中小学校一定会把它当成对孩子们进行地情、国情教育的课堂;当地干部群众和国外、境外及外地来旅游、出差、经商、打工、求学的人,特别是外地的考察团、国外的访问团,一定会把这里当成宏观、全面、快速、形象了解当地情况的展馆。观众多了,方志馆的社会效益自然就发挥出来了,政府的投入就值得了,申请立项也就值得了。因此,无论从办好方志馆的角度,还是从促成方志馆立项的角度,都应当把它定位为普及地情知识的地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建设,其中提到了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我认为,只要把方志馆定位为地情馆和国情馆,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中,今后肯定也会有它的位置。此外,我主张有条件的城市,最好把方志馆放在显眼的位置,并在外观设计上赋予其民族特色、地方特色,使它成为地标式建筑,成为城市的一个景点和亮点。这样,不仅可以用它普及地情知识,而且可以用它来提升城市的文化品味,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现在,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很多地方都在建设或计划建设方志馆,我建议大家在设计之前,最好到一些按照地情馆、国情馆模式进行方志馆建设的地方看一看,取取经。

八、增强依法开展方志理论研究的能力

前面已经提到,《条例》在规定的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责中,包括组织整理旧志和推动方志理论研究。这既对我们开展理论研究提出了要求,也为我们开展理论研究提供了保障。30年的新编地方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方志编纂、方志管理、方志应用的基本理论;同时,通过对旧志的整理、研究和对传统地方志编纂历史的梳理,逐步建立起了方志基础理论和方志史学。但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意义上的方志学,至今尚未形成系统、完整、规范的学科体系,尚未拿出一本为各方面公认为权威的教科书,尚未被国务院学位办列

入学科目录,也未能被高等院校普遍作为课程或专业设置。这种状况与我国上千年的修志历史不相称,也与地方志事业创新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尤其现在,许多地方志工作机构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后,从事理论研究的积极性没有评聘职称时那样高了。而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虽然有人致力于旧志整理和方志发展史的研究,但由于不参与当前修志的实践,缺少与修志人员的交流与合作,因此对新编地方志的了解和研究也很不够。这更需要我们想方设法调动广大修志人员和社会力量,特别是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者开展方志理论研究的积极性。能否深入持久地开展方志理论研究,能否尽快创立系统、完整、规范的方志学科体系,是对我们依法修志能力的又一个检验。为此,我们要注意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要进一步总结修志经验。方志学是建立在地方志编纂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地方志编纂理论的来源是地方志编纂的经验。自己的经验最可宝贵。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在开展二轮修志的同时,高度重视对本地、本部门首轮修志经验的总结,通过总结经验,加深和提升对地方志编纂的规律性认识,并将这些认识作为经验积累下来,上升到理论,用以指导当前和今后的修志实践。另外,也要重视他人的经验,通过横向交流与走访学习、开展志稿评议、学术研讨、联合培训等方式,相互汲取经验、取长补短,促进理论的完善和升华。

其次,要进一步整理和研究旧志。首轮新方志的编纂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展的,当年的地方志工作者在边实践边总结经验的同时,通过对旧志的整理和研究,归纳旧志序跋中一些零散的编纂理论,借鉴旧志编纂的体例、框架,逐渐形成了新方志编纂的理论。可以说,没有对旧志的整理与研究,没有对旧方志理论的继承与批判,就没有新方志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地方志编修是我国独有的文化传统,有一套独特的编纂理论和学术话语。我们在旧志整理与研究中,要注意深入挖掘和研究旧志对于地方志表述的话语和语境,这对于新方志学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要进一步归纳整合理论研究成果和规

范学术概念。在方志理论研究中许多重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明确回答或取得统一认识,一些基本的概念也需要进一步加以规范;在地方志编纂中也有许多共性问题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回答,有许多已经确定的原则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释。目前正在编纂的《方志百科全书》,就是为了加快新方志学学科建设和提高学科理论研究能力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编纂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恰恰说明以往方志理论研究的薄弱和不足,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归纳整合理论研究成果和规范学术概念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重视并鼓励有理论兴趣和功底的同志多写文章,并充分发挥目前已有的学术团体、学术期刊的平台作用。

最近,中指组为了促进方志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作出两项决定,一是建立地方志系统的学术年会制度,将目前的各种论坛、研讨会统一整合到学术年会中来,并且把去年在宁波召开的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确定为首届学术年会;二是将中国地方志协会更名为中国地方志学会,并且已经过协会常务理事会通过,上报民政部审批。今后,我们要充分利用学术团体的特点和优势,整合社会力量,发挥有理论功底的老同志的作用,吸收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的学者加入,扩大方志理论研究的队伍。此外,各省也要发挥地方志学术团体的作用,积极举办各种理论研讨会,发动大家踊跃写文章。《中国地方志》杂志和各地的方志期刊,要努力办好理论研究的专栏,营造学术争鸣的氛围,引导大家深入总结修志经验,开展理论研究,促进方志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学术交流。对于优秀论文,要给作者以奖励。

九、增强依法表彰先进的能力

《条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在地方志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中指组早在《条例》颁布之前就联合人力资源部,在全国方志系统开展过一次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评选、表彰活动。《条例》颁布后,中指组又根据《条例》规定,再次联合人力资源部开展了一次评选和表彰活动。这些活动极大地

鼓舞和振奋了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的士气。现在方志系统有专职人员2万,兼职人员10万。他们中有许多富有献身精神、默默耕耘的先进人物,有许多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今后我们要充分运用《条例》赋予的权力,在每两次全国工作会议之间,都搞一次全国规模的表彰先进活动,使它制度化、常态化。同时,各地也要善于利用这一规定,定期开展本地区的评比、表彰活动,不断增强地方志工作队伍的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和凝聚力。

十、增强依法开展军事志、部门志编修的能力

《条例》虽然没有对军事志、部门志编修作出具体规定,但规定编纂地方志涉及军事内容的,“应当遵守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志编纂的有关规定”。还规定:“国务院部门志书的编纂参照本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这就在实际明确了军事志和部门志的法律地位。有关单位和部门也应充分利用这一规定,积极主动地开展各自工作。

同志们,《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制定与颁布实施,是贯彻依法治国、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和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立法工作等党和国家一系列方略、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对我国地方志自古由国家组织编修的传统继承和发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地方志工作有效进行的必然要求。它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开展地方志工作最为权威的依据、最为有力的武器,我们要反复学习,深刻领会,切实掌握,大力宣传,严格执行,充分运用。我们要抓住当前全党全国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各地纷纷制定文化发展规划的大好机遇,争取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到规划中去,乘势推动地方志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只要我们认真贯彻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打造学习型、研究型、创新型、服务型的地方志办,大力推进地方志工作的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工作内容创新、志书编纂创新、资料搜集创新、质量管理创新、学科理论创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创新、修志队伍组织与培训创新,再加上不断增强依法修志的能力,我们就一定能为促进各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弘扬中华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由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全国统一编纂的书,就是说,它是“官书”。既然如此,其上下限除首轮志书情况特殊外,从二轮修志起就应当大体统一起来。如果二轮志书不统一,势必要影响到三轮、四轮志书的统一。而且,把二轮志书记述时段严格限制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不仅有利于使这轮志书完整记述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而且也可以为第三轮修志留下空间。否则,像现在一些地方把二轮志书下限延伸到眼前,不仅使第三轮志书的起止发生困难,也不符合志书编修的规律。记载历史,总要与现时有一点间隔,使历史有一点沉淀,不能靠得太近。有些地方的领导希望把志书下限与现时挨得近些,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把自己任期内的政绩写进去。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并不符合志书编纂的规律。在这个问题上,既要遵守《条例》的有关规定,提倡尊重修志的规律,也要坚持正确的政绩观。

五、增强依法搜集资料的能力

《条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可以向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征集有关地方志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支持。”编修志书,除了人员和经费外,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资料。没有足够的资料,志书无法编修,即使勉强编修,质量也高不了。古人总结战争经验,常说的一句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地方志工作套用这句话,也可以说“志书未修,资料先行。”现在,《条例》将地方志工作机构搜集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向地方志工作机构提供资料,都作为有法律效力的权力和义务加以确定。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破解在搜集资料中遇到的困难,扩大资料的搜集领域和种类,既要重视搜集文献资料、报刊资料、档案资料,也要注意搜集口碑资料、实物资料。

当前正在进行二轮修志所要记述的是改革开放开始后的内容,这个时段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机构改革等原因,一些行业的管理体制变动很大,使原有资料搜集的渠道、方式都发生相应改变,给搜集资料的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善于运用《条例》赋予的权力,积极争取

有关各方的支持,加强资料搜集工作。北京市方志办针对行政区域志与专业志内容相互交叉的情况,积极组织召开部分区县志和专业志承编单位的资料交流会,建立资料搜集的互助渠道,减少了修志部门在资料搜集工作中的重复劳动,很值得各地借鉴。还有一些地方,充分利用《条例》赋予的权力,促使以政府名义发文,推行各部门各单位资料向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年报制度,使方志资料搜集工作做到了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这种做法值得学习,应当推广。

对于收集到的文字资料、图表、照片、音像资料、实物等,以及修志过程中形成的文稿等的收藏保管问题,《条例》也作出了相应规定,要求地方志工作机构要“指定专职人员集中统一管理,妥善保存,不得损毁;修志工作完成后,应当依法移交本级国家档案馆或者方志馆保存、管理,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者出租、出让、转借。”在这方面,有的地方不够重视,首轮修志中的档案资料和文稿档案已经残缺不全,甚至连志书本身都找不到了;而有的地方则做得比较好。据说,山东省史志博物馆馆藏的《山东省志·农业志》,不仅附有成书过程中的资料长编200多万字,而且还有6000多万字的资料卡片。修志工作是一种资料性工作,不仅要重视搜集资料,也要重视收藏和管理各种资料,以便为今后的修志工作打下资料基础。

六、增强依法保证志书质量、严格审查验收制度的能力

《条例》明确规定:“编纂地方志应当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还规定:对地方志书的审查验收,“重点审查地方志书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和保密、档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全面、客观地反映本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这就告诉我们,确保志书质量,最重要的是看记述是否客观、全面,是否符合宪法,是否遵守了国家有关保密、档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什么叫客观、全面?怎样才能做到客观、全面?站在不同立场、秉持不同观点,看法和做法都是不

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曾于1992年8月、1995年12月、2000年6月三次来到甘肃，深入工矿企业、科研院所、部队营区、农村和牧区视察，了解社情民意，转达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甘肃军民的关怀问候。在视察期间，江泽民应各地同志之请求，还多次挥毫签名题词，或勉励，或赞扬，或期望，这些题词已成为激励鼓舞全省军民发奋进取的宝贵精神力量。

近年来，笔者通过查阅各地史志报刊和走访有关单位，广为寻觅，辑录了江泽民总书记题词签名的部分复印件。现借助《甘肃史志》平台，予以展示，以飨读者。

1992年8月9日至16日，江泽民来到甘肃。在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顾金池、省长贾志杰、兰州军区政治委员曹芑生陪同下，先后视察了敦煌、嘉峪关、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张掖、金昌、武威、天水、白银、兰州等地。

8月10日，江泽民在视察完敦煌之后，到达位于嘉峪关市的酒泉钢铁公司，在参观嘉峪关城楼和长城博物馆之后，考察了酒钢炼厂一号高炉和二轧钢厂，并为酒钢公司

江泽民总书记视察甘肃题词辑录

荷
重

签名，当第一次写到“一九九二年八月十日于酒泉钢铁公司”的“司”字时，总书记一边蘸墨润笔，一边自语：这个“司”字要写大一点，引得周围同志都笑了。

8月11日，江泽民来到戈壁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看望为祖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基地工程技术人员，并题写了“东风航天城”（“东风”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始建时的通讯代号）。

8月12日，江泽民到达张掖市，在张掖宾馆题写“金张掖”^①之后，冒雨驱车前往祁连山下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区看望各族群众，当地牧民以隆重的民族仪式欢迎总书记的到来。江泽民在裕固族帐篷里和各族青年合影，并题词“祁连松柏挺拔俊秀，各族人民情深意长”^②。下午，他又不顾疲劳，前往金川有色金属公司考察。在公司科技馆参观时，公司领导请求江泽民总书记题词留念，江泽民欣然应允。他略加思索，并征求金昌市委和公司领导意见之后，挥笔写下了“腾飞的镍都”^③。但他对这幅字不甚满意，幽默地说：“刚才你们叠了格，受拘束，没有‘飞’起来。再来一张，让它真正飞起来。”于是又写了第二张。江泽民这才满意地说：“这一张好！真地飞起来了！”

从金川到武威后，江泽民又为武威市题写了“银武威”。

13日，江泽民到达天水市，天水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氏的故里。江泽民在参观了麦积山石窟风景区后，为天水市题写了“羲皇故里”^④。

8月14日，江泽民来到白银市考察。白银公司曾是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基地，经多年开采，它已进入资源枯竭期，面临着新的创业考验。江总书记



题词勉励白银公司职工“二次创业,再展鸿图”^⑤,也寄语白银市党政领导“艰苦奋斗,振兴白银”^⑥。

省会兰州是江总书记本次视察的最后一站,8月15、16日也是安排得极为紧张的两个考察工作日。8月15日,江泽民视察了兰州军区机关和武警甘肃省总队,接见了军区机关干部和在兰离退休老同志,检阅了武警部队,并分别为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武警甘肃省总队及甘肃省公安厅题词:“发扬延安精神,把部队质量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⑦、“寓兵于民,富民强兵”^⑧、“陇原卫士,丝路哨兵”^⑨、“加强公安工作,保护社会稳定”^⑩。16日,江泽民前往兰炼、兰化和兰州高新技术开发区、中科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视察。兰炼、兰化是我国“一五”期间兴建的重要石化企业,历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怀。江泽民为兰炼题词:“发扬高严细实厂风,创办一流石化企业”^⑪;为兰化题词:“重振兰化雄风”^⑫。在兰州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兰州市题写了“发挥丝绸之路优势,加快兰州发展步伐”^⑬。江泽民还为中科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的“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书写了室名。

另据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和《军事工作大事记》记载,江泽民总书记这次视察检阅驻甘部队时,也多次题词勉励。8月10日为坦克某师题词:“努力建设现代化的人民装甲兵”;11日为“全军战斗英雄”庞国生前所在部队某步兵师题词:“发扬优良传统,建设过硬部队”;12日为志原军“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某步兵师题词:“发扬邱少云精神,建设过硬部队”;13日为某红军师题词:“发扬红军传统,锻造精锐之师”。

1995年12月23日至26日,江泽民总书记冒着严寒,第二次来甘肃视察贫困地区、受灾地区和困难企业。24日,在省委书记闫海旺、省长张吾乐、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精松的陪同下,到榆中县北山和定西县农村慰问受灾农户,参观“121集水工程”和小流域治理,给定西的题词中指出:“群策群力,定西大有希望”^⑭。25日,江泽民还视察了兰石厂、三毛厂。在兰石一分厂,看望曾被评为甘肃“工人明星”的陈春生时,江泽民应他的请求,在其保存的“甘肃省工人明星表彰大会”纪念封上签了名^⑮。

(辑录者为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秘书处原处长)



甘肃历代修志

车安宁

甘肃一名始于 11 世纪,取甘州(张掖)、肃州(酒泉)二地的首字而成。唐代曾在此设置过陇右道;宋时,分属宋、西夏、金所有;元代始设甘肃行中书省;明代,属陕西布政使司、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清代康熙初甘肃始复为省,辖今甘肃、宁夏、新疆、青海部分地区。光绪十年(1884)分置新疆省。1912 年甘肃又划分为宁夏(原朔方)、西宁(原海东)、兰山、泾原(原陇东)、渭川(原陇南)、甘凉(原河西)、安肃(原边关)七道。1927 年废道为省,1929 年分出青海和宁夏两省区。1949 年 8 月 26 日成立甘肃行政公署,1950 年 1 月 8 日成立甘肃省人民政府,相沿至今。甘肃修志,历史悠长,天水市北道区放马滩出土的“战国秦邽县地图”(绘于秦始皇八年,前 239 年)和“西汉纸地图”(距今 2100 年),可看作是最早的方志雏形;此后,甘肃修志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地记、隋唐的图经等形式,发展到宋元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地方志。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新编地方志的编修工作。至 2011 年,《甘肃省志》72 卷基本完成。同时,县志 83 卷和部分市州志、地区志也先后完成。目前,大部分单位和市州县进入二轮修志。在旧志整理出版、旧志研究评述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据统计,自汉代到民国的两千多年间,甘肃可考的方志约有 380 多部,加上各类图经、乡土志、调查记、采访录、要览等,在 498 部以上,近万卷。其中约半数以上,特别是早期志书已散失无存。

甘肃两汉至魏晋修志 这一时期,甘肃出现“五凉文化”,著有大量官、私修史书。其中就有被称为方志雏形的地记和传记 30 余部,合计 238

卷。仓修良著的《方志学通论》中有魏晋南北朝时代所产生的人物传记和地记列表,在《地记产生顺序表》中,共列 136 部地记,其中涉及甘肃的有《西河记》《秦记》《秦州记》《仇池记》《沙州记》《凉记》《凉州记》7 种。目前已知甘肃最早的方志著作有 47 部,多已佚。其中较著名的有阚骜的《十三州志》和刘昫的《敦煌实录》。此时的方志人物有:索綯、刘庆、刘昫、索暉、张谿、喻归、段龟龙、宗钦等。

《秦州记》,南朝刘宋(420~479 年)、郭仲产纂。佚。民国 12 年,陇南丛书编印出版社出版冯国瑞辑本。

《十三州志》全国地理总志。又称《十三州记》。阚骜撰。共 10 卷。约北凉永和五年(437)成书。以在汉代版图内所设司隶、豫、冀、兖、徐、青、荆、扬、益、凉、并、幽、交 13 州为纲,介绍各地的郡县沿革、河道发源及流向、社会风俗等地理现象,是研究中国西北地方史、古代地理状况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史料。该书被唐代刘知几誉为“言皆雅正,事无偏党”。已散佚,魏朝酈道元《水经注》、唐代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注》多有征引;清代张澍从《水经注》《后汉书注》《初学记》《括地志》《太平广记》《太平寰宇记》诸书中辑录佚文 299 条,按地域进行排比,编撰成书,收入《二酉堂丛书》;另有清代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及《知服斋丛书》辑本。|阚骜(? ~ 约 444)。字玄阴。甘肃敦煌人。初事北凉,得蒙逊器重,拜秘书考课郎中,典校经籍,刊定诸子 3000 余卷。后加封都尉,官至尚书。入魏后,乐平王拓跋丕引为从事中郎。后流落京都平城(山西大同),饥寒而死。|酈氏通经传,曾为王朗《易传》作注。

甘肃历代修志分类统计表

朝代	省志	府志	州志	县志	厅志	关镇卫所志	乡土志	人物志	地记	调查记	采访录	杂记	山水寺庙志	合计	备注
隋前							7	4	27			9		47	全佚
隋唐		1	8	1				2	10			1		23	全佚
宋		3	12	4					1			1		21	全佚
元	1		5											6	全佚
明		13	17	40		19			4				3	96	存十余部
清	2	12	42	98	1	9	7	4	1	8	1	9	1	189	大部有存
民国	2	3	1	67			4	1	12	9	3	11	3	116	大部有存
合计	5	32	85	210	1	23	17	11	55	17	4	31	7	498	

《敦煌实录》古代首部实录性史书。刘昫撰。北魏时成书。共20卷。已佚。主要记载了敦煌地区的历史和人物。《史通·杂述篇》曰：“郡书如常璩之详审，刘昫之该博，能传不朽，见美来裔。”又外篇曰：“敦煌僻处西域，求诸人物，自古阙载，既而刘昫裁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刘昫(? ~ 522年)。字延明。西凉王李暠时，官拜儒林祭酒、从事郎中、抚夷护军等，著有《略记》130篇84卷、《凉记》10卷、《方言》3卷、《靖恭堂铭》1卷。曾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

甘肃隋唐修志 隋唐两代甘肃编修的图经和人物志，可考的计有23部。其中《沙洲都督府图经》《沙洲地志》《瓜州伊西残志》《敦煌名族志》《沙洲城土境》《敦煌录》《寿昌县地境》《西州图经》《雍州图经》《陇右图经》《西凉录》《后凉录》等尚存残卷，其余散佚。这些图经残卷为研究唐代图经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实物，图经中所保存的资料，对研究中古时代西北边陲的历史、地理、水利、物产、文学、宗教极具参考价值。

《沙洲都督府图经》甘肃保存最古的一部图经，也是中国最早的图经。又称《沙州志》。唐代无名氏作，修于唐开元间。光绪三十四年(1908)法国人伯希和得自敦煌藏经洞，拿走原稿并留在法国。

首尾残缺，其存者长不逾三丈，有经无图。文字510行，计7073字。初定名为《沙州记》。宣统元年(1909)，罗振玉易名为《沙州志》，以残卷影印本收入《敦煌石室遗书》。1913年，又易名为《沙州图经》，收入《鸣沙石室佚书》。1916年，伯希和又据卷尾《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字样，定名为《沙州都督府图经》。书中记载了当地天象、盐池、渠、泽、堰、堤、亭驿、县学、社稷坛、杂神、寺庙、冢、古城、祥瑞、歌谣、古迹以及行政机构和区划等，还保留部分新疆域内容。从残卷可知，凡水渠、泊泽、池堰、城塞、驿路等记载十分“详瞻”，后人称此残卷“为世间鸿宝也”，理由是“唐代图经，久绝于世”，而此残卷可纠他史旁志之谬。

《沙州地志》唐光启元年记载沙洲、伊州地方情况的残卷。清末发现于敦煌鸣沙石室中。前人定名为《沙州地志》，日本学者羽田亨在其所撰《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考》中，则题名为《沙州伊州地志》。此书卷首残缺，卷末从形式看尚属完整。该志先述州的沿革大事及州境内河流湖海，著名城镇，再分县叙述。对州下辖县的记载，诸如去州之远近、户口、乡镇、物产、寺观、烽戍、山川、湖泊、古迹、风俗等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甚至有零乱的情况出现。

《西域图记》裴矩撰。共3卷。记述了西域四十四国的国情,并记述了由敦煌为总出发点,通往西域诸国的3条商道:北道起伊吾,经铁勒部等,至拂菻;中道起高昌、焉耆、龟兹、疏勒,逾葱岭,经康国、曹国等,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阗等,越葱岭,至北婆罗门。裴矩(547~627)。字弘大。河东闻喜(山西)人。隋炀帝时在甘肃张掖主管两域互市。期间,采访西域政权、风俗、山川、交道、物产等,著有《西域图记》《开业平陈记》《邺都故事》《高丽风俗》等,均已佚。

唐代还有《河西人物志》十卷,赵彦昭撰。已佚,《旧唐书》有载。

甘肃宋元修志 宋元时期的甘肃方志编修计有27部。其中北宋14部,分别为《秦州图经》《天水图经》《天水志》《庆州志》《秦州志》《镇洮州补遗》《至道西鄙图》《河西陇右图》《西域图》《泾原环庆西路州军山川城寨图》《山川郡县形胜图》《熙河六州图记》《仇池记》《甘省便览》;南宋7部,分别为《同谷志》《续同谷志》《文州古今记》《文州古今志》《文州续记》《西和州志》《环州志》;元代6部,分别为《甘肃图志》《元甘州志》《元山丹州志》《元肃州志》《元文州志》《元德顺州志》。多数已佚。另外,元代编修全国性的《大元大一统志》时,甘肃于大德二年(1298)编撰并提供了《甘肃图志》。对于方志名称,北宋时称“图”、“图记”、“图经”的有7种,南宋时则称为“志”、“记”,到了元代,则大部分称为“志”。此外,还出现了“续志”。这一时期甘肃方志在内容上突破了仅记地理的限制,增加了人物、学校、风俗、碑碣、艺文等,同时在体例上有了细目或分纲立目,全面完成了从图经向定型方志的过渡。另:成书于康熙初年的《巩昌府志》载:“漳县志毁于兵燹,是漳之无志且四百年于兹矣!”按时间类推,此一时期,还应纂有漳县志或包含漳县的州志。

甘肃明代修志 这一时期甘肃在行政上隶属陕西,没有省志,相关记载都录在陕西志书中,但省内的地方修志还在延续,并出现第一个高潮期。永乐至崇祯年间共修志96部,其中嘉靖年间修

26部,万历年间修22部,崇祯年间修22部,合计70部。除府、州、县志外,另有边镇、卫所志,山川、古迹等专志,还有“创修”、“续修”和“重修”。明代所修志书共有19种存世。此外,私撰的家乘族谱也开始兴盛,但留存稀少。明代甘肃及西北的府、州、县志如《敦煌杂钞》等,在类目的设制上因地制宜的增加了诸如屯田、兵马、粮饷、仓廩、茶马、边墩、塘墩和隘口等门类,在内容上突出了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屯田、边疆贸易、茶马交易、民族关系及边墙堡寨的建筑等,是一般内地方志所没有的。嘉靖年间胡缵宗纂《秦州志》《秦安志》《巩昌府志》,赵时春纂《平凉府志》等在甘肃历代所修志书中最为有名。

甘肃明代府志 甘肃明代修有府志13部,其中《临洮府志》5次纂修,《庆阳府志》《巩昌府志》各2次纂修,另有《平凉府志》[嘉靖]及《庆阳府志并属县志》《平凉府志并属县志》《巩昌府志并属县志》。多散佚,仅《临洮府志》[万历]、《庆阳府志》[嘉靖]、《平凉府志》[嘉靖]存世。①《临洮府志》[万历]。唐懋德撰。万历三十三年(1605)刻本。共26卷。分形胜考、总纪、星野考、沿革考、山川考、古迹考、风俗考、落封考、建置考、食货考、礼制考、学校、兵制考、茶马考、防御考、官师表、选举表、宦迹传、人物列传、驰恩录、灾异录、艺文录、杂志等。已佚。记述明代地方史料,颇详悉。北京图书馆旧藏残本七册,多抄康熙时高锡爵所修《临洮府志》版文,内容凌乱。张维著《陇右方志录》将该志列入佚目。甘肃省图书馆20世纪80年代由日本上野图书馆影印此志。②《庆阳府志》[嘉靖]。傅学礼主修。在宋代《庆州志》基础上创修。嘉靖三十六年(1557)成书。未刻本。后世仅留一部手写的孤本,10卷。详细记述了当时庆阳府的建制、疆域、形胜、城池、山川、风俗及人物等。光绪二年(1876)流入日本,存于日本国会图书馆。

还有地记4部,即《巩昌府志》《徽郡志》《张掖记》和《北地记》。

甘肃明代州县志 甘肃明代修有州志17部,其中《兰州志》4次纂修,《河州志》《宁州志》《肃州

志》《阶州志》《静宁州志》各 2 次纂修,另有《秦州志》和《泾州志》《徽郡志》。修有县志 40 部,共涉及 23 个县。其中《镇原县志》4 次纂修;《伏羌县志》《通渭县志》《安定县志》(分别为正德七年、嘉靖二十年、万历二十五年)各 3 次纂修;《秦安县志》《真宁县志》《兰县志》《宁远县志》《庄浪县志》《成县新志》《渭源县志》《会宁县志》各 2 次纂修;另有《华亭县志》《礼县志》《西和县志》《文县志》《崇信县志》《漳县志》《金城志》《清水县志》《洮阳古今志》《张掖志》《灵台县志》等。大多散佚,仅《河州志》[嘉靖]、《徽郡志》[嘉靖]、《宁远县志》[万历]、《成县新志》[崇祯]、《庄浪汇记》[万历]及《秦州志·序言》[嘉靖]等存世。①(《河州志》下文有校勘介绍。建议改为《徽郡志》)、《徽郡志》成书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夏,徽郡举人贵州按察兵备佥事郭从道主编。刻印出版,全一册,约 8 万字。分舆地、建置、祀典、田赋、秩官、选举、人物、艺文 8 卷,每卷内又分设子目数项,有附录等。卷首有前监察御史陇西人刘应雄所撰《徽郡志序》,卷尾有徽州知州孟鹏年《刻徽郡志后序》。刻本现存甘肃省图书馆和台北博物馆,今徽县内有复印本。该志为县南水阳乡新寺村郭家庄人郭从道所著,为目前所见当地撰修最早的志书,但该志多处提及“旧志云”等语,可见此之前当地已有更早的旧志,但今无从考证。该志经《徽县志》主编副编审梁晓明搜集整理点校后,2003 年 9 月经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成书。2004 年 12 月获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二等奖。②《宁远县志》[万历]。武山县保存最早的县志。邹浩纂修。万历十五年刻本。共 5 卷。分图象、舆地、人物、政事、艺文 5 类,下设 22 目。北京图书馆藏残缺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抄本。③《成县新志》[崇祯]。谢鏞纂。翰林院检讨李景廉为之作序。崇祯十四年(1641)刻本。有当代学者称:“谢鏞所修《成县新志》,寥寥二三万言,谢本人的文章占一半,不伦不类,俗不可耐。”成县档案局存有木刻本。

甘肃明代专志 甘肃明代纂修的专志有《崆峒山志》3 种,分别由赵时春、李应奇、许登纂修;

及胡瓚宗纂的《羲台志》。均已佚。其中《崆峒山志》[万历]是甘肃最早刊行的山志。万历十三年由平凉知府罗潮主持,李应奇编纂。万历十七年成书。共 3 卷。由分野、建革、疆域、形胜、田赋、仙迹、题咏等 7 门组成。收入《内阁书目》[万历]和《四库提要存目》。

甘肃明代关镇卫所志 作为边疆屏藩,明代政府在西北地区设了许多卫所,这种建置一直沿袭到清初。故明清时期西北的方志从体例、内容上体现出不同于中原一般州郡方志的特色,就是边镇志、卫所志的纂修。边镇志,主要记载边疆国防要塞情况,可考的有 7 部,其中《甘肃志》2 次纂修,还有《陕西行都司志》(所述属今甘肃地域。今不存,《四库全书·史部·地理》存目三列有;《明史·艺文志》载包节著《陕西行都司志》(十二卷)、《凉镇志》《甘镇志》《西镇志》《肃镇华夷志》(清人改名为《肃镇志》)。卫所志,主要记军队的布置,明代甘肃共修有 12 部卫所志,其中《岷州卫志》3 次纂修,《甘州卫志》2 次纂修。另有《庄浪漫记》《庄浪汇记》《永昌卫志》《洮州卫志》和《高台所志》《靖虏卫新志》《靖远卫志》。具体例以记疆域城寨、兵马刍粮等军事内容为重,兼记戍地风俗、物产、古迹、祠庙、人物、艺文等,书首必列戍地详细地图。

甘肃清代修志 清代甘肃编修的方志类书籍已知的有 189 部,贯穿顺治至宣统的 10 个时期,其中康熙年间纂修 40 部,乾隆年间纂修 42 部,道光年间纂修 20 部,光绪年间纂修 27 部,宣统年间纂修 22 部。

甘肃清代省志 康熙六年(1667)陕甘分治,甘肃正式建省。此后乾隆、宣统年间各修有 1 部省志。①《甘肃通志》[乾隆]。甘肃历史上第一部通志。又称《敕修甘肃通志》。雍正六年(1728)甘肃巡抚许容监修,李迪、张能第、甄汝翼、郑铎、樊初荀、田吕叶、曹最等人先后参与编纂,历时 8 年,乾隆元年(1736)成书。共 50 卷,约 88 万字。后收入《四库全书》。②《甘肃全省新通志》[宣统]。甘肃省第二部通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升允、长庚监修,丁喜翰、安维峻先后任总纂。宣统元年(1909)成书,宣

统三年刻印十余部。共 100 卷, 325 万字。正文篇目有天文、舆地、建置、祠祀、学校、兵防、职官、人物、艺文、志余 10 目; 下设 70 子目。全书上溯开天辟地, 下至宣统元年。记述甘肃、宁夏、青海三省之事。安维峻(1854~1925), 字晓峰, 号盘阿道人, 甘肃秦安县人, 清代著名谏官。光绪六年(1880 年)中进士, 选翰林院庶士, 后授编修。著有《四书讲义》四卷、《谏垣存稿》四卷、《望云山房诗集》三卷、《诗文杂集》一卷等。

甘肃清代府志 清代甘肃纂修的府志有 12 部, 其中《兰州府志》3 次纂修;《庆阳府志》《巩昌府志》各 2 次纂修; 另有《徽州府志》《临洮府志》《甘州府志》《平凉府志》和张澍编纂的《凉州府志备考》。①《兰州府志》[道光]。陈士楨修, 涂鸿仪纂。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共 12 卷, 6 册。设 8 个分志。②《巩昌府志》[康熙]。明代杨恩原纂, 清纪元补订。康熙二十八年(1689)刊本。共 28 卷。分形图、疆域、形胜、总记、沿革、山川、古迹、风俗、物产、建置、官政、警备、边政、官师表、武备表、宦迹、选举表、人物、艺文、杂识 20 门, 下设 51 目。纪元自序: “自诩更正《杨志》错讹, 而有补订之劳。”③《徽州府志》[康熙]。徽州知州辽阳举人邓天栋主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书。刻本现存南京图书馆, 1987 年由甘肃徽县县志办抄回缮写复印, 装订成册。全志 1 册, 分舆地、疆域、山川、里社、村镇、城池、州治、学校、风俗、公署、杂略、牌坊、恤政、地方要害、祀典、寺观、户口、田赋、均徭、杂支、徭役、灾祥、土产、官师、名宦、乡贤、人物、选举、荐辟、覃恩、貽恩、敕令、忠类、孝类、节类、烈类、流寓、徽苦记略、请免练饷揭、诗、歌等 40 项及自序共 55 页, 7000 余字, 卷首有“州境图”1 幅。2009 年梁晓明、张泓整理点校后收编入《清代徽县志集校》一书。徽州位于甘陕蜀交界处, 自西汉设(河池)县以来, 历史上隶属关系多变, 至元六年(1264 年), 由所属的南凤州改名徽州, 隶属陕西行省巩昌路。后至明清, 王朝承袭元制, 保持徽州。雍正七年(1729), 徽州降为徽县。另有徽州在皖南, 境内有黄山, 是徽商故里。历史上曾一度有甘肃徽州与安徽徽州并

存的情况。

甘肃清代州志 清代甘肃修有州志 42 部, 其中《阶州志》5 次纂修;《秦州志》《宁州志》《狄道州志》《秦州志》各 4 次纂修;《河州志》《差州志》《肃州志》《静宁州志》各 3 次纂修;《兰州志》两次纂修; 另有《岷州志》《洮州志》《徽州志》《涇州志》《涇州乡土志》《武阶备志》和《五凉全志》。①《狄道州志》[乾隆]。呼延华国修, 吴镇纂。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共 16 卷。志书中记载了古长城、水磨, 及当时的农业种植、少数民族变迁等情况。《陇右方志录》列为名志。②《秦州志》顺治十四年(1657)宋琬著。11 卷 9 册。分类有述(州郡述、郡县述)、表(疆域表、沿革表、职官表)、地理志、建置志、官师志、选举志、仪制志、边防志、食货志、兵戎志、灾祥志、艺文志、皇记考、帝记考、名宦、列贤、隐逸、流寓、文苑、群雄、孝行、列女、节妇。刻本现存日本内阁文库;《秦州志》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赵世德纂。分为户口、徭役、城池、公署、仓库、驿所、要害设防、名宦乡贤、选举、官师、孝行节烈、隐逸流寓、覃恩、灾祥赈恤、艺文 16 个目, 不分卷, 全志仅 1.5 万余字。重在记述现状, 追溯至明代, 是一部地道的州情简志;《直隶秦州新志》乾隆二十九年(1764)费廷珍主纂, 胡钺纂修。12 卷 16 册。分类有沿革、山水、建置、食货、武备、风俗、官师、选举、名宦、人物、艺文、杂记, 以及补遗;《秦州直隶州新志》光绪十五年(1889)余泽春主纂, 王权、任其昌纂修。24 卷 16 册。分类有沿革、山水、地域、食货、学校、选举、戎政、职官、名宦、人物、艺文、附考。此志对乾隆版州志史料进行了考证、增删, “阙者补之, 误者正之, 枝者剔之”, 对兵戎、食货、官师、人物的记述尤其详尽。③《静宁州志》[康熙]。黄廷钰修, 吴之珽纂。康熙五十五年刻本。共 14 卷。已佚。存目于《乾隆至平凉知府序》。吴之珽(生卒年不详)。字乾玉, 号赤谷。甘肃陇西人。康熙拔贡, 曾任江西婺源, 江苏宝应、浙江秀水等县知县。著有《蠹书》2 篇; 编有《襄武人物志》, 将陇西人物分为 30 传。④《五凉全志》全称《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凉州保存较早的志书。张昭美总纂。

乾隆十四年成书并刻本。全志含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五县县志各一部,另有艺文志一部。纂修以《周礼·地官·司徒》的智、仁、圣、义、忠、和的六条道德标准教养五县百姓为宗旨,借鉴康对山《武功志》的体例,定为7篇:地理、建置、风俗、官师、兵防、人物、文艺。该志内容较简略,且有疏误之处,但刊印后流布较广。1998年由张克复等整理点校出版。

甘肃清代县志 清代甘肃修有县志98部,涉及47个县。其中《通渭县志》《镇原县志》各6次纂修;《伏羌县志》《会宁县志》《金县志》《靖远县志》《皋兰县志》《礼县志》各4次纂修;《崇信县志》《庄浪县志》《华亭县志》《宁远县志》《两当县志》《文县志》《镇番县志》《徽县志》各3次纂修;《陇西县志》《狄道县志》《清水县志》《西和县志》《永昌县志》《山丹县志》《秦安县志》《成县志》《敦煌县志》《合水县志》《正宁县志》各2次纂修;另有《灵台县志》《平凉县志》《安化县志》《安定县志》《渭源县志》《天水县志》《平番县志》《武威县志》《古浪县志》《西固志》《环县志》《玉门县志》《甘谷县志》《和政县志》。这一时期,分县制度产生,由县丞专管,故分县志又称“县丞志”,甘肃可考的有《陇西分县武阳志》(漳县)、《打拉池县丞志》。

《重修皋兰县志》[光绪]。张国常纂。光绪十八年成书。甘肃政报局石印发行。共30卷。卷首弁言、凡例、目次、衔名;卷目依次为:图、沿革表、职官表、选举表、封爵表、舆地志、经政志、灾异志、学校志、祀典志、武备志、古迹志、艺文志、宦绩志、人物传、列女传、杂传、流寓、订讹等。《陇右方志录》称:“志分图、表、志、传四纲,依类相从,有条不紊,旧志讹误,订改无遗;又始立方言,金石两目,义例谨严,文词渊雅,吾省名志也。”张国常(1836~1907)。字敦五。甘肃皋兰县(兰州市)靛园寺人。光绪进士,授刑部主事。曾主讲兰山书院20余年。张氏一生遗稿积数十巨册,佚失颇多,存有《土司蕃族考》1卷、《甘肃忠义录》30卷。

甘肃清代专志及其他杂志 此时还有卫志、厅志、镇志、乡土志、人物志、山志、采访录及其他

杂志多种,这些志书有官修、有私撰,优劣并存,不乏张维指出的“官辑应征之本,”其中粗率错讹,多有所见。其中较为典型的有20多部:《洮州厅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成书。共4册18卷,由“洮州抚番同知”、河南光山人张彦笃主持,广东崖州知州、丁丑进士包永昌篆修。较详细地记载了临潭、卓尼、迭部等洮州境内藏族的大量史料。是继清康熙乾隆年所编《洮州卫志》抄本之后的一部重要的甘南地方史书。还有杨春茂著《甘镇志》顺治十四年(1657)、张伯魁纂《崆峒山志》2卷,嘉庆二年(1797)、佚名编《崇信县采访乡土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杨丙荣纂《泾州采访新志》宣统元年(1909)、潘挹奎撰《武威耆旧传》4卷,张澍辑《武威韩氏忠节录》2卷、《五凉旧闻》40卷和《凉州异物志》1卷、段永恩纂《武威段氏族谱》4卷卷首1卷、附录1卷(武威段氏家族是一个名族,云南大理国段式系其分支)、俞文绶撰《卓尼记》、杨昌浚纂《甘肃忠义录》17卷、常钧撰《敦煌杂钞》2卷和《敦煌随笔》二卷、阿桂等纂《钦定兰州纪略》20卷卷首1卷、郭维城著《肃州备采录》[光绪]、武全文撰,于元煜增修《芮谷志》、吴之珽著《襄武人物志》1卷、杨凌霄著《陇西乡彦传》1卷、孙祖起著《洮阳耆英纪略》,及《皋兰县红水分县采访事略》[光绪]手抄本等。

甘肃民国时期修志 甘肃陇南14县相继于1920年成立县志局。次年,省署通令各县纂修新志。1928年成立甘肃省通志局,纂修《甘肃通志》。1932年甘肃省通志局改为甘肃省通志馆,杨思任馆长,张维任副馆长。各县县志馆相继改为文献委员会。在省县通志局(馆)和文献委员会的推动下,各地相继开局修志。据统计,民国时期,甘肃共编修可考的各类志书至少为116部。还有未刊印和出版者若干。

《甘肃新通志》又名《甘肃通志稿》。刘郁芬监修,张维总纂,杨思、张维、慕寿祺等编纂。1928年始修,1936年修成。全志共130卷,450万字。分舆地、建置、民族、民政、财赋、教育、军政、交通、外交、职官、选举、人物、金石、艺文、纪事、变异、杂记

等 17 志。上起远古,下迄 1928 年甘、宁、青分省。对甘肃前两部通志中的错谬、疏漏多有校正补阙。对山川河流记述详确;尤其对甘肃各民族以历史先后为序,析其历史渊源和姓氏演变;对甘肃诸土司名称、种族、辖区、户口均归纳入志。由于时代局限,该志记载社会经济及科技方面的资料比较简略,对封建社会制度遵从道德的规范和选举制度文字较多。志稿除《甘肃省县总分图》、《甘肃地理沿革图表》于 1934 年由北平大北印书局铅印发行外,其余均未付梓。全稿藏于甘肃省图书馆。①杨思(1882~1956)。字慎之。甘肃会宁人。清末进士,翰林院检讨。光绪三十二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历任甘肃省议会副议长,安肃、兰山道尹,护理(代理)甘肃省长,南京政府国民大会代表、省民政厅长。1932 年任甘肃通志馆馆长兼总纂,主持并与张维、刘庆笃完成《甘肃通志稿》130 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副主席。②慕寿祺(1875~1948)。字子介,号少堂。甘肃镇原县人。清末举人。曾任甘肃文高等学堂教习。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后任甘肃省临时议会副议长、甘肃省长公署秘书长、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省参议院议员、参议院参政等职。1929 年任甘肃省通志局总纂。毕生著述颇丰,计有《经学概论》、《陇上同名录》、《甘肃省历代大事记》、《西北道路志》等 30 余部,尤以记述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甘宁青史略》(40 卷)价值颇高,还重修《镇原县志》20 卷。

此外还有一部《甘肃省志》,民国初年白眉著。

甘肃民国时期市府州志 《兰州市志》2 次纂修,《庆阳府志续稿》1 部,《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任承允总纂。民国 28 年(1939)9 月,兰州国民印刷局印刷。共 8 卷 4 册,分沿革、山水、建置、食货礼俗、学校、戎政战防、职官、人物、艺文。其中沿革、山水均沿袭了《秦州直隶州新志》的沿革、山水部分。民国 9 年(1920)开始,至民国 23 年(1934)完稿。

甘肃民国时期县志 民国时期甘肃编修的县志总计 67 部,涉及 47 个县。其中《会宁县志》《天

水县志》各 3 次修纂;《漳县志》《定西县志》《西固县志》《夏河县志》《平番县志》《宁县志》《东乐县志》《安西县志》《靖远县志》《西和县志》《陇西县志》《永昌县志》《庆阳县志》《镇番县志》《镇原县志》各 2 次纂修;另有《渭源县志》《红水县志》《洮沙县志》《和政县志》《导河县志》《临潭县志》《古浪县志》《甘谷县志稿》《清水县志》《崇信县志》《华亭县志》《灵台县志》《榆中县志》《皋兰县志》《正宁县志》《临泽县志》《鼎新县志》《金塔县志》《重修敦煌县志》《新修张掖县志》《玉门县志》《泾川县志》《徽县新志》《礼县新志》《康县志》《秦安县志稿》《高台县志》《酒泉县志》《平凉县志》。另有《武山县志稿》11 卷。民国 17 年(1928)李克明主纂(1875—1952 年)。未能付印,残稿本存天水市档案馆;《徽县略志》为手抄本,系黄程九于民国 2 年(1913)在南京博物院摘录旧志所作笔记。原稿存甘肃省图书馆,共 33 页,万余字,分沿革、兵事、人物、杂志等 4 项。①《天水县志》[民国]。贾缙绪总纂。民国 28 年(1939)兰州国民印刷局印刷。共 14 卷。分地理、建置、民族、民政、财赋、教育、军政、交通、职官、选举、人物、艺文、灾异等志。上限至明末清初,下限至 1936 年。采用分志条目体,标题新颖,充分运用当时所认知的科学知识,大量应用图表,扩展志书记述内容,设交通、教育、民政、民族等志,对新鲜事物给予足够重视。②《西和县志》[民国]。朱琴伯总纂。民国 36 年(1947)完稿。32 万余字。该志按国民党内政部所颁修志体例依次排纂。目次分卷首、主体、志余 3 部分。主体 12 卷,分为舆地、建置、民族、民生、民政、财赋、教育、军政、交通、外交、誉旧、艺文等志。详细记述了民国时期的施政情况和多项事业的兴衰起伏,全面记载了西和县山川文物、风土人情、科学技术、自然灾害、矿产资源、政治经济、名人轶事等方面的历史和当时的状况。

甘肃民国时期专志及其他杂志 民国时期纂有多部专志和乡土志及其他杂志,如《甘肃人物志》张维纂;《首阳山志》民国二十五年(1936)张颖轩纂;《朱圉山志略》安履祥纂;(下转第 23 页)

台湾整理出版的甘肃旧方志简介

王立明

台湾对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遗产的旧方志的整理极为重视,先后于20世纪60年代后影印出版了卷帙浩繁的《中国方志丛书》、《新修方志丛刊》,共计6086册大陆旧方志,其中有甘肃旧方志71种。

一、《中国方志丛书》

该丛书由台湾成文出版社编辑,民国55年至59年(1966至1970年)、63年至65年(1974至1976年)、72年至74年(1983至1985年)在台北影印出版,共5359册。

该丛书按A华中(01江苏、02浙江、03安徽、04江西、05湖南、06湖北、07四川)、B华北(08山东、09山西、10河南、11河北、12陕西、13甘肃)、C华南(14广东、15广西、16福建、17云南、18贵州)、D西部(19新疆、20西康、21青海、22西藏)、E塞北(23宁夏、24绥远、25热河、26察哈尔、27蒙古)、F东北(28辽宁、29安东、30辽北、31黑龙江、32兴安、33吉林、34合江、35松江、36嫩江)、G台湾(37台湾)七大片区分类。

其中:甘肃省(按照民国时期甘肃省的管辖范围,含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旧方志有46种:

001.《陇边考略》,1卷,清阙名撰,抄本。

002.《钦定兰州纪略》,20卷,首1卷,清阿桂等修,清冯培等纂,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抄本。

003.《狄道州志》,16卷,清呼延华国修,清吴镇纂,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刊本。

004.《金县志》,2卷,清耿喻修,郭殿邦等纂,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刊本。

005.《渭源县志》,10卷,陈鸿宝纂修,民国15年(1926年)抄本。

006.《续修会宁县志》,2卷,清徐敬等纂修,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刊本。

007.《清水县志》,16卷,清朱超纂修,清乾隆六十年(1721年)抄本。

008.《徽郡志》,8卷,明孟鹏年修,明郭从道纂,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抄本。

009.《重修通渭县新志》,12卷,首1卷,补遗1卷,清高蔚霞修,清苟廷诚纂,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刊本。

010.《西和县志》,4卷,清邱大英等纂修,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抄本。

011.《成县新志》,4卷,清黄泳修,清汪于雍纂,清乾隆六年(1741年)刊本。

012.《静宁州志》,8卷,首1卷,清王烜纂修,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刊本。

013.《隆德县志》,2卷,清常星景等纂修,清康熙二年(1663年)抄本。

014.《庄浪志略》,20卷,清邵陆等纂修,清耿光文增纂修,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抄本。

015.《重修崇信县志》,4卷,张明道等修,任瀛翰纂,民国15年(1926年)抄本。

016.《新修固原直隶州志》,11卷,附《硝河城志》1卷,清王学伊纂修,清杨修德纂修,清宣统元年(1909年)刊本。

017.《民勤县志》,不分卷,马福祥等修,王之

臣纂,民国抄本。

018.《玉门县志》,不分卷,清阙名纂修,抄本。

019.《涇州志》,2卷,清张延福修,清李瑾纂,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抄本。

020.《海城县志》,10卷,清杨金庚修,清陈廷珍等纂,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抄本。

021.《两当县新志》,12卷,清德俊纂修,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抄本。

022.《重修镇番县志》,10卷,首1卷,清许协修,清谢集成纂,清道光五年(1825年)刊本。

023.《永登县志》,3卷,周树清纂修,民国抄本。

024.《合水县志》,2卷,清陶奕曾纂修,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抄本。

025.《夏河县志》,10卷,张其昀纂修,民国抄本。

026.《山丹县续志》,10卷,首1卷,清黄璟等纂修,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抄本。

027.《肃镇志》,4卷,清高弥高等纂修,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抄本。

028.《洮州厅志》,18卷,首1卷,清张彦笃修,清包永昌等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抄本。

029.《安定县志》,8卷,清张尔介纂修,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抄本。

030.《敦煌县志》,7卷,清苏履吉等修,清曾诚纂,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刊本。

031.《崆峒山志》,2卷,清张伯魁撰,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刊本。

032.《和政县志》,9卷,马凯祥修,王诏纂,民国19年(1930年)抄本。

033.《靖远县志》,8卷,首1卷,清陈之骥修,清尹世阿纂,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刊,民国14年(1925年)重排印本。

034.《伏羌县志》,14卷,清周铎修,清叶芝纂,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刊本。

035.《新纂康县县志》,24卷,王士敏修,吕钟祥纂,民国25年(1936年)石印本。

036.《华亭县志》,4卷,张次房修,幸邦隆纂,

民国22年(1933年)石印本。

037.《重修隆德县志》,4卷,桑丹桂修,陈国栋纂,民国24年(1935年)石印本。

038.《重修灵台县志》,4卷,首1卷,附《灵台专集》,杨渠统等修,王朝俊等纂,民国24年(1935年)排印本。

039.《临泽县志》,14卷,首1卷,章金龙修,高增贵纂,民国32年(1943年)排印本。

040.《重修镇原县志》,19卷,首1卷,钱史彤等修,慕寿祺等纂,民国24年(1935年)排印本。

041.《秦安志》,9卷,明胡纘宗纂修,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刊本。

042.《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5卷,清张之浚等修,清张昭美等纂,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刊本。

043.《甘州府志》,16卷,首1卷,清钟麋起纂修,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刊本。

044.《徽县志》,8卷,清张伯魁纂修,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刊本。

045.《直隶秦州新志》,12卷,首1卷,末1卷,清费廷珍修,清胡钺纂,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刊本。

046.《兰州府志》,12卷,首1卷,清陈士禎修,清涂鸿仪纂,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刊本。

二、《新修方志丛刊》

台湾学生书局于民国57年(1968年)前后影印出版《新修方志丛刊》。该丛刊分为河北方志、山东方志、河南方志、山西方志、西北方志、江苏方志、安徽方志、湖北方志、湖南方志、四川方志、广东方志、广西方志、云南方志、边疆方志14个部类,共230种、727册。其中有甘肃(按照民国时期甘肃省的管辖范围,含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旧方志25种、41册。

(一)《新修方志丛刊·西北方志》分两辑,共有甘肃旧方志20种、33册。

第一辑有甘肃旧方志9种、19册:

12.《漳县志》,1册,900元(台币,后同)。

13.《崇信县志》,1册,900元。

- 14.《永登县志》，1册，600元。
 - 15.《民勤县志》，1册，600元。
 - 16.《通渭县新志》，2册，1750元。
 - 17.《固原州志》，3册，2650元。
 - 18.《临洮府志》，3册，2650元。
 - 19.《阶州直隶州续志》，4册，3550元。
 - 20.《重修肃州新志》，3册，2650元。
- 第二辑有甘肃方志11种、14册：
- 10.《巩昌府志》，2册，1500元。
 - 11.《甘镇志》，1册，900元。
 - 12.《重修靖远卫志》，2册，1750元。
 - 13.《宁州志》，1册，900元。
 - 14.《岷州志》，2册，1750元。
 - 15.《山丹县志》，1册，900元。
 - 16.《庄浪县志》，1册，900元。

- 17.《正宁县志》，1册，900元。
- 18.《两当县志》，1册，600元。
- 19.《华亭县志》，1册，600元。
- 20.《清水县志》，1册，900元。

(二)《新修方志丛刊·边疆方志》分两辑，共有甘肃旧方志5种、8册。

第一辑有甘肃方志4种、6册：

- 1.《重修皋兰县志》，3册，2650元。
- 2.《敦煌县志》，1册，900元。
- 13.《平罗县志》，1册，600元。
- 14.《预旺县志》，1册，750元。

第二辑有甘肃方志1种、2册：

- 1.《宁夏志》，2册，1750元。

(作者单位：正宁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上接第20页)

《麦积山石窟志》民国三十年(1941)冯国瑞纂；要览类有《甘肃要览》《兰州市要览》《酒泉县要览》《康县要览》《高台县要览》《文县要览》《西固要览》《成县要览》；采访录有《临泽县志采访录》《泾川县采访新志》《陇南见闻录》；调查录有《渭源风土调查录》《永登县各项调查表》《甘肃全省调查民事习惯问题报告册》五编、《甘肃省西南部边区考察记》民国三十一年(1942)王志文著、《拉卜楞视察记》民国二十四年(1935)张文郁著、《游陇丛记》4卷，民国庚午年(1930)程先甲著、《河西见闻记》1923年，明驼著、《西行杂记》李孤帆著、《西北考察日记》2卷，顾颉刚著；地记有《徽县20年灾情记》《拉卜楞设治记》《青城记》；《甘肅杂志》民国五年(1916)，阳秋撰；以及《仇池国志》《元魏诸镇考》《兰州古今注》《陇右金石录》等。乡土志及乡土教材有朱允明私修的《甘肃乡土志稿》23章，附姓名录6卷，李含青编著的《张掖县乡土志》，及《镇原县乡土志》

《皋兰县风土志》《天水指南》《天水地名考》《天水乡土教材》《天水三字经》和《天水小志》等。共计40余种。另有《陇右方志录》《陇右方志录补》。①《天水乡土教材稿》。李天煦编于1927年。稿成后油印，标明“高级小学使用”，并在当地学校试行。本书名为教材，但资料基本上都取自方志，从编目到内容都具备方志性质。②《天水三字经》。1938年编成铅印。共4篇，28目，万余字，借用少儿蒙学读物《三字经》的形式，注入地方志内容，虽有局限，但别具匠心。③《天水小志》民国27年(1938年)由转移到天水战区的中小学教师甘肃服务团采集、编写。全志1.5万字，分沿革、舆地、气候、物产、政治、教育、工艺、金融、交通、水利、宗教、礼俗、人物、胜迹、古物等15条，条目式编写，体裁新颖。但因战时采集材料不充分，编辑时间仓促，故内容无新意。

(作者单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土地面积 42.58 万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2564.19 万人
 全省辖 14 个市州、86 个县(市)区
 全年平均气温 8.3℃,平均降水量 416.7 毫米
 全省实现生产总值 5020 亿元
 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2071.3 亿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 678.2 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 2524.3 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 1817.5 亿元
 年末城乡就业人员 1500.26 万人
 全年大口径财政收入 933.62 亿元
 一般预算收入 450.35 亿元
 一般预算支出 1790.25 亿元
 全省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452.9 亿元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8460.94 亿元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4180.24 亿元
 消费品零售总额 1618.31 亿元
 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 87.64 亿美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3909.4 元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3664.9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988.68 元
 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 11188.57 元
 全年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262.95 万人
 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 334.52 万人
 全省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 89.64 万人
 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 329.19 万人
 全年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 28 个
 全年粮食总产量 1014.6 万吨
 全年肉类总产量 88.46 万吨
 全年发电量 1027.91 亿千瓦时
 全省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周转量 1791.21 亿吨公里
 全省民用汽车保有量 1059.59 万辆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195.38 亿元
 年末固定电话用户 396.43 万户



数字甘肃 (2011年)

年末移动电话用户 1613.57 万户
 年末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到 145.63 万户
 全年国内旅游人数 5826.48 万人次
 国内旅游收入 332.57 亿元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8460.94 亿元,贷款余额 5736.20 亿元
 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8394.04 亿元,贷款余额 5468.81 亿元
 全年共有境内股票上市公司 24 家
 保费收入 140.93 亿元
 赔付额 38.20 亿元
 全年研究与实验(R&D)发展经费支出 45.2 亿元
 全省研究生教育招生 0.93 万人
 文化馆 103 个、公共图书馆 100 个、博物馆 125 个、艺术表演团体 83 个
 有卫生机构 10103 个
 医院卫生院拥有床位 8.96 万张、卫生技术人员 10.62 万人
 全省共有卫生机构 10103 个(不含村卫生室)
 全年保费收入 140.93 亿元,全年赔付额 38.20 亿元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滕辉整理)

浅论志书体例的创新

李升宝

从20世纪80年代之初开始的全国地方志编修工作,至今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首轮修志已出版的省、市、县志书达6000余种,是对全国一次大规模的地情调查。这些志书虽不全是上乘之作,但总体质量是合格或基本合格的。这是很令人欣喜的文化成果。全体方志工作者在没有系统方志理论指导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拓展视野,不仅承继着方志传统,而且还从不同方面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探索,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体例上广泛采用章节体,是旧方志所远远无法企及的。

随着改革大潮的澎湃推涌,二轮修志已进入一个亘古未有的新境界,各个领域都在革故鼎新,无以言喻,方志的各个方面也必须创新。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毛泽东曾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因此,人类总得……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朱佳木同志在第七次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也指出:“……地方志事业要繁荣要发展,同样要在前人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行。”地方志的发展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在已经形成的有较大稳定性的体例的事实面前,首轮修志比之旧志就跨越了创新的雷池,广泛采用章节体,并形成以志为主,述、记、志、传、图、表、录七体并用的新体例。二轮修志在体例上又有新的突破,出现了体例上板块条目体。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诚然是值得称道的。笔者力举创新,但不能摒弃传统的方志体例,另辟蹊径,为创新走向一个

不符实情,与方志相悖忤的极端,使创新超出了方志的本来面目,成为志书的变体,如若是这种创新则不可取。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文化改革发展……显著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这个文化当然包括方志文化,显而易见,方志文化的作用也获得了充分发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国情地情资料,为各阶层人士所利用,获得显著的社会效益。这些被广泛利用的志书,几乎是首轮修志所出版,广泛采用的体例是章节体,获得志界广泛认可。笔者翻了案头的几部志书,如天津市《河西区市志》、内蒙古《临河市志》、河北《保定南市区志》、广东《遂溪县志》、福建《福州市志》、《石狮市志》、《清流县志》等,全是章节体。这种体例的好处是:内容全面、信息量大、编列有序、方便读者。

经历了首轮修志,在第二轮修志中,许多方志工作者潜心探索,将方志文化“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去”,在探索中找出一条创新之路,冲破了传统的方志形式,寻找更适合方志内容的新形式,以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增强志书重要内容的记述,提高志书的品味。这个新形式就是板块条目体,如河南《商丘地区志续卷》、秦皇岛市、县、区志。这种形式的出现,对传统的志书体例是新的突破,也是对传统方志的挑战。据2011年第1期《湖南地方志》王广才《续志编纂应注意的有关问题(一)》文称:这种形式的好处是:“突出

特点,兼顾一般。加强综合,减少条分缕析;详独略同,彰显特点;精炼文字,压缩篇幅;便于检索,方便读者。”这种创新是不是成功之举,是否切实可行,有待社会和历史的检验。

板块条目体是否是志书表现的最好形式,是否可以替代或摒弃章节体?如何在板块条目体和章节体两者之间获得相得益彰的统一,或则能创造出更为高超的形式,以臻完善,尚没有现成答案,毕竟创新是永无止境的。板块条目体或章节体各有其利弊,并不是十全十美之不可更改的形式。志界大多同仁对如此创新的形式,未曾真正尝试。福建已出版的二轮志书只有《尤溪县志》采用几近是板块条目体,却也不全是,除标题不署以编章节目的名称之外,其余全是按编、章、节形式编排,其实是编章节体的变形,却也无可挑剔,这同样是一种创新。该志时任主编曾编写多年年鉴,将年鉴条目的形式运用到方志,是福建志体的创新与突破。

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容易受到一些质疑,或暂时不为人们所接受,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人们一时无法从传统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难免对其疑窦万千。而创新者是第一个勇于吃螃蟹的人,诚然精神可嘉。

我们党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最近,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题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挥,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积极创新。把创新精神贯穿文化创作生产全过程”。为方志体例的创新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创新不是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各地情况迥异,应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任何肯定一种或否定一种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应在继承中创新,不摒弃原有的形式,使之更臻完善,更加贴近实际,真正走出一条符合方志体例形式的创新之路,不致为旧的传统所约束。创新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进行不断地探索,反复地验证。即使取得了经验,仍然有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决不能摒弃传统,一哄而起,一刀切,对传统形式予以全盘否定。

方志体例的创新应坚持“纵不断线、横不缺

项”、“述而不论”的总原则,不能标新立异、改变方志的本质属性,将方志“创新”为不是方志志体的另一种文化产品。这不是给创新戴上紧箍咒,而是必须实事求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超越实际。创新不是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暴烈行动,应是稳妥有序的进行,真正走出前无古人之路,首轮修志体例的创新就走出了这一步,并获得志界广泛认可,且付诸实践,经得起社会的检验。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也借鉴采用了方志章节体的形式。《地方志工作条例》阐明:地方志书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传统理所当然包括志书的体例。如果否定传统的志书体例,用另一种形式来编纂方志是否可行,需值得探讨。笔者认为,体例的创新应该是:1、可操作性,使之更便于操作;2、继承传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3、便于利用,更好的为经济社会发展及各界人士之利用;4、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5、中指组对体例如何创新应加强指导。创新是无止境的,唯有创新,才能增强方志的活力,激发方志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在方志园苑绽放绚丽的花朵。

(作者单位: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地方志办公室)



地方志应重视对寺庙的记述

陈启生

寺庙，这里泛指除清真寺和藏传佛教寺院以外的祠庙、道观和佛寺。千百年来，遍布城乡各地的大小寺庙，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伦理规范、行为准则、价值取向，无不自觉或不自觉地渗入寺庙文化所传承的儒、释、道传统文化的各种因素。同时，作为传统文化的客观存在形态和旅游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寺庙无论在各地社会的经济生活还是精神文化生活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寺庙及寺庙文化的存在形式与表现状况，是当地社会地情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地方志应该和需要记述的重要内容；如果缺失，志书反映的当地地情就不完善、不准确，从而志书的科学性就会受到影响。正如民国陇上著名学者慕寿祺在《重修镇原县志》中所说：“道观佛寺，关系社会信仰最深，不得会使之也”。^①

由于较长时期以来社会上往往把寺庙与所谓封建迷信活动相联系的历史原因，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首轮新方志编修中，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各地志书对寺庙普遍采取回避态度，基本上没有记述。二轮修志中，少数志书将一些著名寺院作为旅游景点作简要介绍外，多数志书仍然没有对寺庙从整体上进行全面系统地记述。笔者认为，这一状况需要改变，志书应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对寺庙文化进行全面完整地记述，这不仅是新编地

方志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全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进一步传承弘扬优秀文化的时代要求。

寺庙是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载体

中国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说就是以儒家为主的儒、释、道文化体系。在现代各种传媒载体报纸、电影、电视、网络等等远未出现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无论是儒家思想文化，还是道、佛思想文化，其传承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基本上都是依靠寺庙实现的，即使传媒发达到前所未有的今天，寺庙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特殊作用也仍然没有哪种新的媒体所能代替。这是不争的事实。

历史上，儒家文化的传承载体有两类：一类是儒学（儿童启蒙性质的私塾和社学为其基础阶段）和书院，另一类则是以供奉实践儒家思想文化的典范而被尊为神进行祭祀的各类杰出人物的神庙。儒学和书院学术层次高，具有主导和引领性质，但数量有限，入学人数少，远不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基层民众。如清光绪时阶州（今武都）仅一所儒学。学生不足60名；阶州所属文县、成县亦各仅一所儒学，学生均不足40名。元代始于各路、州、府设立书院，至清末也尚未普及到县，相当数量的州、县没有建立过书院。各府、州、县仅有的一所儒学，实际上也是学校和神庙的结合，即为庙学，和佛寺、道观在传承思想文化的

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地方志往往将儒学和孔庙作为同一事物进行记述,如明嘉靖《庆阳府志》所记学校即为:文庙大成殿、启圣祠、名宦公贤祠及儒学的明伦堂、斋房、公府、生舍和经书库等。而清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的图表中则将学校作为文庙组成部分直接绘入文庙图中,题图曰“文庙图”,而不是“学校图”。

神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山、水、风、雷等自然现象包括动植物被人格化尊崇供奉的自然神之庙,另一类则是生前功德卓著或懿范垂世令人敬仰纪念而立庙供奉的人的祠庙,而后一类又是神庙的主体。如兰州和天水的城隍纪信、西和城隍陈寅、定西城隍文天祥、礼县岐山庙的诸葛亮、洮岷地区的常遇春、李文忠等等。道教虽产生于东汉,但尊老子为始祖,以《道德经》为根本经典,而作为道教活动场所和道家思想文化的基本阵地的道观,所供之神非常庞杂,但以老子及所谓“一气化三清”的“三清”和道教修行有大成就者“八仙”、方位神真武大帝、山狱神东岳大帝等等为主。道教诸神,是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结合等基本思想理念和精神追求的集中人格化的体现。佛教虽为印度传入的外来宗教,但经千百年传扬发展,汉传佛教已与传统儒、道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共同组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民间所说的“三教合一”,这在中小型寺庙中反应尤其明显。和祠庙、道观一样,佛寺是佛教活动的中心,也是佛教文化向社会传播的基本场所,所供诸佛、菩萨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及佛学修行有大成就者,诸护法神则为自然神和方位神,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寺庙逐渐成为人们参与各种社会精神文化活动不可或缺的有时甚至是最主要的场所。正因如此,寺庙的修建保护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寺庙的活动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方面。西北地区“塞外虽两三家,村必一庙,庙皆祀关神武,香火之盛,盖接于西海云”^②。《甘肃省志·宗教志》载,新中国成立前夕,甘肃各地有大小道教宫观 1054 处,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省共有佛教寺院 4396 座。“通渭县的寺庙建筑,据清末的有关记载,全县境内共有大小

庙宇 320 多处”^③尤其是“忠”、“义”典范的关羽的祠庙,遍布各地,至清中叶,“全国各地有关帝庙 30 余万座,仅北京就有 116 座”^④,甘肃也是无处不有。正是这些重要的神庙、道观、佛寺,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修道养德”、“天人合一”,佛家的“四谛”、“八正道”、“因果报应”等思想理念及儒、释、道共同的慈悲为怀、与人为善、爱惜生灵、崇敬自然等等信仰和观念传播到社会各个层面,不断加深和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与文化心理的认同。值得指出的是,宋以后随着儒、释、道思想文化的逐渐融合,寺庙方面也普遍出现了“三教合一”趋势,不少民间寺、庙、观及所供奉的神像中及信仰理念中,将神、佛、仙日益等同,一体敬奉,从而将儒、释、道思想文化一体传承散布。正是通过朝拜、观礼、游览和参与祭祀、庙会等寺庙活动,使一代又一代不分男女老幼的社会各方面的人们都自觉不自觉的接触、了解、接受儒、释、道融合为一体的传统文化,从而使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和人生理念等实现了大众化、普及化和具体化的传承普及过程。

寺庙都具有文物价值

从本质上说,所有寺庙及其祭祀和庙会活动都是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均具有文物价值,应该受到珍视和保护。

寺庙建筑及寺庙内的塑像、壁画、碑刻、楹联、钟鼎(炉)包括寺庙内外的古树名木,使每一座寺庙组成一处内容丰富的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保护单位。就甘肃而言,包括石窟寺在内,曾被正式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莫高窟,有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麦积山石窟、伏羲庙、武威文庙、张掖大佛寺等等,还有各地众多的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寺庙。除了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保护的寺庙外,仍有为数不少的未列入被各级政府公布为保护单位的规模较小的寺庙,只是目前尚未推行这样的做法而已。因为,无论是哪一级保护的文物保护单位,与未列入保护级别的寺

庙之间,只有文物价值及与之相适应的受保护级别的差异,而无性质上的不同,所以,应该是不存在疑义的。

具体地说,无论规模庞大的寺庙建筑群,还是规模较小的一般寺庙,都是传统文化的荟萃,集中体现和传承着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多彩层面和深厚内涵。一是建筑。就甘肃来说,寺庙从山门到宫、殿、堂、亭、廊,不管硬山顶、歇山顶、悬山顶、卷棚顶、尖角顶,单檐或重檐,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是当地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是当时当地建筑艺术水平的体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同时,相当一部分寺庙都建有庙会活动的戏楼,这些戏楼既是传统演艺场馆的典型形式,更是社会公众娱乐中心,在公众社会心理接受传统文化熏陶濡染中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如甘谷县新中国建立之前,“主要演出场所有县城西街城隍庙戏楼、北街关帝庙戏楼、报恩寺戏台、山陕会馆戏台、大像山(寺庙)戏台、天门山戏台、姚庄戏台、亮江寺戏台、蔡家寺戏台等”^⑥。二是雕塑和绘画。寺庙里的神、仙雕塑,不管是泥塑、石刻还是钢铸,都是当地当时人物形象艺术代表作,融艺术性、观赏性及集中体现神、佛正义、善良、威武等形象的象征性于一体,给人们以鼓舞、激励和启迪,一座寺庙就是一座正面人物的塑像馆。寺庙无论大小,都有大量的人物及神话故事壁画,以形象直观的表现形式将惩恶扬善、行善尽孝、忠义诚信等思想观念展示出来,既产生度化人心的积极作用,又是提供给公众的绘画展览,保存了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民间传统美术作品。三是钟、鼎(炉)。寺庙中的铜(铁)钟、铜(铁)鼎(炉),不但器形大、铸造时间久远、工艺考究,而且均有相应的记事铭文,不但具有文物价值,而且本身就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如被列为省级文物的就有宁县普照寺铜钟、大铁钟,庆城县慈云寺女真文铁钟,泾川县大钟,灵台县明昌铁钟,崆峒区天圣铁钟,兰州五泉山金泰和钟,武威市大云寺铜钟等等。四是碑刻。寺庙中有大量的碑刻,或记寺庙修建经历,或记寺庙的兴废盛衰,或记当地重大事件及地方历史变迁,其

文字往往出自当时当地名家之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是宝贵的艺术珍品。如列入省级文物保护的就有正宁承天观石碑,庆城县天庆观老子道德经石幢及有宋范韩二公祠堂纪念碑,泾川县南石窟寺石碑,崆峒区经幢,礼县大元赵孟頫书雍古氏家庙碑,武威文庙西夏碑及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等等。五是牌匾、楹联。各地寺庙中众多的牌匾、楹联,均出自历代名家之手,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历来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也对公众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仅天水市境内的伏羲庙、玉泉观、秦安泰山庙、兴国寺等寺庙就有明代张三丰、胡璘宗、甘茹,清代王了望、杨应琚、黄成采、牛运震、安维峻、苏统武及现代任承允、齐白石、冯玉祥、郭沫若、沙孟海、冯国瑞、谢稚柳、赵朴初、启功等众多名人的牌匾及楹联多幅。兰州市及周边地区寺庙中则保留不少左宗棠、刘尔忻等名人题写的牌匾、楹联。各地寺庙亦均如此,无不是历代名人名家的汇集之所。

寺庙也是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场所。祠庙的祭祀和寺、观的法会、诵经等宗教活动中,蕴含着大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一是祭祀庆典。如天水伏羲庙伏羲祭祀庆典,是传统祭祀庆典的代表性祭祀活动,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在海内外都具有深远影响,祭祀的规模、程式、内容等等从多方面展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精神内涵。二是庙会。寺庙在社会上影响所及范围最广的,当属庙会。正如《平凉市志》在《民俗》中所记述的:“每村都有自己的庙宇和依据庙内供奉神祇而特定的祭祀日。庙会一般三至七日。会期,亦多请戏班唱戏酬神,更是物资交流、人际交往的极好时日”^⑥规模较大的庙会,都是集祭祀庆典、戏剧和曲艺演出、群众娱乐及物资交流为一体,如著名的“花儿”最大规模演唱活动在洮湫河湟地区,正是庙会活动的一部分。庙会也就是“花儿”演唱会,岷县古历五月十七二郎山和临潭六月六莲花山“花儿”会,参与活动的群众往往达到数万,其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文化

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又如临潭的龙神赛会，“历时 500 多年经久不衰。每年的龙神赛会吸引全县十多个乡（镇）和卓尼、康乐、夏河、临洮、岷县、和政、临夏、迭部（会川）、渭源等十多个县，参加人数达六七万人，参会民族除汉族外，还有回族、藏族、土族等”^②。三是艺术。寺庙的各种活动中，保存和传承着丰富的文字、音乐、舞蹈等方面的艺术遗产。古乐府诗歌中，郊祀歌乐占有重要地位，而郊祀歌乐就是“古人拜祭尊奉上帝、祖先的乐歌。”^③由佛经通俗化形式的变文发展而成的民间所称“小经”目连卷、泰山卷等说唱艺术“河州财宝神”、“凉州宝卷”等成为民间久传不息的地方艺术奇葩，在多种场合和各地广泛传唱，是甘肃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陇西的“云阳板”、岷县的“尕巴舞”等祭祀舞蹈都被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由道教演唱艺术“道情”孕育产生的陇剧，是甘肃特有的地方剧种。而道教音乐、佛教音乐，则是至今仍广泛传承的真正的古典音乐。四是有些祭祀活动中保留了远古人类社会活动的遗迹，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洮岷地区保留至今的清明节祭山神时，将煮熟的牛、羊肉祭过山神后按在现场者人均平等的分发一份的仪式，正是马克思在科瓦列夫斯基《村社土地所有制及其瓦解的过程》一书《摘要》中曾指出的每人均等的一份的原始社会食物分配方式的具体残留。又如甘南、陇南边远山区个别地方至今残存的向神“告状”、“下油锅”等民事纠纷中当事双方求神判处的“神判”现象，就是人类社会早期审判史上的“神判”遗留，是司法审判史上难得一见的活化石。

寺庙是旅游业的基础性资源

旅游业作为社会活动，历史上早已存在，但发展为一项产业，是社会经济发达到相当程度的结果。但不管是非产业时代还是形成产业的今天，旅游的前提和基础是要有可供人观赏的景观景点，否则旅游就无从说起。在我国，寺庙则是旅游景观景点中分布最多最普遍从而显得最为重要的一部

分内容，是旅游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性资源。

寺庙是人文景观中的主体内容。前已述及，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寺庙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艺术馆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习馆，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各阶层、各方面人们共同崇尚并前往朝拜、祭祀、瞻仰、观赏的神圣之地。而旅游成为社会经济主要产业的今天，寺庙作为旅游业的基础性资源，其地位和作用显得尤为突出。不难设想，如果缺失了寺庙这一部分资源，我们的旅游业将会是什么状况。在甘肃，从全省到各市州及县区，寺庙都是人文资源的主体。敦煌莫高窟、肃南文殊寺、马蹄寺，张掖大佛寺、武威文庙、海藏寺，永靖炳灵寺，兰州五泉山卧佛寺、白塔山法雨寺，定西西岩寺，天水伏羲庙、玉泉观、麦积山，武山拉梢寺，甘谷大象山寺庙群，礼县祁山堡武侯祠，成县杜公祠，泾川王母宫，庆阳周祖庙、北石窟寺等等正是支撑甘肃旅游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局部说，每一座县城甚至较大的乡镇，可供游览观赏的景观中几乎都有一处或几处是寺庙，特别是关帝庙、泰山庙和文庙。在相当一部分市、县，如果没有了寺庙，也就没有人文景观可言。寺庙所在地均为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的名胜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而“天下名山僧占多”。古人的这些名言正是寺庙与风景名胜相互映衬、融为一体的真实写照，或山因寺名，或寺因山显，不可分解，而风景则往往因有寺而得以保护和优化。如佛教名山普陀山、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等等，道教名山武当山、崆峒山、青城山等等，以及泰山、庐山、华山、嵩山、衡山等等名山胜地，无不是数量和规模很大的寺庙建筑群集中之处。甘肃境内，平凉崆峒山、天水麦积山、仙人崖，临潭莲花山、康乐松鸣岩、成县鸡峰山、漳县贵清山等等最重要的风景名胜地，也都是寺庙建筑群的荟集之地。正是这些寺庙建筑群赋予了所在地碧岭苍峰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广博的精神内质，从而使这些地方既有灵秀之气，也有了声望远播的较高名气。如缺失了寺庙这一基本内容，其所谓名胜就会黯然失色，这是不言而喻的。

寺庙文化是旅游文化的主题内容之一。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在中国,旅游文化从整体上说,就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而这种传承和弘扬的过程正是通过寺庙实现的。遍布各地的寺庙和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的众多寺庙建筑群,既是旅游观赏的主体内容,也是展现传播我国儒释道思想文化的主体渠道和形式,因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在各地又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特点,从而,使各地旅游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展现出千姿百态、绚烂多彩的局面,不断推动旅游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地发展壮大。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人们不管社会哪个阶层,也不分男女老幼,对于寺庙无不心存崇尚和敬畏,而这种崇尚和敬畏的心理实质上就是对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历史及先祖的崇尚和敬畏,是对传统文化价值观、人生观和伦理道德观的认同。因此,进入寺庙,人们总会有亲切感、安全感和强烈的归属感。这种感受,正是对家乡、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的体现。也正是这种情感因素的存在,人们对同一寺庙或同一名胜,也常是多次前往而乐此不疲。著名的佛教、道教名山,千百年来香火不断,万人朝拜,年年岁岁,人山人海,成为旅游奇观。这也应是我国旅游的一大特色,亦即寺庙文化的力量。

寺庙是历代方志记述的重要内容之一

鉴于寺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历代志书都将其作为重要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记述,不仅在专志中设祠祀和寺观等专门部类,而且在艺文中收录大量有关寺庙的碑文和诗词,并对具有重大影响的寺庙和寺庙碑刻独立编修专门志书,如《崆峒山志》《伏羲庙志》等。

早在宋代,程大昌在《雍录》第七卷中设《秦汉五峙》、第十卷中设《寺观》类目,而《寺观》中具体记述了西安、咸阳一带的慈恩寺、感业寺、荐福寺、香积寺、安国寺、兴唐观、兴唐寺、太清宫、太微

宫、紫极宫、唐昌宫、兴圣尼寺、崇德坊、崇圣尼寺等寺观。

元代的《元一统志》则将寺观作为《古迹》重要内容进行记述,如成州《古迹》中的大云寺、甘露寺、吉祥寺、凤凰寺、龙洞寺、常寂院、弥勒院、法云寺、胜仙寺、华藏院、五仙观、汉武帝庙、雷公庙、汉高祖庙、旌忠庙等 15 处寺庙均有较详记述。如记大云寺:有碑,在凤凰山上。去州七里。创始莫考。殿后崖上有刻字云:汉永平十二年重修,寺主广昌记。又经阁崖上刻云:梁大同九年。按永平年号,是时佛法传入中国,不同可疑。

明代,不论省府州县志还是全国一统志,对寺庙记述都更为重视。《大明一统志》中,将寺观、祠庙与山川、风俗、公署、名宦、人物等条目平列,如巩昌府《寺观》中即记有万寿寺、崇福寺、报恩寺、宝泉寺、兴教寺、会福寺、崇宁寺、瑞应寺、大佛峡寺、兴古寺、安国寺、清凉寺、普觉寺、观音寺、法林寺、圣寿院、万寿观、玄都寺、玉泉观、柏林观、玉皇观、集体观等 22 座寺观,《祠庙》中则记有女娲庙、汉高祖庙、汉武帝庙、唐公庙、尉迟敬德庙、杜甫祠、文王祠、忠烈祠、旌忠庙等 9 座祠庙。

明以后,将祠庙、寺观与建置、户口、田赋、风俗、山川并列为类目进行记述,在地方志中渐趋定型。如嘉靖《陕西通志》第 36 卷为《仙释·寺观》专卷,与田赋、物产、职官、水利、兵防等类目平列,记述了当时平凉府、巩昌府、临洮府、庆阳府及驻甘州的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所属河西甘、肃、凉、庄浪诸卫即今甘肃境内寺观 139 座,其中平凉府 23 座,巩昌府 47 座,临洮府 24 座,庆阳府 18 座,甘、肃、凉、庄浪等卫 27 座。嘉靖重修《庆阳府志》第 19 卷《祀典》所记庆阳府及所辖各县寺庙达 77 座。崇祯《成县新志》第四卷中,记述各类寺庙 20 座,其中有“轩辕庙,在县西”;“唐公庙,在凤凰山上”。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一如明代一统志和地方志,将祠庙、寺观列为两个类目记述,如秦州“祠庙记有门尚书祠、武侯祠(州西玉泉观内)、营平侯祠、武安君祠、武侯祠(礼县祁山堡)”、忠烈祠、杜

工部祠、怒特祠、张公祠、汉高祖庙、鄂公祠、名将庙、太昊庙(有二:一在州山西关城内,一在州北三阳川)、女娲庙、汉光武庙 16 座。“寺观”记有瑞应寺、灵应寺、崇安寺、兴国寺(在秦安)、青岩寺、月台寺、古泉寺、圣泉寺、正觉寺、翠峰寺、兴福寺、广福寺、龙兴寺、三泉寺、真空寺、铁山寺、普福寺、福兴寺、宏化寺、庆寿寺、永昌寺、红崖寺、鸿仁寺、鱼池寺、野林寺、云平寺、莲花寺、云坪寺、亮池寺、香泉寺、兴国寺(在两当)、铁佛寺、柏林寺、九龙寺、红崖观、洞阳观、三台观、迎旭观、真武观、集体观、圣善院等 41 座。清康熙《阶州志》“庙坛”收录了文庙、城隍庙、社稷坛、风云雷雨坛、土地祠、启圣祠、名宦祠、乡贤祠、文昌宫、通济祠、五显祠、普光寺、万寿寺、三官殿、延寿寺、龙山寺、寿台寺、江南寺、新寺、广廉院、赤砂庙、熊池庙等 22 座。清顺治《重刊甘镇志》“祠祀(寺观附)”中,记述各类祠庙 45 座,寺观 28 座,对重要寺庙记述尤为详尽,如忠武王庙:“(在)城西南隅。元季兵燹,洪武中重建。旧碑载神乃西夏土主,祷无不应。姓氏封爵无考。天顺中,太监蒙泰重修。定襄伯郭登有记,其略曰:城西南隅有古祠,载祀明神曰护国忠武王。其徽号之崇,闕宫之设,不知始于何时,志典缺文,漫无可考。神以羊首饰冠,朱衣端笏,仙姝吏兵执杖、戟、斋、斧,列侍左右。惟其容貌佛异,遂致流俗怪诞,鼓辞相煽,端人病焉。”^①

民国时期地方志在篇目设置和记述内容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变化,但对寺庙的记述,一如明、清陈例,并且更加详尽。民国 12 年(1923 年)《徽县新志》卷二《建置志》中,分别设“庙记”、“坛遗”、“寺观”三节,记祠庙 21 座,坛遗 6 处,寺观 30 座。民国 15 年(1926 年)《创修渭源县志》全志 10 卷,而第四卷即为《祠祀志》专卷,分“坛庙”、“寺观”两节集中记述,共记坛 5 处,庙 42 座,寺观 19 座。其“坛庙”下又分设“典礼”、“仪注”等目,对祭祀的祭器、祭品、程序、仪式、乐章等进行详细记载,如文、武庙祭祀“乐章”中的“迎神乐”:咸平之章,无舞;“初献乐”:宁平之章,有舞;“亚献乐”:安平之章,有舞;“终献乐”:景平之章,有舞;“撤饌乐”:咸平

之章,无舞;“辞神乐”:咸平之章,无舞。同时,又记有“乐器”和“乐谱”,及祭祀乐队的人员组成:乐舞生九十一名,礼生二十八名,纠仪官一名。民国 34 年(1945 年)《靖远县新志》《寺观》所记寺庙达 134 座,其中关帝庙、真武庙、龙王庙各有多座。

历代志书《艺文》卷中,有关寺庙内容的占有很大比重。清光绪《肃州新志》《艺文》中所收录 35 篇记、序文中,记述寺庙就有 19 篇。清道光《靖远县志》卷六《碑记》16 篇中,寺庙内容的有 9 篇。道光《会宁县志》《艺文》15 篇碑记中,7 篇为寺庙内容。民国 22 年(1933 年)《礼县志》《艺文》中所收碑记类 25 篇,寺庙内容的有 17 篇;而所收诗歌中,有关祁山堡武侯祠和翠峰寺的共有 24 首,约占所收诗歌总数的一半。

①2002 年镇原县影印兰州俊华印书馆民国 24 年(1935 年)版《重修镇原县志》卷首,“佑德观”照片说明

②清洪亮吉《天山客话》,见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杨建新编西北史地资料丛书《古西行记选注》第 381 页

③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7 年版《人文定西·民俗风情》第 25 页

④《光明日报》2011 年 10 月 19 日《文荟》栏蒋子龙《关羽,真神》

⑤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 年版,《甘谷县志》第 476 页

⑥中华书局 1996 年版《平凉市志》第 690 页

⑦阙岳《庙会·集会·娱神·娱人——对临潭新城镇龙神赛会的考察》,见学苑出版社 2010 年版《西北少数民族仪式考察》第 169 页

⑧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王福利《郊庙燕射歌辞研究》第 3 页

⑨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6 年版张志纯等校点《重刊甘镇志》第 187—188 页

(作者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原副主任)

地方志资源对城市经济建设的作用

张 兰

甘州,是一个历史文化古城,不仅是一处人类生存的美好乐园,亦是一座社会演进的历史舞台。从汉朝到当代的两千多年间,历代王朝和地方政权都在这里布防建制、设关守隘,成为锁控四方的军事重镇和庶民兴邦的政务要地。

一、甘州历史经济发展带来的启示

历史是在不断地演绎中前进的,但有时历史又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翻开现存的史志,无不使人惊叹:当我们做一些自认为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的时候,却发现有些所谓的“开创之业”,实际上在地方志中早就记载祖辈们也曾经做过。他们的历史痕迹留给了我们许多成功的经验和不少的教训。

(一)移民屯田,加速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甘州是平卧在河西走廊中部沙漠中的一块绿洲,自古以来就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史载,从汉代开始,国家就不断从中原移民甘州,随之带来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社会文化,促进了甘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回顾历史,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甘州的经济曾有过辉煌,也曾留下许多缺憾。两汉时期,汉王朝戡定匈奴,开通丝绸之路,设立河西四郡。甘州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极为落后,王朝实行从中原大量移民甘州,实施军屯垦荒,兴修水利,加强中西贸易,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大力发展畜牧业等措施。这些措施的实行,为甘州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更有效促进了甘州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水平迈上新的台阶。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年),西晋王朝任命张轨为凉州刺史,张轨一上任,就充分发挥他率军打仗、执政理民的才略。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平息边境少数民族起事,使凉州边境处在安定之中。他尤其重视农牧业发展,生产大有推进,《西河纪事》中记载:“凉州畜牧为天下饶。”当时在张掖就建有几个广大而

优良的牧场,畜牧业在河西走廊占据突出优势。沮渠蒙逊(368—433年)是张掖临松(今民乐县南古镇)卢水胡(匈奴族)人。他是匈奴中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曾统治经略河西近40年,影响深远。他的汉文化程度高,博学多艺,青年时期“博涉群史,颇晓天文”,是十六国时期北凉国的建立者。公元410年,沮渠蒙逊被北凉的一些上层人士拥戴为大将军、大都督、凉州牧、张掖公,他改元为“永安”,建都张掖(今甘州),行使北凉的统治政权。412年,迁都姑藏(今武威凉州区),称“河西王”。420年,沮渠蒙逊又灭西凉,疆域大为扩张,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一带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在他统治北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全面的发展,他尤其尊重儒士,深得士大夫拥戴;笃信佛教,厚待高僧,翻译佛经,兴建寺塔,这对安定社会,缓和矛盾,促进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西魏时,统治者注重农业生产,甘州的农业得到长足发展。西魏后期,东、西方交通畅通,丝路贸易繁荣,甘州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因而极易得利,甘州的经济由此得到发展。唐朝初期,战乱频繁,甘州作为当时的屯田重地,是农业生产的大后方。唐王朝于此地大力发展农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稻丰收稔,积军粮数十年”,是当时的景况。甘州地广人稀,拥有优越的自然资源,成为当时的粮仓。陈子昂上武后书中说:“甘州所积四十万斛……地广粟多……屯田广夷,仓夷丰衍。”又说:“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沃壤,常不减二十万。”到唐朝中期,已是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甘州的文化同样得到了发展,唐时的《教坊记》杂曲中,就有甘州的《甘州子》和《北庭子》。可见甘州在政治、军事、文化、农业、畜牧业等方面都处于十分领先的地位。民国十九

年(1930年),甘州被国民党占领,从此,外侵内战,自然经济受到严重摧残,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的压迫,使广大农民不得不向地主老财借债谋生。于是出现了高利贷。高利贷是多种形式的借贷方式,谁只要落入高利贷的网络之中,从此便无法挣扎走出,常常是身不由己,甚至家破人亡。1949年9月19日,甘州解放,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二)历史经济发展的启示

今日的甘州,是由历史的甘州发展演变而来的。历朝诸代的祖辈们在这块热土上播撒了汗水,留下了不朽的丰功伟业,也留下了许多无法弥补的遗憾。今天,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些无形的遗产加以研究、总结,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将为我们开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先,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无论是西汉抗击匈奴、统领西域,还是五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纷争,隋唐平定吐谷浑,召开27国博览会,以至明清时期安抚鞑鞑,每一次的征战,无不着眼于社会的稳定,人民生活太平安康。甘州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有汉、回、蒙古、满、藏、裕固、朝鲜、土、壮、东乡、布依、锡伯、撒拉、苗、土家、维吾尔、彝、侗、高山、达斡尔等22个民族。社会安定的前提,是民族之间的和谐稳定。因而,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妥善化解民族之间的矛盾,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其次,制定符合实际的规划目标,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矛盾,随着历史的不断推移,社会矛盾也会逐步得到解决。但是,自然、地理、人文是不会改变的,不同时期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目标,将会加速经济发展。历史上的移民屯田是一大经济策略,进入新世纪,西部大开发,是中央的又一大政方针,同时,给甘州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枯木逢春的机遇。甘州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区,地势是“两山夹一川”,南依祁连山,北靠合黎山,两山之间是宽阔平坦的张掖盆地。境内海拔最高为3633米(东大山),最低为1410米(乌江镇),城区海拔为1474米,近千米的海拔落差,形成了多元化生产格局。根据本地

实际,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调整产业结构,甘州区制定出“发展抓项目、增效抓龙头、增收抓产业”的思路,突出抓好“两提、两出”(产业化水平提高和农民素质提升、农产品销出去和农民走出去),实施支农惠农政策,加大农业投入,使甘州的经济走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再次,水利开发建设是甘州经济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甘州地处甘肃省西北部,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穿境而过。由于黑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地处内陆干旱区,降雨量少,蒸发量大,甘州区年平均降雨量为127.5毫米,年平均蒸发量为2047毫米。随着黑河流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口的急剧增长,过度开垦荒地草场,使下游流域内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植物枯竭,草原逐渐沙漠化、荒漠化。因而,少雨、高温、干旱、沙尘天气逐年增加。据调查,沙尘的来源之一就是黑河下游的额济纳,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沙起额济纳》对黑河流域水资源的状况进行了报道。从此,黑河流域综合治理提到了国务院的议事日程,甘州在与额济纳的分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黑河水集中下泄成为甘州人民无法回避的事实。每年,甘州区在黑河干流实施“全线闭口,集中下泄”,将黑河水全部集中流入荒漠化的额济纳,使居延海重显碧波,甘州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甘州也相应制定了各种措施、制度,全面科学地实行节水型灌溉,让有限的水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

二、挖掘地方志资源,为本地经济建设服务

(一)地方志资源的优势

甘州拥有古今丰赡的地方志资源,储存着大量的信息,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在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今天,一个挖掘抢救整理旧志,编纂出版新志,依志编写地情资料的热潮正在甘州兴起。如何让地方志资源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成为我们地方志工作者探索的一个主要课题。在浩瀚的地情资源海洋里,我们不断挖掘资源优势,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的资料保证。

1、城市湿地资源。甘州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南祁连山,北合黎山,两山之间是宽广平坦的张掖盆地,是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得天独厚的绿洲。这里自古以来气候温和,自然资源丰富,地理条件优越。由于终年受着祁连山雪水

和黑河水的滋养,再加上近千米的海拔落差,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泉水喷涌、池塘遍布的自然境域。古时候的甘州城到处都是溪水潺潺、苇湖连片。据《张掖市志》记载:在明清时期,甘州芦苇最多,达到2万多亩,现仅剩300多亩芦苇。正因为有了历史丰硕的记录和现实遗影的落差对照,甘州区委、区政府提出了“保护甘州湿地,建设生态甘州”的目标,将湿地保护工程列为甘州“十大工程”第一位,让建设生态甘州,保护黑河湿地成为城市化建设的主旋律,芦苇这个甘州的特色文化符号也深深印在了每一个甘州人民的心中,甘州,也因有了湿地而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2、黑河流域资源。黑河,古称“弱水”。全长821公里,流域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是全国第二大内陆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和神秘的故事。周穆王西巡弱水、大禹治理黑河、老子与流沙、霍去病为黑河起名、西游记与黑河等,对黑河传说的挖掘,是旅游业取之不尽的财富。

(二)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

早在4000多年以前,甘州大地上就有先民繁衍生息的痕迹,是华夏灿烂的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甘州,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孕育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辖域内本籍有十六国时期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唐朝宰相赵武孟、诗人赵彦昭、乌氏武将父子乌承玘、乌承恩与乌重胤、甘州回鹘国可汗庞特勤,其子孙13代连任,清代反清将军米喇印、父子三诗人陈史与陈秀全、陈秀勤等。客籍有张掖属国都尉窦融、治乱廉臣邓训、北凉国师昙无讖、隋驻张经略西域特使裴矩、清代理政精英杨博、建设功臣石茂华、跻身紫光阁的田大武、救护红军的高金城等等。本、客两籍贤达俊秀,都为甘州的建设做出铭刻历史的贡献,谱写出辉煌壮丽的篇章。甘州历史悠久,区境内分布着闻名遐迩的历史景观与名胜古迹,张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丹霞地貌、汉明长城及烽燧、古墓葬、古寺塔、古庙宇、清代会馆、钟鼓楼、黑水国遗址等。优越的人文、历史、自然资源,为我们开发、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甘州区先后出版发行了旅游文化丛书《甘州史话》、《甘州区年鉴》、《悦读甘州》、《图说张掖未解之迷》、《甘州文史》等数10种,丛书

的出版,为弘扬甘州历史文化和社会各界了解、认识甘州,为领导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读志、用志发挥的作用

1、为领导决策发挥作用。为了使领导了解区情,科学决策,我们向各级领导提供了《甘州府志》、《甘镇志》、《新修张掖县志》、《张掖市志》、《甘州区年鉴》等史志资料,使领导在作出决策、论断时翻阅地方志相关资料,从而节省了调查论证的时间和经费,并且更加深刻地领会了地理、历史、人文等相关内容,为各项决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在争取项目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提供技术指导、在甘州区规划建设的国家绿洲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基地,是为建立健全完善的与张掖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规划用5年的时间,建成一个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绿洲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区,以此推动全市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建立,形成辐射带动周边的示范推广新格局。在项目规划期内,甘州区地方志办公室积极主动的承担起甘州区情、甘州人文、历史、地理概况等相关资料的撰写和收集整理,并提供了丰富的地情资料,使该项目的专家组了解了甘州的地情、人文、地域特点,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项目组的一致好评。在申报争取黑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筹建张掖火电厂、张掖湿地公园、城市沙漠公园、老城区(大佛寺、明粮仓、总兵府、钟鼓楼)景区开发、甘州府城、大佛寺文化广场、东大山国际狩猎场、金城烈士纪念馆、福音堂医院维修及保护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项目中,地方志在地情资源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为甘州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三、挖掘地方志资源,树立旅游文化品牌意识

甘州有独特自然生态景观,有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遗迹,有胜似江南的鱼村水乡泽国,更有无以伦比的荒漠戈壁丹霞。历代外籍文人贤哲远游甘州之后,无不为此地胜景抒写稽留千古的绝句:“风景江南似,人家塞北嬉”、“转到甘州开口笑,错认江南”、“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江南”、“塞外江南豆麦肥,桃花红泛古甘州”、“小满梨香飘四海,乌江鱼米赛江南”、“形胜河西第一州,游

人解道江南好”。这些美言佳句是异客异时由感而发的同一心声——甘州是千里河西的“塞上江南”。正因为有如此丰富的记载，甘州区在挖掘旅游资源中，地方志工作无不渗透在每一个项目、每一个环节中。

一个地方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情资源，是旅游发展的重要条件，挖掘和开发地情资源，对旅游业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甘州区组织地方史志人员，深入挖掘甘州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佛教文化资源，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和生态文化资源进行了采掘，对甘州的自然、人文、历史、文化、民俗等方面的地情资料进行考证研究，充分挖掘出有特色、有影响、有价值的地情资料，全面系统的进行了有效整合，形成了一套有特色的资源体系，打造出了甘州独有的整体品牌。构建丝绸之路甘州文化产业园、大佛寺景区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相继举办了“湿地之夏·金张掖旅游文化艺术节”、“张掖大佛寺旅游文化庙会”、城市湿地公园“三月三湿地风筝节”、大佛寺文化广场“九月九老人菊花会”等活动，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为正确定位旅游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张掖市委、市政府根据甘州特有的历史文化特点，制定了“生态旅游强市、文化旅游名市、旅游产业大市”的工作目标，依托甘州丰富而独特的旅游文化资源，打造出以《张国臂掖》为代表的地方文化精品，“拜第一卧佛、游张掖湿地、赴沙漠探险、看甘州乐舞”的旅游品牌。借助文物古迹优势资源，对总兵府、山西会馆、钟鼓楼、明粮仓等文物遗迹进行了保护与开发，重现古城历史风貌，形成资源聚集优势，打造以四处遗迹为代表的文物古迹景区，以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为代表的自然生态景区。《平山湖蒙古族乡志》，详细记载了平山湖乡的蒙古族风情、神奇的丹霞地貌、神秘的东大山自热资源以及特有的人文、历史、地理、地貌，全志蕴含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在甘州区成功举办“2011年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中，平山湖作为主赛场，与地方志资源的宣传推介是分不开的。

四、地方志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城市建设

甘州是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孕育了极富魅力的地域特色。一个

文化资源很深的地方，必然便充满活力和灵气，文化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地方志资源的挖掘开发与城市建设的互动交融也日益加深。

(一)把甘州历史文化资源融入宜居城市建设之中

当前，着眼于推动城市化发展功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更加有效地发挥地方志资源的引领功能，使之更加有效地服务城市建设发展，把甘州历史文化资源融入宜居城市建设之中。围绕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促进甘州历史资源与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让城市规划富含文化元素，让城市建设凸显人文内涵，让城市管理体现人文情怀。近年来，甘州区不断完善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景观规划，建设集商务会展、教育科研、休闲旅游、生态居住于一体的滨河新区，坚持新区与主城区协调同步发展，科学规划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功能定位及产业布局。为保护好老城区文化遗产和风景名胜资源，用生态建设引领发展方向，以建设生态经济示范区为目标，以滨河新区和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张掖城市湿地公园建设为重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打造出以“湿地”为主题的宜居城市。

(二)把甘州历史文化资源融入文明城市创建之中

文明城市是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以三个文明创建为载体，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充分展现传统文化精髓，大力倡导全体市民讲文明、树新风，以提高全民的整体素质。

以培养乡土文化人才为目标，鼓励其创作乡土文艺精品，保护和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新型文化氛围，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加强社区文化基础设施投入，建设张掖大剧院、博物馆、文化馆和图书馆，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不断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引导市民认识甘州、了解甘州、热爱甘州，激发建设甘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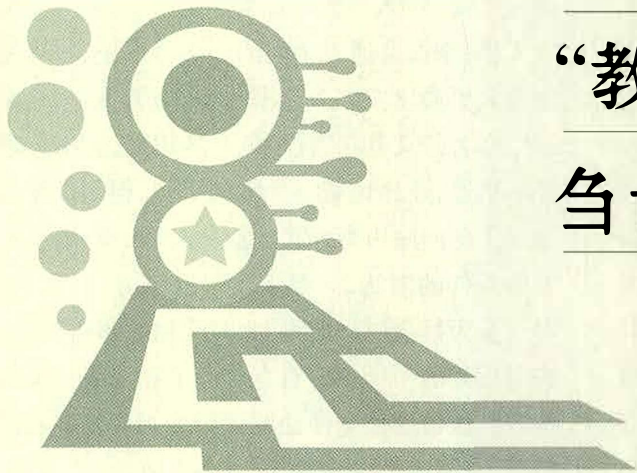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甘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当代地方志人物

“教化”内容

刍议

张泓



地方志的社会功用,历来有“资政、存史、教化”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中,教化是有时代特征和特定标准的。封建社会的“教化”是通过收录忠臣、孝子、义士、烈女、节妇等社会楷模,劝善惩恶,加强社会意识形态。封建社会的这类楷模,今天从名称到内容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今天不提倡为一个皇帝尽忠的臣民,也不提倡妇女为贞节牺牲个人幸福,但是“忠”、“孝”、“仁”、“义”、“礼”、“智”、“信”、“廉”、“耻”等传统道德标准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仍有其合理成分,在今天仍然值得提倡。这些概念可以进行适当改造,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大力弘扬这些有益于现实的道德规范,是当代地方志“教化”的功用之一。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遵纪守法、孝敬长辈、忠于职守、珍重友谊、善良仁慈、勤劳上进、见义勇为、诚实守信等品质都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优良品质,是一个人德行方面的重要内容。在这些方面表现突出的人物,是当代堪为楷模的人物,和今天的德育教育相一致。我们今天地方志的教化意义,应该主要着

眼于这些方面。为这类优秀人物树碑立传,是地方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地方志具有人民性倾向的体现。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直注重对子弟门徒的教育,流传下来的教育典籍,大多数仍值得肯定和发扬,在今天具有现实意义。在我国,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存在提倡偷盗、欺骗、忤逆、叛亲卖友之类的民风习俗。虽经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以及近些年来金钱至上风气的影响,社会上有一部分人道德沦丧,品行低劣,但是中国人民总体的善恶价值观没有改变,真善美与假丑恶仍然泾渭分明,在广大群众中间不乏雷锋式的人。笔者曾听说某个地方,由于国道改造,车辆绕道行驶。某段路面被压得坑坑洼洼,秋天多雨的时候,路上遍布水潭、泥沼,车辆无法行驶。附近村子有个老汉,自己带着工具,拉沙子,垫路面,又铲又垫,花了两个月时间把公路垫平了,大大方便了过往车辆和行人。老汉没有向任何单位和人员要过一分钱报酬,也没有到处表功,事情却在当地群众中有口皆碑。像这种举动,代表了人民群众中一种值得赞美的精神,是平凡人的伟大之处。地方志应该多着眼于—

些埋头苦干、造福一方,惠及子孙的草根阶层,应该侧重于干实事的人。这种事迹,新闻工作者没有报道,是其失职。县志可以为新闻拾遗补缺,而且不受时效限制。譬如义务修桥补路、疏通河道等公益事业的、多年来奉养残疾亲人的、收养弃婴、孤残儿童的、救助邻里的、拾金不昧的、长期植树的、清理垃圾的人物等等,可考虑在社会风尚方面设专门章节记述这类人物及其事迹。这是地方志弘扬正气、弘扬善举之所在。

全国第一轮修志工作中,许多地方在收录人物时,一般都是按照职务、级别、学历、职称、荣誉称号等作为标准来选择。这样做,范围明确、标准客观、争议较少、便于操作,优秀人物多数涵盖其中。但是里面也存在明显的弊端:一是按职务、级别、职称、荣誉称号这些标准,而没有这些东西,却有真实感人的行为事迹,或者有真正的水平实力的人物,特别是在品德、行为方面表现突出的非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人、农民、城镇个体劳动者难以进入;二是许多技术职称、荣誉称号、非正式机构授予的学术头衔等,含有很大水分。旧志中往往有“名宦”、“乡贤”等类别,这里面有德行方面的含义,现在修志基本上无这类人物。主要原因是尺度不好把握,范围无法界定,修志者的主观因素太浓。缺少这类人物,成为当代志书的一个严重缺憾,而要收录,却难以操作。英雄模范人物、有荣誉称号的人物中,也难免不含水分,难以保证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如何取舍这类人物,是当代方志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难题。

地方志一般认为属于史学范畴,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要起到知古鉴今的作用,应该将一个时代突出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收录进去,但在具体编纂过程中,反面人物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究其原因,除了

对涉案事件宜粗不宜细等原则外,主要是写这类人物对编者不利,容易惹麻烦,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能否秉笔直书,善恶昭彰,是当代修志工作者面前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修志当中一个非常可贵的精神是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经过大量的调查工作,掌握普通人中间的不平凡事迹,将这些人物及其事迹忠实载入志书,使其流芳百世,这是方志工作者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其功德。记载一段这样的事迹,要比记载一个级别虽高,但政绩平庸的领导干部的简历有意义。这些虽然涉及到精力、财力等条件的制约,并要承受一定压力,付出代价,但这是为社会树立典型、为时代树立丰碑,是提高志书质量的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每个方志工作者应该带着社会使命感、带着职业良知和满腔热情,克服困难,尽力朝这方面去做。

(作者单位:徽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修志行文随笔 (续)

张志纯

《年鉴》是一个地方或一个行业、一个部门一年之内活动情况的总汇。它是由叙事文字、统计数字、形象图表编辑成册。它的载录情况真实，内容可靠，材料可

贵，是现行参考利用的工具书，也是编史修志的资料书。由于两者的关系甚密，故于此处专议年鉴。

三十一、《年鉴》的框架

这里所说的《年鉴》，是指具有地方志编纂素材的《综合年鉴》。首轮修志基本结束后，修志部门得出“修志难，难在资料”上的教训，于是把组编年鉴列入各级地方志办公室续修二轮志书的主要任务。不多几年，本省各地的地鉴、市鉴、州鉴、县鉴、区鉴争先恐后、争芳斗艳。笔者针对张掖辖区年鉴的框架，发表如下议论：其一，框架是编鉴的纲目，是编纂准则，设计要周全，项目要周到，分门别类，陈述百业。聚百科于一书，纳万事于一年。其二，框架层次要分明，一般设三级：部类——属类——条目。也可为总目——类目——条目——子目四级，视情而定。条目是《年鉴》的主体，选题要准，选材要真，资料要实，信息要多，创意要新。其三，框架要稳定，保持延续性。首部框架类目的目项、目名、目序一旦“深思熟虑”地确定，基本结构最好不要轻易变动，旨在可“循规蹈矩”地延续编，能“轻车熟路”地检索用。其四，基本框架在保持相对固定的前提下，要突出年代特色，“各行各业年年都干那些事，但年年干的都不一样”，要把当年发生的大事要事、新事特事在栏目中体现出来。其五，框架分类设目要科学合理，结构严谨，隶属关系正确，不交叉重叠，逻辑性强，整体网络组织严密。

三十二、《年鉴》的年代

顾名思义，《年鉴》之年，应该是一年，即，时过事后的前一年，如2012年编2011年的《年鉴》。一年一鉴，合乎常理，顺乎编务。这在专业部门的正常情况下，可以做到一年编一鉴，年年相继，鉴鉴相递，按序循环。这种做法是应该提倡，应该坚持

的。因为它属合事物演变规律：“时近即真，事近即实”；前一年事，后之年记，现事现编，遂辑为鉴。但在某些部门的特殊情况下，处于“时

过事迁”之故，形成二至数年编一鉴的做法。《张掖地区志》的断限是上迄远古，下至1995年。年鉴的编纂因故拖延了几年，直到2004年，为给第二轮编修《张掖市志》储备资料，方决定始编年鉴。这样，就出现了《张掖综合年鉴》（1996—2003年）的8年之鉴。此鉴其后又有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年的几种涉年状况。为还“旧账”，不得已而为之。

三十三、《年鉴》的署名

在标署《年鉴》的年代上，有两种情形：一是封面年代与内容年代相一致——名符其实；二是封面年代与内容年代不一致——名不符实。符实者，表里统一，毋庸置疑，如《2000××年鉴》，封面标署为2000年，翻开内页的内容针对年代，无论文字还是图表所涉及的年代，全部都是2000年的东西；不实者，表里不一，使人生疑，如《2000××年鉴》，封面标署为2000年，翻开内页的内容与图表所针对的年代，却与其相反，全部都是1999年的东西。

持“表里统一”者说，书是给人看的，封面书名是什么，就知道书里说的就是什么。《2000××年鉴》，里面的文字内容和图表反映，当然都是2000年所产生、所形成的事物，无可非议。其中所讲、所做、所为的事情，都是2000年的记载，使人确信无疑。

持“表里不一”者说，封面是2000年，内容是1999年，是因为1999年度的内容文字和图表形象资料是2000年刊出的版本，以刊出之年标年份，所以叫《2000××年鉴》，内容年与版刊年要“区而别之”。

两者各说各有理，谁持谁的对。两相比较，从阅

读利用讲,从存史角度看,从名符其实考虑,前者为读者所认可,为大众所接受,故建议笑而纳之。

三十四、《年鉴》的种类

时下流行的年鉴,有综合鉴、行业鉴、部门鉴等多种类型,其名称有的明确,有的笼统。明确者如《××统计年鉴》《××交通年鉴》《××综合年鉴》等;笼统者如《××年鉴》等,此鉴只标“地名”与“年鉴”,看不出何种何类年鉴。同样都称之为“年鉴”,平庸无异,不得其解。从科学分类讲,应按社会领域、行业分工、门类界别,给予确切命名。根据年鉴编纂的社会分工和所涵内容,大致分为综合与单项两种类型:

综合型年鉴,泛指一定行政建制所辖的区域而言,如:省(市、区)、地(市、州、盟)、县(市、区、旗)、乡(镇、区)、村。其内容,上综天文,下合地情,包罗万象。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人文的、军事的,可说是方方面面,行行道道,应有尽有,是一部百科式的地情总汇。基于此种年鉴具有糅合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它的名字宜称《××综合年鉴》为宜。

单项型年鉴,是指某行业、某部门、某方面的年鉴,具有一定的专指性,比如《××水利年鉴》《××教育年鉴》《××农场年鉴》《××公司年鉴》《××出版年鉴》《××渔业年鉴》等。这类年鉴应突出它的本行业、本专业、本事业、本部门的特征,专项专鉴,特色鲜明。

三十五、《年鉴》的版本

年鉴是重要图书之一,且是系列性的丛刊工具书。一年一年地连前续后,年积岁累,册数与年俱增,成为规模型的成套藏书。无论公共保存,还是个人藏书,在书架上都喜欢图个整齐划一,人们最讨厌在书架上看到同一版本的图书大小不同、高低不一、参差不齐。

笔者议此并非无事生非,而是确有其故。本地的一个领导机关,从2003年到2010年,每年出了一本年鉴,内容文图表的质量暂切不议,唯瞧外表模样,的确不敢恭维:2003年版本是大32开,而2004年的版本却成了大16开,其后各年都恢复为大32开本。我将这8本年鉴按序排列上架,那位大16开的“老大哥”,就像筷子中间冒出的旗杆,格外难堪。以各就各位的规矩,它只能“对号入

座”地高昂挺拔在前后矮子中间。何成如此?当然是那位大16开本的主编先生“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自以为是”狭念所为。由此发言:无论哪届编者,都应懂点版本学,考虑整体,瞻前顾后,从长计议,保持同一书刊的“千本一线”。

三十六、《年鉴》的图片

图片在年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系到图文相辅相成、相依并存的资料性,关系到以图片验证文字内容的真实性,关系到以直观形象宣传人、感染人、吸引人的功能性。综览过去年鉴图片的采用,有感于如下观念:之一,图片内容的涉及时,应与文字内容所记时间相一致,不能事悖于时,也不能时违于事,如2000年的年鉴上用的是1999年及其以前的图片,或内容是甲时,图片是乙时。之二,图片应与内容相符,不得张冠李戴,如林业篇中配置道路交通的图片,把经济图片配到文化栏目中。之三,某些图片无名无姓,无说明文字。要么只说其一,不明其二;要么光板一幅,如人事片无时间、无人物;事物片无地点,无活动等。之四,图片质量欠佳。择其欠者,有的图像模糊,缺乏明晰感,反映不出真实面貌;有的图景拍摄角度偏斜,影响事物本身的整体形象;有的则为了照顾有偿彩页的关系户,勉强采用了一些与年鉴关系不大、存史价值不高、且质量较差的图片。凡此诸种,都是年鉴质量所不允,需要改进和改善。

三十七、《年鉴》的文体

《综合年鉴》的特点是涉及面广、信息量大、头绪繁杂,其性质要求须以高度集中、高度概括、高度浓缩的手法囊括林林总总的事物。年鉴文体亦为志书撰写体裁,即以记叙文体与说明文体相结合的语体文。记事述情,力求达到以下效果:首先是根据事物性质把每一快事物划分、分解为最基层的单位——条目。每个条目也就是一个撰写单元,自成一体,独立成章。其次是以辞条式的文字撰写每个条目的内容。内容的构成要素大体包涵:事物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结果等。有的事物上述要素全俱,甚至更多;但有的不尽全有,或其中某项、某几项。所述内容有情况、有数据,两者有机结合,构成价值珍贵的新信息,新资料。第三是规范地构成条目。就每条辞目而言,主题要鲜明,重点要突出,层次要清楚,条理要清晰。第四是

据实客观地记述内容。年鉴撰文贵在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不拖泥带水,不空发议论,客观公正地秉笔直书。第五,语言精炼,文句朴实。以最少的文字载贮最多的信息。

三十八、《年鉴》的周期

年鉴具有政府公报功能。每年在一个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部署下,辖属各界各级、各行各业所发生的新情况、所产生的新变化、所取得的新成就,所获得的新经验,都在年鉴中得到集中而有序地记载和反映。由此可看出领导机关的决策效能,可看到执行单位的运行效果。这样,领导层与被领导层都能从中鉴赏到过去一年的“丰收喜悦”,品味到其中甘甜,无意之中对《年鉴》产生好感。另就《年鉴》本身形成而言,那前面的编者名单,有策划者,有顾问者,有主持者,有主编者,有协编者,有编辑人,有撰稿人,有校对入,有审稿人,有摄影人,有资料提供人等等,“青史留名”之心大都有之,看到“榜上有名”,谁不高兴?鉴此,从上述两则“情报”而论,《年鉴》编印周期不能“马拉松式”,而应“快马加鞭”,以“三三”期足矣,即:用三个月征集资料,用三个月编辑总纂,用三个月印刷出版。也就是说,当年编辑出版上年度的《年鉴》,完全可以办到:3—5月为第一阶段,6—8月为第二阶段,9—11月为第三阶段。若巧安排,抓紧干,每阶段可缩出一个月,半年也能完成。

今年能看到去年的《年鉴》,是件快事、好事、赢得好评的事!时近则新,事近则亲,当人们就“急功近利”地看到他们刚刚过去的人和事,真是不亦乐乎!由此可产生如下效果:一、能及时为领导决策服务,为社会各方服务,收到社会效益;二、能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收到经济效益;三、上述“双效”给史志部门带来两好处:可提高社会地位,可改善基本条件,何乐而不为?

三十九、《年鉴》的使用

由地方志部门承编的《综合年鉴》,其篇目、资料、内容和体式都具备方志的性质、特点、功能和用途。《张掖综合年鉴》创办以来的四期实践证明,在社会上经历了从不理解到理解,由不认识到认识,由勉强配合到热情支持的过程。这除了以党委、政府“两办”发文部署这一权威政令的主因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年鉴》本身具备了“资料来自于他们,用之于他

们,满足了供稿单位的所需所求。”每篇撰文后尾都署撰稿人、审稿人的名字,确立了供稿单位领导人和办事人的分工与职责,无形地增强了他们为《年鉴》而尽职、而义务的责任感,因而每期“两办”发文之后,进展比较顺利,大都能按时按需供稿。

《综合年鉴》之所以受到欢迎、得到支持、给予配合,除他们在大部头的《政府公报》上“榜上有名”外,主要在“百科载籍”中有他们提供的本单位文字、数字和图片资料。这些“记录自己的事,属于本身的史料”,既是他们现实查考利用的真实依据,又是他们未来编史修志的可靠资料;也既是志办统一编纂的全市、县(区)之鉴,又是他们各自不可缺少的必存之书。新世纪以来方兴未艾的年鉴事业,正是基于上述之故,才得到社会认可和用者青睐。

四十、每鉴必载的资料

每年刊出的年鉴资料,毕竟是当年当事,很少涉及它年它事,一年一鉴为基本单元,形成一鉴一册,单存单用。有的单位或个人收藏的各年之鉴可以集中保存,有的则处于“各奔东西”,甚至“下落不明”。

编鉴贵在利用。从编者考虑,应着眼于多种用途。查阅《年鉴》当年所载年度资料是广大用者的常规现象,但也不排除需要一市一县的基本地情资料。为此,尽管是一年一刊的年度之鉴,亦应把反映本市本县基本地情的固定型资料编入每年的年鉴。这样做,可满足于不同目的、不同用途的需要。社会利用史志资料是难以预测的,但作为国家行政区域管理建制的省辖市、市辖县(区)的《综合年鉴》中应该把市、县(区)“自然环境”和“建制沿革”收录入鉴,同时年年依旧,卷卷皆载,是发挥年鉴利用频率的有效途径。《张掖综合年鉴》首卷首位设“概况”之栏,内置“历史沿革”“地理环境”“自然资源”“行政区划”“民族之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六目。前三目为静态型,是一市一县首要的基本地情,但凡有一定使用目的的社会任何方面、任何个人都是喜阅乐用的。他们无论翻开哪年哪册,都能看得见,用得上。尝到《年鉴》利用甜头的人说:年鉴用起来真是得心应手。后三目的资料属于动态型,年年或隔年都有变有新,坚持做到了每鉴在原基础上续添新变化、新资料,使其鉴鉴相继,卷卷相承。

(作者系张掖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

《永靖县志》(1986 - 2005)目录

概述
大事记

第一编 区域 环境

第一章 县城

- 第一节 城市规划
- 第二节 县城建设
- 第三节 能源供给
- 第四节 供水 排水
- 第五节 交通设施
- 第六节 绿化 环卫

第二章 乡镇

- 第一节 沿革
- 第二节 乡镇概况
- 第三节 乡镇建设

第三章 自然环境

- 第一节 地质 地貌
- 第二节 土壤 植被
- 第三节 水文
- 第四节 气象 气候

第四章 自然资源

- 第一节 土地资源
- 第二节 矿产资源
- 第三节 生物资源
- 第四节 气候及水资源

第五章 自然灾害

- 第一节 旱灾
- 第二节 暴雨洪涝

第三节 雹灾

第四节 其他

第六章 环境保护

- 第一节 环境状况
- 第二节 环境监测
- 第三节 环境管理
- 第四节 污染治理
- 第五节 自然保护区

第二编 综合经济管理

第一章 经济发展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经济计划
- 第三节 规划实施
- 第四节 产业结构
- 第五节 生产水平及效益

第二章 项目建设

- 第一节 综述
- 第二节 库区建设
- 第三节 招商引资
- 第四节 基建项目管理

第三章 经济管理

- 第一节 统计管理
- 第二节 工商行政管理
- 第三节 物价管理
- 第四节 质量技术监督
- 第五节 审计监督
- 第六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第七节 房地产管理

第四章 国土资源管理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土地资源调查与开发

第三节 地籍管理

第四节 矿产及测绘管理

第五节 地质环境监测

第五章 财政 税务

第一节 财政

第二节 税务

第六章 金融服务及保险

第一节 金融服务

第二节 保险

第三编 农 业

第一章 种植业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体制改革

第三节 产业结构调整

第四节 粮食作物

第五节 经济作物

第六节 品种改良

第七节 农业栽培技术

第八节 病虫害防治

第九节 农业技术宣传培训

第十节 农业机械

第二章 畜牧业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畜禽养殖

第三节 繁育改良

第四节 饲草饲料

第五节 疫病防治

第六节 检验检疫

第七节 兽药经营管理

第三章 水产养殖

第一节 水库养殖

第二节 池塘养殖

第三节 繁育改良及渔政管理

第四章 林业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体制

第三节 天然林

第四节 育苗

第五节 人工造林

第六节 库区绿化

第七节 经济林

第八节 退耕还林(草)

第九节 林业科技

第十节 林木病虫害防治

第十一节 林业管护

第五章 农田水利

第一节 综述

第二节 引水灌溉

第三节 农田基本建设及水土保持

第四节 人畜饮水工程

第五节 抗旱

第六节 防汛

第六章 农村扶贫开发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两西”建设

第三节 项目扶贫

第四节 劳务输转

第五节 移民扶贫

第六节 农村能源扶贫

第七章 名优特产

第一节 红枣

第二节 花椒 核桃

第三节 百合 草莓 樱桃西红柿

第四编 工 业

第一章 县属工业

第一节 综述

第二节 管理机构

第三节 农副产品加工

第四节 纺织

第五节 建材

第六节 印刷

第二章 民营企业

第一节 综述

第二节 机构与体制

第三节 行业结构

第四节 主要产品

第五节 工业园区

第三章 农电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农村电网建设

第三节 用电

第四节 安全管理

第五编 交通 通讯

第一章 公路建设

第一节 干线公路

第二节 县乡公路

第三节 乡村道路

第四节 专线公路

第二章 水路建设

第一节 航道 航线

第二节 渡口 码头

第三节 船舶运输

第四节 水运管理

第三章 铁路 桥涵

第一节 铁路

第二节 桥梁

第三节 遂道 涵洞

第四章

第一节 客货运输

第二节 道路运输管理

第三节 交通监理及安全管理

第五章 公路交通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第二节 公路养护

第三节 规费征收

第六章 邮政

第一节 概况

第二节 邮务类业务

第三节 速递物流及金融类业务

第七章 通讯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有线电话

第三节 无线电话

第四节 电报、数据通讯

第六编 商业贸易

第一章 经营体制

第一节 综述

第二节 国营商业

第三节 供销合作商业

第四节 个体私营商业

第二章 专营专卖

第一节 烟草专卖

第二节 食盐专卖

第三节 石油专营

第四节 天然气专营

第三章 粮油经营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粮油征购

第三节 粮油供应

第四节 议购议销

第五节 储运

第四章 市场贸易

第一节 专业市场

第二节 综合市场

第三节 乡镇市场

第七编 旅游

第一章 综述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规划

第三节 旅游开发

第四节 节会宣传

第二章 主要景区

- 第一节 炳灵峡景区
- 第二节 刘家峡景区
- 第三节 吧咪山原始森林景区
- 第四节 盐锅峡景区

第三章 主要景点

- 第一节 炳灵寺
- 第二节 炳灵石林
- 第三节 水电明珠
- 第四节 黄河三峡湿地
- 第五节 甘肃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第八编 党政机关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

- 第一节 党代会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永靖县委员会
- 第三节 重大决策
- 第四节 纪检监察
- 第五节 组织工作
- 第六节 宣传工作
- 第七节 统一战线
- 第八节 政法委员会
- 第九节 党校教育
- 第十节 党员教育
- 第十一节 老干部工作
- 第十二节 来信来访

第二章 人民代表大会

- 第一节 历届人民代表大会
- 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第三节 主要工作及活动

第三章 人民政府

- 第一节 政府组成
- 第二节 施政纲要
- 第三节 依法行政
- 第四节 基层政权建设
- 第五节 人事劳动制度改革
- 第六节 干部职工队伍建设
- 第七节 专业技术职称评聘

第四章 政治协商会议

- 第一节 历届政治协商会议
- 第二节 常设机构及主要工作
- 第三节 参政议政

第五章 人民团体

- 第一节 工会
- 第二节 共青团 妇联
- 第三节 工商联 残联

第九编 政法 军事

第一章 公安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安全保卫
- 第三节 刑事侦查和“严打”斗争
- 第四节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第五节 禁毒
- 第六节 户籍管理及消防

第二章 检察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刑事检察
- 第三节 法律监督
- 第四节 查办职务犯罪
- 第五节 职务犯罪预防
- 第六节 民事行政检察
- 第七节 监所检察
- 第八节 控告申诉、举报检察

第三章 审判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刑事审判
- 第三节 民商事审判
- 第四节 行政审判
- 第五节 案件执行
- 第六节 审判监督

第四章 司法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法制教育
- 第三节 人民调解
- 第四节 法律服务

第五章 军事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国防教育
- 第三节 民兵预备役
- 第四节 兵役
- 第五节 拥政爱民

第十编 教育

第一章 学校教育

- 第一节 幼儿及学前教育
- 第二节 小学教育
- 第三节 中学教育
- 第四节 民族教育
- 第五节 职业技术教育及成人教育

第二章 教育行政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管理体制
- 第三节 教师队伍
- 第四节 教学设施
- 第五节 教育经费
- 第六节 教育科研

第三章 学校选介

- 第一节 中学选介
- 第二节 小学选介
- 第三节 幼儿园选介

第十一编 文化艺术

第一章 文艺创作与表演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文学
- 第三节 艺术

第二章 民间文化

- 第一节 雉文化
- 第二节 秧歌
- 第三节 花儿
- 第四节 古典建筑艺术
- 第五节 黄河奇石与葫芦雕刻
- 第六节 曲艺

第七节 民间故事

第三章 广播影视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广播
- 第三节 电视
- 第四节 电影

第四章 新闻与文化市场

- 第一节 新闻报道
- 第二节 图书发行
- 第三节 文化市场管理

第五章 文物 史志 档案

- 第一节 文物
- 第二节 党史研究
- 第三节 地方志编纂
- 第四节 档案

第十二编 卫生

第一章 卫生行政管理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队伍建设
- 第三节 经费 设施
- 第四节 爱国卫生运动

第二章 卫生体制改革

- 第一节 县医院改革
- 第二节 乡镇卫生院改革
- 第三节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三章 医疗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医疗水平

第四章 疫病防治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地方病防治
- 第三节 传染病防治
- 第四节 非典型肺炎防治
- 第五节 寄生虫病防治
- 第六节 预防接种和计划免疫

第五章 妇幼保健

-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妇女保健

第三节 儿童保健

第六章 医药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药械销售

第三节 药品监督

第七章 卫生监督执法

第一节 食品卫生监督

第二节 公共卫生监督

第三节 职业与学校卫生监督

第四节 医疗市场监督执法

第五节 传染病防治监督执法

第十三编 科技 体育

第一章 科学技术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技术服务

第三节 科学技术宣传与推广

第四节 科技成果与管理

第五节 防震减灾

第二章 体育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群众体育

第三节 学校体育

第四节 竞技体育

第十四编 社会

第一章 劳动保障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劳动保险

第三节 就业服务

第四节 劳动与安全保护

第二章 社会福利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工资福利

第三节 复退军人安置

第四节 军烈属优抚

第五节 “双拥”活动

第三章 救灾 救助

第一节 救灾

第二节 社会救济

第三节 社会救助

第四章 人民生活

第一节 综述

第二节 城镇居民生活

第三节 农村居民生活

第五章 社会管理

第一节 婚姻殡葬管理

第二节 社会团体管理

第三节 地名勘界

第六章 人口与计划生育

第一节 人口结构

第二节 机构

第三节 综述

第四节 政策宣传

第五节 计划生育管理

第六节 计划生育服务

第七节 优惠政策

第七章 民族 宗教

第一节 民族

第二节 宗教

第三节 民族宗教工作

第四节 主要宗教活动场所

人物

一、传记

二、简介

三、名表

附录

一、诗歌散文

二、民间文艺

三、碑铭

四、勘误补遗

编纂始末

西路军 在大靖组建

李发玉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三军会师后,为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宁夏战役计划”,四方面军总部及五军、九军、三十军从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准备和河东红军配合,夺取中卫,攻占宁夏,在甘肃和宁夏富饶地区建立根据地,从蒙古接通与苏联联系的通道。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后,冲垮了马步青骑五师的防线,将骑五师分割包围。频频得手,已形成了夺取宁夏的有利局势。由于河东敌人的疯狂堵截,形势发生变化,中央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批准了平(番)、大(靖)、凉(州)战役计划,创建甘北根据地,经过新疆,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帮助,解决抗日战争的战略靠背问题,打开了悲壮的西征序幕。

西渡黄河的红军指战员共2.18万人。三十军为第一纵队,由一条山向大靖挺进,九军为第二纵队,经干柴洼(今干城)、横梁山向古浪挺进;五军为第三纵队,跟总部尾随三十军行动。1936年11月9日,西路军进入古浪境内与马步青、马步芳部进行了浴血奋战。

第二纵队之九军,于11月10日从景泰的打拉牌出发,经甘沟、乱泉台子,冲破马彪防线,又连续攻破大鱼沟马元海防线,直取干柴洼(今干城)。守敌骑五师二旅二团马福仓部,经战败退至旧寺沟、西岔等地,九军占领干柴洼,并构筑工事,布设防线。这时青海马步芳的马元海部及其民团和武威马步青的马禄、韩其禄部共万余人尾追而来,向九军发起进攻。九军坚守还击,敌屡攻屡败,战斗到傍晚,敌人撤至大鱼沟一带。第一纵队的三十军

于11月11日从一条山出发,经古浪县的新堡、壕沟、马家磨沟,后陆续经过土地贫瘠、人员稀少的裴家营、大靖樊家滩等大河坝地带,从大靖城东迂回到城南。时大靖守敌马步芳骑五师步兵旅祁明山部集中南门外防守,被红军击退龟缩城中不出。红军无意攻城,只把俘虏送至南门外,军队驻扎在城南三华里的横沟桥一带。是日,徐向前、陈昌浩等住在古浪县大靖城外龙王庙何家庄园,进步开明人士李子才主动送去羯羊1只犒劳红军,红军为其出具收条一张,言明待革命成功后加倍奉还。许向前、陈昌浩向中央领导发电,简明汇报了红军进入大靖地区的情况:

朱、张并毛、周:

(甲)三十军、五军及指直(指挥部与直属机关)全部先后到大靖附近及塘豆子一带。马敌约一营人守裴家营,一团守大靖。未攻,今夜相继袭之。九军今到干柴洼,今昨无激战。

(乙)三十军占一条山,散开与敌激战。敌无日不猛攻,均受重创,步芳师参谋长马廷祥死。敌走后尚有七百伤病留一条山、景泰,百余留寺儿滩。该地无敌。二十七师重击马步芳第三旅及骑特团后,马步芳第六百团团长战死,敌伤亡甚大。当即以二十五师直战镇虏堡、沙河井,以致永南颇空虚。11日又自动放弃一条山,敌以我向西南进,当将一条山一带敌两马主力全部星夜调集松山、平番方面。九日敌飞机十架,配合步骑两团,猛炸镇虏堡约四小时,我只伤亡二十八名。敌主力现被调左翼及正面。十日,即以九军扼制松山、干柴敌。二十五师、指直均以连日急行军,通夜走百里以上,到达现之预定地区,途中均未遇敌。

(丙)现马步青约在大靖、土门、凉州一带,步芳大部在永登、镇虏、松山一带,屏障兰州。估计毛炳文有可能对付我永登、古浪、凉州之企图。决以九军一个师今晚出动,抢占红凉山(横梁山)制南敌;一部速出古浪;另一师在干柴洼制敌。于今晚出动占土门,指直及三十军余部明晚向土门进。五军暂定在大靖地区休整活动,准备尔后配合三十军一部出凉州,或主力即向凉州地区集结,能靠永登,一部在平(番)、大(靖)、土(门)、红(梁山)活动。

(丁)所过地区人、房、柴、水均极稀缺。平地开

阔,全无隐蔽,最利飞机、骑兵活动。高山积雪,长起赤色风,每晚及下午夜最冷,呵气成冰,较之莫斯科有甚。无房不能宿营,重皮尚称不暖,各部衣物单薄。敌机朝晚活动,敌情又不甚明。为适应此情况,惟在调动敌人,秘密出没,连日不得长夜行军,致各部掉队甚多,疲劳增加,但士气极旺。现今各部尽力争取休整。大靖坝子人户约两三千,城三丈,颇坚固。大靖到红凉山(横梁山)四十里,再四十里到古浪,到土门九十里,中无人户;再到凉州百二十里,甚富足。

(戊)兄等有何指示速告。

徐、陈

十一月十日

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发来电文,命令以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及指直部队为基础,正式组建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称“西路军”。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由徐向前、陈昌浩统一处理军事、政治诸事务。西路军总指挥部依照红四方面军组织照旧不变,总指挥为徐向前,总政治委员为陈昌浩,副总指挥为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电文如下:

徐、陈、李并转各同志:

甲、你们所部组织西路军。

乙、依照你们提议的名单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管理军事及政治与党务。

丙、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

中央及军委

十一月十一日

徐向前、陈昌浩随即召集三十军及指直各部宣布了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的决定,并电告九军、五军。至此,红军西路军正式在大靖组建。红军在大靖城南三华里地带仅留宿一夜,便匆匆绕城到西川,向土门一带进发。

就在西路军总部在大靖时,毛泽东、周恩来专门发来电文询问西路军近况,以便对未来进退战术作出正确决断。电文如下:

徐、陈:

甲、你们现到何处?情况如何?

乙、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

丙、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

(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

(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

(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

毛、周

十一月十一日

徐向前、陈昌浩对毛泽东、周恩来详细做了汇报。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总指挥部向朱德、张国涛汇报了西路军刚刚组建时的情况及下一步的打算,并请求适时帮助。电文如下:

朱、张并萧、周、陈、王:

(甲)指直全部、五军及八十八师均在大靖附近休整。此地共约万余户,气候、水、柴、人、粮极丰富。极少掉队,十分之九已到。现在休整,士气大振。

(乙)大靖为祁旅长率一团固守,正办外交,均未打枪。九军主力在干柴洼,一团在红凉山,敌一部正进攻,九军主力决多劳几天。今夜一团去古浪,我们及八十八师已去土门,五军暂在此休整,适时跟进。

(丙)一般地情摘要告我。我无材料,请多帮助。

徐、陈、李

十二月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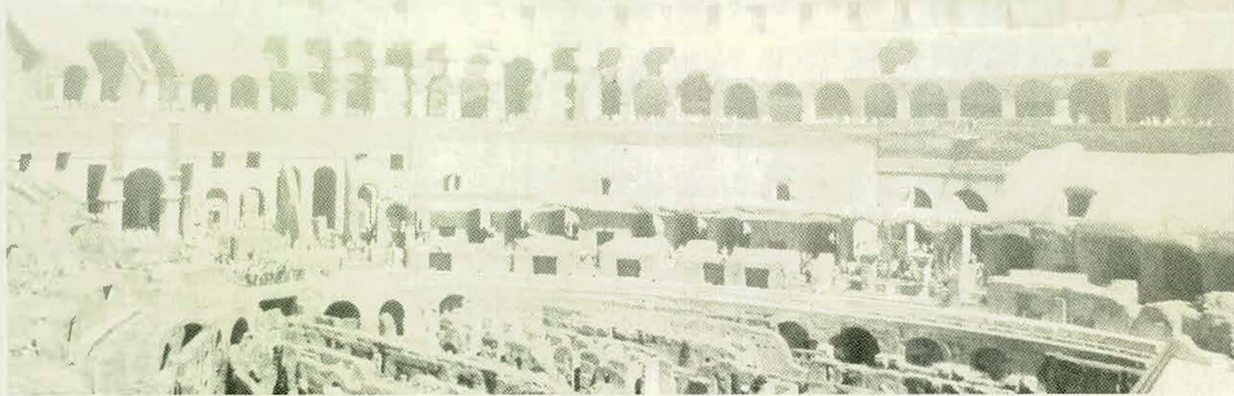
电文中的萧、周、陈、王指没有渡河的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萧克、政治委员周纯金,第四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

11月13日,九军政治委员率领八十一团自横梁山西进至古浪县城。三十军先头部队已达凉州。14日凌晨,九军占领古浪县城并加紧修筑工事。16日至18日,红九军被十倍之敌围困在古浪县城,血战三日,毙敌二千余,红九军亦遭重创,加之干柴洼、横梁山之战,伤亡共达两千四百余人。18日晚,在三十军二六八团接应下,九军全力突围,连夜向武威方向转移。此后,西路军执行中央军委打通“远方”(苏联)的电令,向西进发。

(作者单位:古浪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乞伏国仁建都勇士城

周学海



晋太元十年(385)11月,“代镇”使持节、都督讨西胡诸军事、镇西将军的乞伏国仁在苑川河畔东南修筑了勇士城。国仁所修筑的勇士城,是西秦的第一个都城。《兰州古今》:“苑川以苑川水得名,即今榆中大营川以其流经汉牧师苑,古曰苑川。……此西城当即西苑城,今榆中县境清水驿有古城遗迹,可能是西秦第一都城。《晋书》《魏书》和《甘宁青史略》中将苑川河自新营至来紫堡分为四个川。新营至高崖为瓦川(当地人又称沿川),高崖至甘草店为大营川,甘草店至东古城为勇士川,东古城至来紫堡为苑川。据考证,今县境清水驿以北约6公里处的苑川河东岸有“东古城”,城西半部已被苑川河水冲刷为河滩,东半部为居民村落,尚保留城墙一段。从挖开的断面上看,有过三次加筑。城北约4公里处有地名曰“太子营”,西南2公里处的苑川河西岸有地名“接驾嘴”,是两个特殊的地名。在封建时代只有帝王出行时才有资格称“驾”,也只有王储可称为“太子”,乞伏乾归于太元十九年(394)十二月自称“秦王”;二十年正月,“西秦王乾归以太子焜盘领尚书令”(《通鉴》)。历史上

在此地建都称王、称太子者,只此二人。乾归正是太元二十年迁都苑川的,可以断定乾归迁都至苑川城,可能在东古城。它就是十六国时期由鲜卑族在西北建立的政权——西秦国都勇士城。

鲜卑族因在西汉时曾受匈奴的压迫,逃到大鲜卑山而名之。到东汉初年,随着匈奴的衰落,鲜卑族便应运兴旺起来。散居区域东到辽河流域,西接新疆,东西一万二千里,南北七千余里。后来,鲜卑族的一部分逐渐南下到陇西等地和汉人杂居,因此又把乞伏鲜卑称为陇西鲜卑。

陇西鲜卑第二代可汗是在魏晋之际,战后称西秦王的乞伏国仁的五世祖乞伏佑邻,部族人数只有5000户,兵力不足1万,后来迁到宁夏,才逐步强大起来。第六位可汗乞伏述延继位后,率部在苑川一带打败鲜卑莫侯部,俘获其众2万多,实力进一步壮大。

建元七年(371),乞伏述延的孙子乞伏司繁统领3万骑兵在苑川抗击,被王统打败,于是率众投降了苻坚。后来乞伏司繁屡建战功,被封为镇西将军。乞伏司繁死后,由其子乞伏国仁代行其职,继

续镇守勇士川(川以设勇士护军名之)。由于国仁重兵在握,乞伏氏羽翼渐丰,日益强大起来,为后来西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前秦苻坚被后秦姚萇以索取帝王传国玉玺缢死后,乞伏国仁便于晋太元十年(385)九月“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立帝号“烈祖”。改前秦年号建元为建义,封其将乙旃为左相,屋引出支为右相,独孤匹蹄为左辅,武群勇士为右辅,封其弟乞伏乾归为上将军。置武威、安国、武始、汉阳、天水、略阳、湟川、甘松、匡朋、白马、苑川十二郡,筑勇士城以居之。标志着以乞伏部为首的部落联盟从此建立了国家,历史上也以此作为西秦建国之始。

乞伏国仁称王后,南安秘宜率诸羌卢攻打西秦。乞伏国仁率精兵五千,出其不意组织袭击,秘宜败回南安。自此,先后有莫俟悌率众三万余户、鲜卑匹兰率众五千投降国仁。尔后,国仁又率骑兵三万多,在六泉打败鲜卑族密贵、裕苟、提伦等部落,斩杀三千多人,获五千多匹马;又在平袁打败了鲜卑越质叱黎,其部落五千余人投降。

乞伏国仁于太元十三年(388)六月病逝,谥号宣烈王,葬于夏官营附近。时因其子乞伏公府年幼,只有八岁,难以理朝政,群臣便推举国仁的弟弟乾归为“大将军、大都督、大单于、河南王”。乾归登位后,改年号为“太初”,立妻子边氏为王后,“置百官,仿汉制”。封南川侯出连乞都为丞相,梁州刺史悌眷为御史大夫,金城边芮为左长史,东秦川刺史秘宜为右长史,武始翟为左司马,略阳王松寿为主簿,弟乞伏益州为秦州牧,堂弟乞伏轲弹为梁州牧,屈眷为河州牧。九月,乾归由勇士城迁都至金城。

晋太元十七年(392),后凉王吕光派遣中郎将吕方及弟吕宝,在金城攻打乞伏乾归。乾归派其将彭奚念截断吕宝归路,一举战败吕宝。隆安元年(397),后凉王吕光又派骑兵三万向乾归挑战,乾归将吕部击败。隆安四年五月,后秦姚兴率师五万偷袭,乾归败于姚兴,退还苑川,其部众三万六千人降于姚兴。乾归只好率百余骑兵驰向允吾,降南凉秃发利鹿孤。后逃往长安,投靠后秦姚兴。姚兴

授乾归为“镇远将军、河州刺使,复以其部众配之,遣乾归回镇苑川。

后秦姚兴还想利用乾归父子在陇右的潜在势力,以巩固和扩大他在河陇的统治,故对乾归父子及原西秦的势力采取笼络政策,从而保存了他们的实力,这就为以后乾归父子复国制造了条件。

元兴元年(402)乞伏焮盘从西平逃到长安找其父乞伏乾归,姚兴又授他为“振忠将军、兴晋太守”,镇枹罕。晋义熙二年(407)正月,姚兴见乾归父子势力逐渐增强,终为其心腹大患,将乾归召回长安,授为主客尚书,以焮盘为建武将军,行西夷校尉,监抚其众。

晋义熙三年,后秦因连年战争而势力中衰,国内用度不足,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长安发生了兵变,焮盘遂于此年十月乘机招结部众二万七千余人,筑城于崦嵫山(在榆中马衔山,或甘草克涝)据守,以抗后秦。接着,焮盘出兵攻克了枹罕后,就派使者报告乾归:“战事顺利,取得成果,速来苑川”。

次年四月,乾归在枹罕与焮盘会合。鲜卑部悦大坚率五千降于乾归,乾归遣焮盘镇守枹罕,自己带领三万部众迁于度坚山。这时,群臣皆劝乾归自主称王。晋安帝义熙四年(409年)七月,乞伏乾归再次称王,改年号为更始,复都苑川。

在乞伏乾归复国称王后的两年中,西秦不仅恢复了原有的疆域,而且还发动对邻近鲜卑、羌族部落及对后秦的战争,疆土还向四周扩张。从此西秦进入了复兴和强盛时期。乾归亲自统帅大军攻克后秦略阳(今秦安县南)、南安(今陇西武山县西)、陇西、金城诸君,“迁徙二万五千余户于苑川、枹罕”。这时,后秦姚兴“力未能西讨,恐更为边害”,便又封乞伏乾归为“使特节、散骑常侍、都督陇西岭北匈奴杂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河州牧、大单于、河南王”。太子焮盘为镇西将军、左贤王、平昌公,用加官晋爵笼络乾归父子。但是并没有削弱其实力,乾归父子也没有打消背叛后秦念想。

晋安帝义熙六年(411)七月,乾归遣太子焮盘、次子中军将军审虔率骑一万攻打南凉秃发檀,在洪池岭战败僭檀太子秃发武台,缴获牛马十余万而还;十一日,在水洛城打败姚兴部将、南平太

守王憬,获七千多户,将其中四千余户徙于苑川,三千余户徙于谭郊(今临夏西北)。次年正月,乾归率军三万在枹罕讨伐西羌彭利发。利发抛弃众将士向南逃跑。乾归遣其侄儿振威将军乞伏公府(国仁子)追到清水,斩杀了彭利发。降其部众一万三千人。随后,乾归又遣兵士攻打金城。攻克金城后,捉拿了金城郡太守任兰。

晋义熙八年(412),乞伏公府因为当初年幼未继承父亲王位,一直怀恨在心,对叔叔乞伏乾归有“夺位”之仇。六月的一天,乞伏乾归在玉溪(今定西安定区西南)打猎,乞伏公府得到消息后,立即带领亲信将乞伏乾归和随同打猎十余人全部杀死。尔后投奔了大夏赫连勃勃。

乞伏炽盘与乞伏乾归的弟弟广武智达、杨武木奕展开追讨。将乞伏公府和他的四个儿子在崦嵫南山捉住,车裂于谭郊。平息内乱后,乞伏炽盘安葬了父亲,谥号武元王。同年八月继位,自称大将军、河南王,改年号为“永康”。并取消了原来设置的尚书令、仆射、尚书、六卿、侍中、散骑常侍、黄门郎官等。炽盘在位16年,他继承父业,东征西讨,重刑律,轻赋税,保境安民,执行民富国强的政策。武将战外,文臣治内,使西秦进入极盛时期。

在西部,炽盘灭南凉,逐北凉势力出湟河,并不断向西河进攻,掳掠人口;在南部,西秦多次击败吐谷浑,又取湟川,势力深入到今四川西北部羌族之地;在东部,于后秦灭亡前后,将势力扩展到上邽(今天水)一带。西秦的存在及其兴盛,对于陇右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都有重大的意义。

永康二年(413)七月,炽盘在柳州、渴浑川(今临泽县东南)大破吐谷浑别统支旁、掘逯,前后共俘获众男女二万八千人。次年五月,炽盘率骑兵二万袭南凉城乐都,南凉王秃发傉檀降于西秦,后又被炽盘毒杀,南凉从此灭亡。

永康九年(420)正月,炽盘立第二子慕末为太子,领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改元建弘。至建弘七年,西秦国内形势逐渐恶化。同年十月,以夏国呼卢古所率一支夏军与西秦左丞相昙达大战于苑川以南的崦嵫山,昙达兵败退走。呼卢古进逼

西秦国都枹罕。炽盘迁都保定连(今临夏东南)避之锋芒,以图再进。呼卢古遂攻入西秦以来,连下南安、苑川,攻围枹罕、湟河、西平,一路坑杀士卒二千余人,掠民二万余人,使西秦遭到了沉重打击。西秦对夏战争的惨败,国内财力严重透支,又使长期潜伏的不平等矛盾和民族矛盾公开爆发,被强迫征服的部落和各族人民纷纷相继起兵反秦,使西秦统治者内外交困,疲于奔命。

建弘九年(428)正月,西秦商州刺史领浇河太守姚谿叛降北凉。同年五月,西秦王炽盘病死,谥文昭王,庙号太祖。太子慕末即位,改元永弘。

429年二月,乞伏慕末平息内乱后,滥杀无辜,引起部众的反感和不安,很多人纷纷叛离逃出。

五月,北凉蒙逊再次向西秦进攻,慕末无力抵抗,只好留相国元基守枹罕,自己移迁保定连。境内苑川一带两次发生地震,草木皆自返“生毛孤雉入于侵内”,自正月起到九月天不下雨,居民流浪到外地,豪族官僚叛逆很多,无奈下,慕末派使者向北魏求援,请降于魏。魏以平凉、安定封授慕末。慕末便“焚城邑,毁宝器”《甘青宁史略》,率众逃往北魏封地。当慕末君臣临近上邽时,夏王赫连定发兵阻击。慕末前后受敌,只好退往南安(今陇西)。永弘四年(431),夏王赫连定向南安进攻,西秦将士纷纷出城投降大夏。慕末山穷水尽,只好口衔玉玺,率宗族500余人出城投降。不久慕末及宗族五百余人,全部为赫连定所杀。至此,西秦灭亡。

西秦王朝历时46年,期间公元400至409年,西秦曾被后秦击灭,西秦国王只作为后秦驻守陇右的一州之长而存在,但中国历史上仍然将这9年算在西秦政权存在的时间之内。毁于战火的西秦国遗址至今还残留在苑川河畔。

(作者单位:榆中县地方志办公室)



为国藏书

——文溯阁《四库全书》落户九州台

张兴国

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在兰州九州台建成,于2006年5月向社会全面开放。

文溯阁《四库全书》是仅存于世的四部《四库全书》之一,原存于辽宁省沈阳故宫博物院。1966年10月,中苏关系紧张,辽宁省革命委员会考虑到战事对《四库全书》可能造成危害,便请示中央采取措施对书籍进行保护。中央决定将《四库全书》调拨甘肃省保存。

40多年来,甘肃对《四库全书》的保护工作十分重视,每年开拨专款,派专人管理。1966年10月《四库全书》从沈阳运来兰州共载三火车皮,下火车后,装载12辆卡车运往永登连城鲁土司衙门保管,数年后又搬往榆中甘草店存放。2000年12月2日,甘肃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溯阁〈四库全书〉保护工作的决定》,将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提高到了法律的高度。经过较长时间的调研论证,地质勘探,多种方案对比,最后决定在兰州北山九州台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2001年12月,举行了奠基仪式,历时四年,先后投资5000多万元,2005年7月完成文溯阁《四库全书》主楼、副楼、办公楼的修建,该工程占地52.89亩。主楼外观与清代盛京(今沈阳)文溯阁藏书楼风格样式基本一致,但比其更为壮观宏伟,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设计,采用最新建筑材料,外观设计两层,内部三层,并下设地库。一、二层为展览厅,三楼存放《四库全

书》影印本,地库存放真本。占地1400平方米的副楼为学术研究和接待所用。2006年5月15日,甘肃省标志性文化工程——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向社会全面开放。这座依照明、清风格的书库文苑,在向中外参观者展现其风采的同时,使《四库全书》在新建的文溯阁四库馆内得到更为科学妥善的保存、研究和使用的。

《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许多都收载其中。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

20世纪80年代开始,辽宁省有关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向甘肃省表示要求返还文溯阁《四库全书》,沈阳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多次向两会提交议案,要求甘肃省返还文溯阁《四库全书》。为此,文化部曾专门召开会议协调。

辽宁方:提出文溯阁《四库全书》从成书后,便一直保存于沈阳故宫,1914年,曾被运到北京,1925年,在张学良将军的交涉下使其得以返回原

库保存。文革期间由于战备的需要才交由甘肃代管。文溯阁《四库全书》返回沈阳是“完璧归赵”，所以甘肃应将文溯阁《四库全书》“完璧归赵”，使其书阁合一。

甘肃方：当年该书是经中央批准拨交甘肃保存的，而这样国宝级的文物其所有权本身属于国家，因此，不存在归“赵”的问题。且甘肃省在40多年的保存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保存管护经验。目前，已为该书配备了高层次的专门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花巨资专门修建了藏书楼，确保《四库全书》万无一失。而且甘肃气候干燥，极其适合保存这样的古籍，《四库全书》在甘肃保存期间，书籍上的黄斑减少和消失。2000年7月，国家文物局、文化部等部门组织有关专家专门对文溯阁《四库全书》在甘肃的保存情况进行检查，结论是保存情况很好。因此，从有利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文溯阁《四库全书》还是应该由甘肃来保存。

为此，最终解决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保管权问题还须经国务院和文化部协调处理。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修，以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400余人。名人学士，如戴震(汉学大师)，邵晋涵(史学大师)及姚鼐、朱筠等亦参与进来。同时，征募了抄写人员近4000人，历时10载。至1782年，编纂初成；1793年全部完成。耗资巨大，是“康乾盛世”在文化史上的具体体现。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四库全书》馆设立不久，总裁们考虑到这部书囊括古今，数量必将繁多，便提出分色装潢经、史、子、集书衣的建议。书成后它们各依春、夏、秋、冬四季，分四色装潢，即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集部灰黑色，以便检阅。

因《四库全书总目》卷帙繁多，翻阅不易，乾隆帝谕令编一部只记载书名、卷数、年代、作者姓名，便于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的目录性图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总纂官纪昀、陆锡熊等人遵照乾隆帝的谕令，将抄入《四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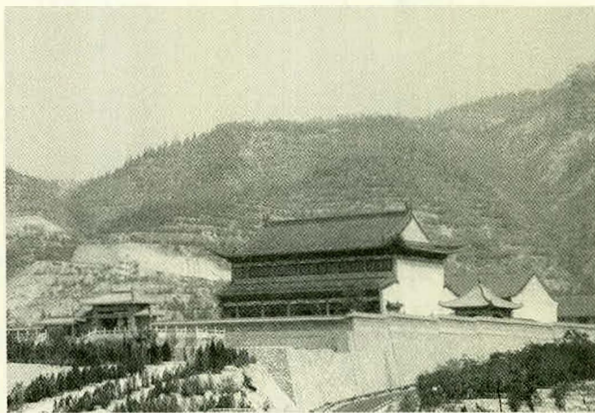
全书》的书籍，依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逐一登载。有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问题，则略记数语。此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告竣，共20卷。它实际上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

《四库全书》誊缮七部，分藏于紫禁城内的文溯阁、盛京(今沈阳)宫内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此为北四阁，又称为内廷四阁，仅供皇室阅览。另三部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即浙江三阁，又称南三阁，南三阁允许文人入阁阅览。

中国近代，由于战乱不断，七部《四库全书》中完整保存下来的仅存三部。文汇阁、文宗阁藏本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火；文源阁藏本被英法联军



沈阳文溯阁



甘肃文溯阁

(下转第56页)

麦积山碑文石刻记载的“山史”

王立武

麦积山的历史,简称“山史”,人们多注重麦积山石窟开凿的历史,今观之麦积山碑文石刻,认为还应注重麦积山山顶建塔的历史和麦积山建寺的历史。

一、麦积山石窟的开凿。南宋嘉定十五年石碑《四川制置使司给田公碑》记载“东晋起迹”,明崇祯十五年石碑《麦积山开除常住地粮碑》记载“自姚秦至今一千三百余年”,麦积山石窟千佛廊至上七佛阁云栈道旁崖壁石刻“麦积山胜迹,始建于姚秦”这些碑文石刻的记载,应为麦积山石窟的开凿历史。姚嵩应为麦积山石窟始开凿的地方官。宋本《方輶胜览》记载“在麦积山,后秦姚嵩凿山而修,千崖万像,转崖为阁,乃秦州胜景”。姚嵩,后秦主姚兴之弟,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与姚兴多有表诏往返,研讨佛理。在他担任镇西将军、秦州刺史期间始修麦积山石窟。度杯应为麦积山石窟开凿时的僧人。度杯,因“常乘木杯渡水”而得名,其真实姓名反不被人知晓,列《高僧传》(卷十)。庾信名作《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龕铭并序》,此文曾在麦积山石窟刻石,因地震遗失,明嘉靖重刻。“是以飞锡遥来,乘杯远至;疏山凿洞,郁为净土。拜灯王于石室,乃假馭风;礼花首於山龕,方资控鹤。”其中的“乘杯”即度杯,讲述了度杯在麦积山“拜灯王于石室”,造过去世燃灯佛。与之对应的有第78窟。第78窟是人们公认的最早开凿的洞窟之一,内容为三世佛题材。

二、麦积山山顶始建佛舍利塔。北宋靖康元

年石碑《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堡瑞应寺再葬佛舍利记》说“阿育王始初□(兴)建号无忧□(古)寺至我宋乾德四年计两千年,又至靖康二年计一百□(七)十年”。清著名教育家任其昌在《游麦积山记》中说,麦积山“第一洞外崖间嵌一断碣,文前十余行尚可读。大略言山上塔为阿育王八万四千宝塔之一”,清著名学者张翀翻在《麦积山记》中说“传自阿育王创舍利宝塔于山巅”。清代砖塔铭:“重修麦积峻岭佛舍利塔一座,递代相传,初自阿育王所造”,“麦积,天水胜境。闻起自阿育王”。清代铁钟铭:“其碑记、钟铭尚有存者,则云自阿育王构舍利宝塔于山顶。”讲述了麦积山山顶始建佛塔年代为阿育王时代,应为信史。其理由:(一)这些铭文的记载传承有序,记述清楚一致,且与历史上的阿育王建八万四千宝塔的记载相一致。(二)麦积山地处丝绸之路与古蜀道的交汇处,在周秦时期又处“西陲”,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客观地讲这里受印度文化(佛教文化)的影响首当其冲。(三)麦积山风景秀丽,景色怡人,历史悠久。放马滩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木板实物地图;有秦文公墓,隗器雕巢峪避暑宫等人文历史,这里应是传播佛法的首选地之一。从各个方面来说,这里应是阿育王八万四千宝塔传法地之一,且名称为“舍利宝塔”。

三、麦积山始建山寺。清铁钟铭记载“至周穆王选胜遨游,亲历此山,敕赐舍利山灵安寺”。麦积山北魏壁画,第127号窟窟顶后坡绘穆天子拜见西王母。此画绘制在梯形坡内,梯形坡上底4.75

米,下底 7.35 米,高 1.23 米,依据《穆天子传》绘制,呈长卷式。其左侧剥落严重;中部残存车马人物、山林建筑等;右侧多绘人物,表现穆天子拜见西王母的情节。画面绘制了大规模的出行场面,自左至右有车三乘:第一车旌旗猎猎,呈疾驰状;第二车行进已缓,或竟已停止;第三车,乘者下车,似王者身份,束发戴冠,身穿袍服,在众人簇拥下由东向西徐徐前进。上有罗伞宝盖,旁有山水树木,迎面有几个身穿长衫的人物伫立迎候,其中一人手牵红马一匹,当为西王母迎接穆天子的情形。人物形象丰满潇洒,布局疏密相间,是一幅生动的人物山水画。这是麦积山现有保存的壁画中唯一一幅与佛教题材无关的人物壁画。《法苑珠林》记载“为周穆王所建,名曰灵安寺”。由于此说缺少相关的佐证资料,在麦积山的正史中不被引用,笔者认为不妥,其理由:(一)史学家普遍认为,在佛教东汉正式传入我国之前的周秦时期,印度文化(佛教

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隐隐约约、断断续续地存在着。这种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必然有着附着点,且留下一定的印记。麦积山就应是这一文化传播的附着点之一。(二)周秦时期记载工具的限制,再加上天灾人祸,大量书籍被毁,一些历史以传说的形式继承下来,不能只承认书籍传承历史的形式,否认其他传承历史的形式。不能认为现存古籍上没有的,历史上就不存在。(三)“周穆王建灵安寺”已成为麦积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谁也不能将有关铭文凿平,将有关壁画涂去。笔者认为,至少将周穆王建灵安寺作为周秦时期,印度文化(佛教文化)传入我国的特别印记之一,在麦积山“山史”中特别记之。(注:专题特记现已成为志书体例之一)

参考资料:《天水市志》《麦积山石窟志》

(作者单位:天水市麦积区地方志办公室)

(上接第 54 页)

火烧圆明园时焚毁;文澜阁所藏亦多散失,后经补抄基本得全,然已非原书。

1948 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往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一些珍贵藏品运往台湾时将《四库全书》中最为珍贵的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带到台湾,该本现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原藏于辽宁省图书馆,1966 年 10 月移交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由于《四库全书》由乾隆敕编,为了显示自己统一全国的“十全武功”和“超越汉唐”的文治政策,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在整个征集图书的过程中凡是认为有“违碍”、“悖逆”的文字,概于摒弃和销毁。根

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有关档案记载,全毁书 2400 多种,抽毁书 400 多种,铲毁、烧毁书版七、八万块,几乎与《四库全书》的数量接近。并删改原文,认为凡是对金、元、清人有诋毁侮辱处则多加改变,甚至成段删除。同时大兴“文字狱”,《四库全书》开馆后 10 年内发生了 48 起“文字狱”。这对于一部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巨著无疑是不可弥补的遗憾。

《四库全书》是中华文化精深大气的根本体现,完全可以成为它所居住的这个城市的文化符号。所以,我们将深为文溯阁《四库全书》馆落户甘肃兰州而高兴和骄傲。

(作者单位:兰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西汉卤县濯水位置考

薛方昱

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列出了一些无考县名，如西汉北地郡的除道、五街、回获，陇西郡的予道，天水郡的奉捷、兰干，安定郡的复累、安俾、卤县。其所以成为无考县，是因为这些县在东汉或魏晋以后，建置撤并中断，长时期再未置县，故东汉以后的史书和《水经注》及全国地理总志失予记载，成了历史的悬案。笔者对上述今甘肃境内无考之县，虽经多年调查研究，但苦于缺乏资料，效果甚微。现仅就西汉安定郡的卤县和流经该县的濯水、滹沱水地理位置，作些初步考证。

一、从古代文献记载看滹沱水的地理位置

《汉书·地理志》安定郡下记：

卤，濯水出西。

师古曰：“濯，音其于反”。

这就是古代关于卤县和濯水的唯一资料。正因为这样，东汉以后的经学家、注释家、方志学家望而止步，再未深究。

看来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得从滹沱水入手。滹沱，又叫滹池。秦汉时我国有两条滹沱水：一条是源于秦汉时的代郡，西晋时叫雁门郡，即今山西省五台山东北，西南流，又东南流，汇入黄河的滹沱河。

《汉书·地理志》代郡下记：卤城，滹沱河东至参(合)(户)入滹池别，过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从河东至文安入海。

师古曰：“滹音呼。”

这条滹沱水，古今名称未变，其地理位置为学术界所公认，故不赘述。

另一条滹沱水，在汉代的安定郡，即今甘肃平凉市南、泾川县城西的今汭河。这条滹沱水，很少见于史书记载，长期被人们冷落，但却是一条历史悠久的河流。

《穆天子传》卷一记：

戊寅，天子北征，乃绝漳水。

庚辰，至于口，觴天子于盘石之上，天子乃奏广乐，载立不舍，至于钗山之下。

癸未，雪雨，天子猎于钗山之阿，于是得绝钗山之队，北循滹沱之阳。

乙酉，天子北升于口，天子北征犬戎，犬戎胡觴天子于当水之阳。天子乃乐，口赐七萃之土战。

庚寅，北风雪雨，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属休。

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隄之关隘。

乙亥，至于焉居，禹知之平。

《穆天子传》中的“滹沱”，古今学者都认为是水名，即滹沱水(河)，但对其地理位置看法不一。晋代人郭璞曰：“滹沱河在今雁门卤县”。民国人顾实依其说，以为“即今山西滹沱河上游^①。”当代人岑仲勉则另辟蹊径，认为“滹沱河为泾水正源”^②。笔者考诸史料，认为《穆天子传》中的滹沱，是泾水支流的今汭河，而非源于秦汉代郡、西晋雁门郡的今山西滹沱河。

《后汉书·西羌传》:

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百鹿,四百狼,王遂迁戎于太原。

这次穆王西征犬戎,《史记·周本记》、《汉书·匈奴传》均有记载,内容大同小异,此省略。被征伐的大戎,就是《毛诗疏》云的“犬戎昆夷”。西周时昆夷居陇山东西,即今甘肃平凉市、天水市北及宁夏固原地区。穆王征犬戎,何能寇在西边,兵却东出,到今山西东北的淳沱河流域。笔者大体同意岑仲勉的看法,认为穆王西征的路线,是从今西安市西南郊区的周都镐京出发,沿陕西关中的渭水北边西行,所经的“漳水”,即上古时的姜水,现在的雍水河。然后沿汧水河谷西北行。所经的“汧山”,在今陕西陇县西北陕甘交界之处^⑧。所经的“淳沱”,就是流经甘肃平凉市华亭县的今汭河。到达的“焉居,禹知之平”是指焉居、禹知西周时所居的今陇东黄土高原。焉居即焉氏,也称乌氏,战国时曾在泾水上游的今平凉市置乌氏县。禹知,即月氏,西汉时曾在此置月氏县。详见拙作《先秦月氏居地初探》,这里就不重复了。

二、从西汉淳沱苑·淳沱水的演变看卤县的大体位置

西汉早期在今汭河上游的华亭县地置淳沱苑,因淳沱水而得名。西汉末的平帝二年罢淳沱苑,改置安民县,《汉书·平帝记》:

元始二年……罢淳沱苑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于耕牛籽种食。

《水经注·渭水》瓦亭水下的略阳川水记:

建武八年,中郎将来歙与祭遵所部护军王忠,右辅将军朱宠,将二千人,皆持卤刀斧,自安民县的阳城,元始二年,平帝罢安定淳沱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从番须、回中,伐树木,开山道至略阳……

案:番须,在今平凉市泾川县南黑河乡的盘口村。回中,山名,即今泾川县城西一公里处的回中山。略阳,县名,两汉魏晋时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的蔡河村,又名大城村,今有大城小学。番须道,从今泾川西行,经崇信、华亭,西越陇

山至庄浪县的一条小道。

西汉安民县,东汉初建置尚存,其地理位置,范文澜在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在甘肃的华亭县^⑨。安民县由西汉军马场淳沱苑改置,淳沱苑由淳沱水得名,这就说明淳沱水为发源于陇山东麓,东流经华亭、崇信县城,于泾川县城西1公里许汇入泾河的今汭河。

今汭河,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时,本名淳沱河,非汭河。上古真正的汭河,是今之黑河,发源于今华亭县南神峪乡陈家河西山。汭水,又作芮水,是我国最早的河流之一,始见于《诗经·大雅》公刘:“止旅乃密,芮鞠之即。”商代时的芮国,居汭水上游,后随周文王进入关中,随武王伐纣有功,封迁于今陕西潼关渭水以北、黄河以西之地,春秋时为晋国所灭。

淳沱水,以后又叫铜城川水、阁川水。明代中期赵时春撰《平凉府志》时,根据当时泾川县名士《穷汭记》和平凉府分巡道武全文《汭源辨》的观点,将古时的淳沱水,当时的阁川水误写为汭河。清代乾隆年间撰的《甘肃省通志》和后来修的《泾川县志》等未加考辨,照搬《平凉府志》,以讹传讹,给后来修志和历史地理研究造成了混乱。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是沿伪袭非,将上古时的淳沱水记为汭水,将汭水记为黑水。(详见拙作《新补泾水并注》^⑩和祝世林著《平凉古代史考述》313—318页。)

无独有偶,西汉代郡和安定郡的两条淳沱河流域。均置有卤县,这就为我们研究西汉安定郡卤县的地理位置打开了一扇门。卤字一般与产盐有关,如今甘肃礼县的盐关,古时就叫卤,可古淳沱水今汭河流域,据调查询问,并不产盐,志书也无这样的记载。这个卤字,可能与大泽、湖池、沼泽有关,故淳沱水又称淳池水。那么安定郡卤县的位置究竟在何处呢?

三、从出土文物看卤县濯水的具体位置

1990年,笔者参加《崇信县志》评议期间,参观了县博物馆,作了些实际调查,了解到该县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时,在县境挖出了数处战国至秦汉时的墓葬,内中出土了一些

陶器,上有鹵字(现存县博物馆)(详见1997年出版的新编《崇信县志》第三十章文化节中的古墓葬)。联系上述历史文献,结合当地出土文物,我们可以初步认定西汉安定郡的鹵县,就在今平凉市的崇信县境内。关于治所,史书和志书均无记载。这还得从出土文物入手。前述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梯田水利时,在崇信县城西4公里的刘家沟村附近,挖出了大面积连成一片的古代聚落遗址,内中出土有盆、罐、瓦、砖等遗物,经文物考古专家鉴定为汉代遗存。这里北临汭河、南依山塬,东西为河谷冲积平川和台阶地,具备古代建城立邑的条件,所以我们初步认为西汉鹵县的县城就在崇信县城西的刘家沟村附近。

西汉鹵县的地理位置初步定下后,出西的“濯水”迎刃而解,就是原溇沱水,今汭河的下流。但就整条水而言,西周至秦汉、三国,该水仍叫溇沱河,只是以后被铜城川水、阁川水、汭河取而代之。也就是说溇沱水,包括濯水早已被历史的长河所淹没,今天我们求本探源,只是为恢复它本来的历史

面目而已。

注①见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②见岑仲勉《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原载《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二期

③唐·李贤注:汭山,陇山之间也,在今陇州汭源县。案:唐陇州汭源县,即今陕西宝鸡市陇县

④见《甘肃史志》2010第三期

⑤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二章

⑥见《甘肃史志》2010第二期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原副编审)



《白银市年鉴丛书(2010)》发行

目前,由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持编纂的《白银市年鉴丛书(2010)》陆续开始发行。

《白银市年鉴丛书(2010)》包括《白银市年鉴(2010)》、《会宁年鉴(2010)》、《靖远年鉴(2010)》、《白银区年鉴(2010)》、《平川年鉴(2010)》,总字数约280万字。《白银市年鉴》创刊于2004年,原名《白银年鉴》,自2011年起更名,由内部资料改为公开出版物。各县区年鉴均属创刊。丛书编辑工作自2010年3月

始,实行统一部署、同步进行、同步完成、统一标准;各县区独立成卷(册),五卷合一,精装成(套)盒,统一发行的模式。丛书详细记录和客观反映了2010年全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现状。

据悉,县区统一启动综合年鉴编纂工作,这在全省还是第一次,这表明白银市综合年鉴编纂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

(白银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冉彩霞供稿)

甘肃民国大事记(1937—1940)

民国 26 年(公元 1937 年)

1 月

1 日 红 5 军攻占高台县。守城保安队和民团 1400 余人投降。

△ 在中共东北军地下组织的倡导下,平凉国民党《新陇日报》改为《人民日报》,突出宣传“西安事变”经过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等。

△ 西路军总部、红 9 军、30 军分别进驻临泽东南之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

2 日 临泽县倪家营子村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平分了 5 户地主土地近千亩,焚烧了地契,并发放土地证、通知单。

12 日 马步芳、马步青以 4 个旅、3 个团及部分民团共 2 万余人围攻高台县城。红 5 军浴血苦战,终因寡不敌众,于 20 日失守。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 3000 余名指战员壮烈捐躯。

24 日 西路军全部集中倪家营子固守。马步芳、马步青以 8 个多旅兵力,分三路包围。西路军坚持战斗近一个月,歼敌 7000 余人,于 2 月 21 日突围。26 日重返倪家营子。3 月 5 日,再次突围后,转移至沙河镇。

是月 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将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环县 5 县划为红军募补区域。

△ 中旬,红 28 军、32 军组成追击军,移驻平凉郊区。司令员罗炳辉进城与东北军驻军、平凉专员及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组织抗敌后援会、救国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扩大红军。2 月下旬,奉命参加援西军序列,离开平凉。

△ 中共庆阳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对外称“庆阳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4 月,改为中共庆

阳县委。

2 月

10 日 中国共产党本着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宗旨,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明确表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27 日 中共中央军委以 4 军、28 军、31 军、32 军及骑兵团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拟西进援助西路军。3 月初,援西军进驻镇原一带。

是月 周恩来派马德涵并张文彬、马宪民到武威与马步青商谈,要求不要杀害并释放西路军被俘人员。

△ 蒋介石背信弃义,在南京扣押张学良。以处理东北军善后为名,免去于学忠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职。东北军 51 军随之陆续调离甘肃。

3 月

7 日 西路军转战临泽西南三道柳沟,与尾追的重兵恶战 5 昼夜。11 日进入张掖梨园口,与马军再战,部队伤亡严重,红 9 军政委陈海松牺牲,全军已“不满二千之众”。

13 日 西路军全部退入祁连山。在马场滩、石窝山等地与马部血战,265 团、267 团和妇女团全部损失,总部供给部长郑义斋牺牲。14 日下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召开干部大会,决定陈昌浩、徐向前东返陕北;部队分编为 3 个支队,在祁连山打游击;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剩余部队的行动,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

23日转战于祁连山的西路军左支队，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中央电示：团结一致，保存力量，视情可向新疆或蒙古转移。在祁连山战斗中，西路军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牺牲。

是月中共合水县委成立，对外称“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

△ 陕甘宁省设立定环县，同时成立中共定环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同年10月撤销。

4月

2日国民党政府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未到职前，暂由教育厅厅长田炯锦代行。

26日李先念率西路军左支队在红柳园与马部一个团激战，冲出包围，向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前进。是为西路军西征中之最后一战。

是月张文彬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兰州，同进步医生、兰州福陇医院院长高金城商谈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事宜，并到设在拱星墩的“感化院”看望被俘人员。

△ 红9军军长孙玉清因负伤难以继续西进，在酒泉南山金佛乡观山河谷被俘。5月被杀害于青海西宁。

5月

1日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派出满载被装、药品、食物的40辆汽车，到星星峡迎接和慰问400多名西路军指战员。至此，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历经180多天，以2.18万人的力量，与马步芳、马步青所部及地方民团7万余兵力奋战，经大小战斗70余次，歼敌2万余人。西路军7000余名将士（内团以上干部约140人）牺牲，9000余人被俘，其中5000人惨遭杀害，还有1300多人流落在甘、青、新、宁一带。

2日中共中央苏区代表会议于是日至14日召开，决定改陕甘宁省为陕甘宁边区。15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党代会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宁边区党委。在甘肃境内建立庆环分区（9月正式成立），马文瑞任书记，马锡五任专员，王世泰任保安司令。下辖华池、赤庆、环县、曲子、固北、定环、盐

池等县。

17日国民党政府任命贺耀组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在省主席朱绍良未到职前，暂代省政府主席。

29日中共中央派彭加伦、张文彬、朱良才、况步才、黄文斌、王大成、刘富秀到达兰州，筹设驻兰州办事机构，借南滩街54号办公，对外称“彭公馆”。是为中共在兰州的半公开机关，即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前身。

是月中共驿马关县委成立，对外称“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

6月

是月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组建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由史悠时担任队长，队员有地质学家孙健初及美国地质学家。对玉门石油河一带进行重点调查。同年9月，孙健初等又对玉门石油河地质构造进行普查，并写出调查报告。

△ 中共镇原县委成立，对外称“抗日红军援西军留守处”。

△ 国民党政府将1300多名西路军被俘人员押往西安。途经平凉飞机场，方强、秦基伟等100余人脱险。

7月

2日国民党甘肃省决定设立华家岭高空测候站。

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八年抗日战争开始。

12日甘肃省各族各界通电慰劳卢沟桥前方抗日将士。17日，兰州市民集会，并成立“甘肃民众抗敌后援会”，开展宣传、募捐、民众防空等抗日救亡活动。

29日，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乘飞机抵兰州。当晚与国民党甘肃省代主席贺耀组就国共合作抗日和西路军被俘人员问题进行商谈。

是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派驻兰州副主任办公厅成立。贺耀组兼任副主任。

△ 国民党政府治安部门在额济纳二里子河及西安等地破获日本特务机关两起。捕获间谍长江崎寿夫、大西俊仁、松本平八郎、横田等 13 人及汉奸 5 人。

△ 中共陇东特委在庆阳成立,以“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的名义对外开展工作。袁国平、李铁轮先后任书记。次年 7 月合并于环庆分区党委。

8 月

7 日 高金城受谢觉哉重托,以“甘肃省甘凉肃抗敌后援委员会”主任身分,前往张掖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高以开设“福音医院”为掩护,共营救红军 200 多名。1938 年 2 月 3 日,高金城被马步芳部师长韩起功残杀于张掖,终年 52 岁。1951 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民政厅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

13 日 国民党甘肃省代主席贺耀组,新编第 1 军军长兼兰州警备司令邓宝珊等人,以甘肃省代主席、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名义,在兰州“励志社”公开宴请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中共驻兰州办事处筹备处长彭加伦等人,商讨民主建国、合作抗日等问题。

23 日 贺耀组夫人倪斐君响应何香凝号召,成立甘肃妇女后援会,并任会长。中共党员邢华等为该会骨干。

24 日 驻岷县的地方军阀鲁大昌为泄私愤和控制藏区,先控告卓尼世袭土司杨积庆私通红军,开仓济粮未果。是日又派人并诱使杨部团长姬从周一,杀害杨积庆及其长子杨琨夫妇。

25 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 月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将原驻陇东的援西军改编为八路军 129 师。

△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在兰州南滩街 54 号(今互助巷 2 号)成立。谢觉哉任党代表,彭加伦任处长。

下旬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以 129 师

385 旅(不含 769 团)为骨干,组成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肖劲光任主任。统一指挥陕甘边区部队,担负保卫边区的任务。

9 月

6 日 陕甘宁特区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设延安。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下辖 4 个分区、23 县。在甘肃境内设庆环分区,驻曲子镇。刘景范、马文瑞先后任中共庆环分区委员会书记,马锡五任分区督察专员,王世泰、吴岱峰先后任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新正、新宁 2 县,由关中分区管理。各级苏维埃政府亦同时改名为抗日民主政府。

24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土地所有权条例》。是年冬,庆环分区各县停止土改,实行“三七减租”。已经土改的地区,颁发了“土地所有证”。

是月 国民党甘肃省代主席贺耀组成立甘肃省军事运输处,办理征集运输工具、接运苏联援华物资。

△ 中共党员蔺克义、刘杰、郑重远、窦志安等先后奉命来到兰州,在孙作宾领导下,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并寻找、审查和恢复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

△ 国民党政府新 1 军军长兼兰州警备司令邓宝珊调职离甘。

10 月

26 日 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甘工委,亦称兰州工委)在兰州成立。孙作宾任书记,郑重远负责组织工作,刘日修负责青年工作,吴鸿宾负责宣传兼回民工作,刘杰负责妇女工作。甘工委成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从 1938 年初到 1939 年初,相继建立了兰州市委和榆中、凉州、靖远、徽县县委及兰州回民特支等组织,发展党员 264 人。

是月 国民党政府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在兰州成立,辖甘、宁、青、新 4 省。蒋介石兼任长官,朱绍良任副长官。

△ 八路军 385 旅进驻陇东、旅部驻庆阳县城。

△ 苏联在兰州设立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苏联志愿航空队百余人到达兰州。有各种飞机50余架,援助中国抗日。

△ 庆环分区环县、曲子县、固北县、华池县分别召开第一次参议会。

△ 中共庆环分区第一次代表会召开,总结工作,改选分区党委,部署抗战运动。

11月

5日 日机7架,首次空袭兰州。投弹轰炸了兰州东郊飞机场、靖远东湾等处。从是日起,到1944年,日寇先后出动飞机993架(次),轮番对兰州、皋兰、平凉、天水、陇西、武威、临洮、永靖、永昌、清水、靖远、景泰、永登等县,市狂轰滥炸。共炸死660余人,伤680余人。造成财产损失达法币64.8亿多元。仅1939年12月下旬,日机连续3天出动306架次,对兰州进行轰炸,就炸毁房屋2万余间。著名唐代建筑普照寺被毁,6358卷藏经化为灰烬。

20日 国民党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国民政府由南京迁驻陪都重庆。

26日 西路军部分领导人李先念、李卓然、周小舟、曾传六、李天焕、郭天民等,由新疆途经兰州前往延安。

△ 甘肃省会防空司令部成立。兰州内、外城增辟城门8处,东郊区挖防空壕数百处。

是月 西路军被俘战士1500余人,被马步芳由青海押送西安途中,经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和驻西安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获得自由,回到延安。

12月

10日 国民党甘肃省代主席贺耀组调职,由朱绍良兼任省主席。

是月 中共甘工委领导的兰州市学生委员会(简称学委)成立,统一领导各学校和社会青年中党的工作。1938年7月改为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委)。

△ 谢觉哉代表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与国民

党甘肃省协商关于陇东划界和在募补区征兵、征粮等问题,并达成协议。

△ 靖远籍青年学生张生强、陈定邦等,经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介绍,赴延安学习。是为甘肃第一批赴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

是年

△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领导和影响下,兰州各抗日救亡团体如“甘肃青年抗战团”、“省外留学生抗战团”、“伊斯兰学会”、“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抗日民族先锋队”、“回民教育促进会”等先后成立。同时,涌现了“血花剧团”、“王氏兄妹剧团”、“新西北抗战剧团”等文艺宣传组织,创办《回声》、《西北青年》、《热血》、《抗敌》、《妇女旬刊》、《号角》、《民众通讯》、《老百姓》等抗日刊物。“同仁消费合作社”、“兰州派报社”、“生活书店兰州分店”、“新声书店”等经销进步刊物、书籍的书店也相继涌现。

△ 是年和1938年,文化界进步人士和演剧队张仲实、肖军、塞克、吴渤、顾颉刚及“新安旅行团”、“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等相继到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在《甘肃民国日报》上开辟《西北文艺》、《剧坛》副刊。

△ 国民党甘肃省设立新兵招募处。旋改名甘肃师管区筹备处。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分配甘肃每月应征兵额5000名(自1938年1月起,减为2000名)。

△ 国民党甘肃省设置卓尼设治局。

△ 嘉木样五世派代表率由拉卜楞寺所属各寺院、部落组成的慰劳抗日前方将士代表团,赴前线慰劳。

△ 本年整编保甲,统计出甘肃全省人口为615.6192万人。

△ 兰州阿干镇煤矿由官商组织联合公司继续开采。官股占十分之六,商股占十分之四。

△ 甘肃全省旱、雹、水灾严重,受灾54县,不少灾民逃外度荒。

△ 截至年底,全省共有公、私立小学3156

所;普通中学 15 所,中等师范学校 13 所,职业学校 1 所;高等学校仅有甘肃学院 1 所(有学生 73 名)。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不足 14 万人。

△ 甘肃籍画家李丁陇和刘方到敦煌莫高窟,临摹绘画百余幅,向外界介绍了敦煌艺术。

△ 庆环分区于环县建立农村剧校。1943 年改名陇东剧团,解放战争中改名陇东文工团。

民国 27 年(公元 1938 年)

1 月

11 日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决定,本年预征田赋一年,以六成作军粮、四成作价充作军费。

是月 国民党政府以抗战开始后财政困难为由,自本月起,除军、警及小学外,全省各机关薪金、办公费一律按六五折发放,中等以上学校按七折发放。

2 月

6 日 伍修权继任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处长。10 日彭加伦离兰。13 日,办事处迁至孝友街 32 号(今酒泉路 157 号)。

是月 国民党政府第八战区政治部、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国民党甘肃党部联合成立甘肃民众抗敌后援会。宣布各抗战群众团体归其管辖,并办理登记手续。

△ 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开始定期举办时事座谈会,讨论“三民主义与抗日救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谢觉哉、伍修权经常到会发表演说,宣传抗日主张,与反动政客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

3 月

20 日 国民党政府第八战区司令部布告:民间藏有银币、银类者,限期向“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兑换法币。

31 日 国民党政府第八战区、省政府、省党部联合成立新闻刊物审查委员会,查禁兰州同仁消费合作社、兰州书报社、生活书店出售的进步书刊

达百余种。后经周恩来、谢觉哉多次交涉,始将《新华日报》、《抗战》等报刊解禁。

是月 罗云鹏来兰,任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 国民党甘肃省党部通令:整顿民众团体,一切集会须经批准方能举行。并由党、政机关派人指导监督,违者应受惩处。

△ 在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及中共甘工委的帮助下,“甘肃在乡军人抗日联络委员会”在兰州成立。成员有王子元、王仲甲、李和义、肖焕章等人。

春 在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影响下,陕甘宁边区所辖陇东地区一些地方的中共组织把革命群众团体工会、农会、青救会、抗日自卫队等交给国民党官办的“抗敌后援会”,使群众工作受到极大损失。

△ 中共陇东特委机关报《救亡报》创刊。1942 年 7 月改名《陇东报》。是为中共在甘肃创办的第一张党报。

△ 中共甘工委机关刊物《党的生活》创刊,在兰州上西园圣母宫地下印刷所印刷。

△ 定环县撤销。所辖地区分划环县和定边县。

4 月

1 日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成立戏剧审查委员会。

12 日 土匪赵思忠(赵老五)袭击驻河连湾的中共环县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机关,杀害干部、群众 10 余人。

17 日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庆环分区各县陆续设立工会委员会。

23 日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于玉门以北马鬃山地区设立肃北设治局。局治梧桐井。

是月 陕甘宁边区鲁迅师范学校由延长县迁驻新正县马家堡。

△ 固北县撤销。所辖分划环县、固原。

△ 玉门县花海乡白喉流行,因无人防治,传染区扩大。病尸暴露荒野,无人掩埋。

5月

是月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水成成立国立甘肃临时第一中学。收容战区失业教师、失学学生。该校分设高中、初中、师范、职业4部。旋改名为“国立五中”。

6月

23日 国民党政府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规定“战时检查邮电办法”4条。省政府转令各县、局遵照执行。

是月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规定各省专员、县长兼理军法事务。并公布兼理办法10条。省政府令全省遵办。

△ 兰州救亡报刊《热血》、《老百姓》、《妇女旬刊》、《西北青年》等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随后，又下令解散“甘肃青年抗战团”、“平津学生演剧团”等救亡团体。

7月

△ 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改组。朱绍良任主任委员。

12日 苏联援华军用物资汽车2部，在榆中县金家崖遭土匪抢劫，并击伤苏联驾驶员。5名匪徒在宁定（今广河县）县太子寺被捕，押解兰州处决。

是月 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派梅贻宝、顾颉刚等来兰筹办甘肃科学教育馆。设农村经济、社会教育、营养卫生及理化、工业、生物、农业等股。1939年1月1日正式开放。以梅贻宝为馆长。

△ 中共陇东特委决定，成立平凉市委。

△ 陕甘宁边区陕北公学迁驻新正县看花宫。

8月

15日 临洮县洮惠渠竣工。渠长28.3公里，灌溉面积2.7万亩。为甘肃省首创第一项新型渠道工程。

16日 甘肃电灯厂改由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与省政府合资经营，更名兰州电厂，并增添设

备。所属3个发电所。总发电能力270千瓦，年发电量最高为12.5万千瓦小时。

是月 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迁至平凉；原北平西北公学在兰州小西湖设立分校，名西北中学。

△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兰州挑水夫为索要国民党甘肃省一些部门拖欠水费和反对“集训”，进行罢工，并聚集省政府和警察局门前请愿，斗争取得胜利。

9月

5日 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离开兰州，返回延安。谢觉哉在兰期间，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进行艰苦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并写出60多篇文章，宣传抗日，指斥甘肃的政治腐败，揭露和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行径。对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加强甘肃地下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是月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水成设立“陇豫公学”，收容流亡学生就学。该校分小学、初中、高中三部。1939年夏迁至清水县，改名“国立十中”。

10月

10日 中苏文化协会兰州分会成立。由国民党政府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任会长。

是月 蒋介石令朱绍良、胡宗南调集军队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在水成双石铺设立预备指挥所。

11月

7日 兰州造币厂开始铸造铜辅币。

28日 蒋介石辞国民党政府第八战区兼司令长官职。由朱绍良继任。

△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成立，程潜任主任。

12月

26日 甘肃油矿筹备处严爽、孙健初、靳锡庚和探测工等8人到达玉门老君庙，开展油矿勘探

测绘工作。1939年3月,经资源委员会请求,周恩来同意,从陕甘宁边区延长油矿抽调钻机两台和32名工人到玉门打油井。同年8月11日,老君庙油田第一口井钻至115.51米时,开始喷油。日产原油10吨。从1939年至1949年底,玉门油矿共钻井48口,进尺2.6万米;生产原油52.4353万吨,占同期全国原油总产量的90%以上;加工原油51.0362万吨,生产汽油10.15万吨,煤油3.91万吨,柴油5283吨。

△ 驻西峰镇的国民党政府军165师突入陕甘宁边区的白马铺、赤城等地,寻衅闹事。

是年

△ 国画大师张大千从四川前往敦煌莫高窟考察。1941年3月8日,张大千第二次前往敦煌千佛洞,费时5月余,对300个石窟进行编号,并临摹敦煌壁画276件。后于四川成都举行画展,轰动一时。

△ 皋兰、榆中农民不堪国民党政府残酷掠夺,利用“无极教”在皋兰北山一带组织“抗兵抗粮”斗争。靖远、景泰、永登、陇西等县农民纷纷响应,遭军警镇压失败。

△ 本年甘肃全省学龄儿童约70万人,入学儿童15万左右。失学率近80%。

△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发行“甘肃省建设公债”法币200万元。至1944年底,只还本29万元,付息39.4万元,尚欠本息171万元,未予归还。

△ 本年甘肃国民党统治区派苛捐杂税多达35种。仅皋兰一县征收杂税即达19万元。

△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兰州东教场开办西北训练团。蒋介石兼任团长。训练第八战区所辖各省中、下级行政人员。至抗战胜利后结束,共办8期,受训人数约5000余人。

△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西北日报》印刷厂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兰州汽车厂工人百余人,为争取工人地位和不准打骂工人举行两次罢工,斗争均取得胜利。

△ 国民党政府“军统局”建立兰州站。后易名“西北区”、“西北特区”。1949年8月兰州解放时,

全省共建立组、站、台166个,有特务分子3514人。

民国28年(公元1939年)

1月

是月 著名作家茅盾率一支文艺队伍赴新疆途经兰州,滞留两个月,积极参与兰州抗战文化活动,并撰写《抗战与文艺》等论述。

△ 由国民党主办的图书发行机构“正中书局兰州分局”在兰州绸铺街成立。

△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甘肃省政府旋即转发国民党《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异党问题的实施方案》,强迫公务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

2月

1日 兰州至天水、天水至双石铺公路开始营运。

4日 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届会议结束。选举高岗为议长,谢觉哉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

5日 国民党政府甘肃军管区司令部在兰州成立。省主席朱绍良兼任司令。下辖兰肃(兰州至酒泉)、平秦(平凉至天水)两个师管区,并在武威、陇西、天水、武都成立4个团管区。1941年,全省划为陇右、陇东、陇南、武都4个师管区。

21日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致电第八战区东路指挥部总指挥鲁大昌及165师师长王治岐,就国民党政府军开入庆阳县属之白马铺、赤城镇一带进攻和包围八路军385旅一事提出抗议。要165师迅速撤回原防,并保证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是月 中共陇南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天水支部的基础上成立。9月撤销。

3月

是月 国民党政府中央航空公司渝哈线(由重庆经兰州至哈密)和兰渝线(由兰州经南郑、成都至

重庆)、兰包线(由兰州经银川至包头)、兰宁线(兰至西宁)通航营业。

4月

8日 国民党军政人员在陇东蓄意制造摩擦事件。是日,国民党甘肃省府第3区专员钟竞成派一个保安中队窜到镇原县屯子镇南三镇,抓走中共镇原县委组织部长等10人。11日,国民党镇原县保安队又在太平镇劫走八路军385旅3营的7名采购人员。21日,国民党政府军165师1个营配合西峰镇保安队百余人开进太平镇,阴谋里应外合,袭击八路军驻防部队,阴谋未逞。29日,国民党政府宁县县长方振武亲率保安队、壮丁队700余人向驻宁县县城的八路军一个营突袭,打死副连长等8人,伤13人。该营起而自卫,经两天三夜激战,打死打伤来犯者40余人,缴获长短枪67支。保安队被击溃。

是月 兰州全陇希社、兴文社等八社团,为纪念创办人刘尔忻(果斋),筹建兰州私立志果中学(今兰州市第二中学前身)。1940年暑期开始招生。赵元贞任校长。

5月

3日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致电蒋介石,就镇(原)宁(县)两县事件提出抗议,请其“严令制止”。

5日 国民党政府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从甘肃陇东到陕西宜川,构筑数段封锁线。

20日 国民党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23县划为5区。在甘肃陇东8县设2区:庆阳区辖庆阳、合水、镇原、环县;涇川区辖涇川、灵台、宁县、正宁。

是月 中共甘工委书记孙作宾调回延安,罗云鹏代理甘肃工委书记。以后,中共中央派李铁轮为书记,罗仍为副书记。

△ 国民党政府规定5月1日至7日为全国青年运动周。兰州市举行青年节约献金,共献3万余元,支援抗战。

△ 祁连山藏族群众组织慰劳抗日将士代表团,赴前方慰劳。

△ “生活书店天水支店”因销售进步书刊被国民党天水县党部查封。经理被捕。

6月

1日 甘肃省平市官钱局改组为甘肃省银行。资本800万元。

2日 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北方慰问团,由郭沫若、王右瑜为正副团长,来第八战区所辖各地进行慰问。

26日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决定,本年度国立各大学及独立学院统一招考新生。兰州为全国15处招生区之一。

29日 国民党政府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代表与八路军代表,在庆阳签署《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协议恢复镇原、宁县两县纠纷前之原状。

是月 国民党甘肃省府以日机不断轰炸兰州为由,决定将在兰州之中等学校紧急疏散至临洮、榆中二县。

△ 中共甘工委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组织整顿,到1939年底,共有党员143人,比原来减少45.8%。党员成分:工人占20%,农民占5%,知识分子占75%。这次整顿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在康生的直接策划下,把一些党员诬为“奸细分子”、“投机分子”,割断了关系,制造了一些冤案。

△ 国民党政府军统局在兰州开办训练班,内设情报、行动、边疆、电讯4个系。戴笠为班主任。

7月

1日 国民党政府将成吉思汗灵柩由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移来榆中县兴隆山。是日,国民党甘肃省府主席朱绍良等举行安灵祭奠。

△ 为控制言论,国民党甘肃省动员委员会宣布《甘肃省统一战时言论办法》。

是月 文化界著名人士老舍、赵丹、王为一、徐韫、史枚等先后来兰,进行抗日宣传。老舍作《两年来抗战中的文艺运动》的讲演。

8月

2日 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后改名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在兰州西果园成立。校长曾济宽。

15日 甘川公路兰州至通北口段修通,全长364公里。

31日 国民党甘肃省规定,各学校对于法定以外之开会,不得率领学生参加。

是月 国民党社会部决定成立“中统局陇东调查室”,专门搜集陇东解放区及边区各项情报。

△ 中共庆环分区第二次代表会召开。

9月

16日 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平凉市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有5名党员被捕。

是月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途经兰州赴苏联医治右臂骨伤,邓颖超、孙维世随行。周恩来向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部分负责人员作了国际形势等内容的重要讲话;会见了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民政厅长施奎龄等人,阐明共产党的抗日政策。

10月

是月 罗云鹏赴延安汇报甘肃党的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工委决定李铁轮任甘工委书记,并提出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秘密和公开分开的白区工作方针。

是月 国民党政府公布遴选甘肃省首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25人,候补参议员13人名单。以张维为议长,范振绪为副议长。

11月

是月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调查员刘守光调查马步青部队勒索甘肃人民情况,内称:“仅民乐一小县,驻军1营,每年征收给养14万元,而人民实际负担则在70万元以上。民勤县每年正常田赋不及10万元,而驻军横征达一百数十万元,保甲经费尤使人民痛苦不堪。苛政迫

使河西人民缺衣少食,离乡背井,田园荒芜,农村凋蔽。”

△ 中共甘工委决定开辟延安——兰州——河西地下交通线(第三国际交通线的一部分)。

12月

10日 陇东第二次摩擦事件发生。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率保安队3个中队、军士队在国民党政府军97师578团配合下,深夜突袭八路军驻军770团3营。3营损失严重,被迫突围出城。12日,国民党合水县长翟大勋率保安队160余人,袭击八路军驻合水警7团特务连。八路军奋起反击,进犯者大部缴械投诚。翟大勋被俘,合水解放。14日,国民党镇原县长孙宗濂率保安大队400多人和国民党政府军97师578团一部,向八路军770团2营发动进攻。16日,2营突围,镇原县城遂被国民党侵占。194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派谢觉哉到庆阳,同国民党当局谈判。“陇东事件”始暂告平息。

是月 西路军300余人从新疆赴延安途中,受阻于兰州十里店。经伍修权与国民党第八战区多次交涉,始得以放行。

是年

△ 新西兰友人艾黎、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和宋庆龄等14人发起成立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兰州、天水、平凉等地成立事务所。先后在兰州设立棉毛纺织、皮革、皮毛、缝纫、木器、陶器等30多个基层工业合作社。并在水、秦安、甘谷、徽县设立指导站,组织火柴、面粉、棉毛、造纸、油墨、印刷等工业合作社,对安置失业工人,支援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 甘肃省农业改进所在兰州成立。将西北畜牧场、省立第一农事试验场、沿黄造林办事处划归该所。并在各专、县区设立农业指导所。

△ 中国银行西安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兰州创设毛纺织厂、机器厂、制药厂、面粉厂。

△ 玉门老君庙油矿安装100千瓦柴油发电机3部。该矿电站到1949年9月解放时,共安装

柴油发电机 14 部、1340 千瓦 (实际出力约 500 千瓦)。是甘肃最早的企业自备电站。

民国 29 年(公元 1940 年)

1 月

1 日 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土匪赵思忠(赵老五),袭击环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及所辖洪德、虎洞 2 区。被抗日民主政府部队歼灭 40 余人。

15 日 由于国民党环县政府的策反,至 2 月 1 日,环县抗日民主政府所辖耿湾、车道、洪德、虎洞、环城区的自卫军相继叛变,先后有 5 个区、21 个乡政权遭破坏,4 所学校被毁,5 所合作社被抢,47 名干部被杀害,造成重大损失。

29 日 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与边区党委、政府决定,成立陇东分区,辖庆阳、合水、镇原 3 县。同时,成立陇东特区军政委员会,由马文瑞、王维舟、段德彰、耿飏、陈仁麒、马锡五、谢扶民 7 人组成,协调庆环、陇东两分区之大政问题。

是日 李铁轮到甘工委任职。工委结合甘肃实际,拟制了《甘肃目前形势与党的工作任务》等文件,提出加强秘密工作,巩固党的组织;注意群众性的统战工作,利用合法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加强农村工作;加强回民工作等四项基本任务。

△ 交通银行兰州分行成立。同时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兰州分处。

2 月

1 日 国民党政府天水行营举办西北青年劳动营,并在兰州设招待所。以解决就学、就业为名,阻止青年进入陕甘宁边区。

是月 周恩来由苏联回国途经兰州,同行的有日本的野坂参三和印度尼西亚的阿里亚汗等。

△ 国民党政府颁布“新县制”。甘肃省府制订《县各级组织纲要甘肃省施行细则》,以统一基层行政体制,加强基层统治。

△ 国民党甘肃省府成立兰州市区设计委员会。8 月改组为建设委员会,翌年 5 月,改为市

政筹备处。

△ 安炳基、尹世雄、黄云山联络近百农民,组成陇南游击总队,在甘谷县黄家磨武装暴动。因遭国民党地方部队围剿,半月后解散。

3 月

7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警卫 2 团,由团长周仁杰、政委甘渭汉指挥,捣毁赵老五在环县甜水堡姚儿井沟的匪巢。

30 日 兰州各界举行万人集会,愤怒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行,会后游行。

是月 国民党政府第八战区政治部和甘肃省府借口整顿甘宁青三省民众团体组织,排斥和破坏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被整顿的民众团体达 1103 个。并开始在兰州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 兰州造纸厂首次生产白报纸成功。

4 月

1 日 中共陇东分区特别委员会正式成立,马文瑞任书记。1943 年 1 月改称中共陇东地方委员会,段德彰任书记。

20 日 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庆阳正式成立,王维舟兼任专员。8 月 23 日,庆环分区合并于陇东分区,辖环县、曲子、庆阳、华池、镇原、合水 6 县抗日民主政府。庆环分区保安司令部更名为陇东分区保安司令部,吴岱峰任司令员。

△ 国民党甘肃省府拨款 70.5 万元,开采静宁县罐子峡煤矿。后因资金周转不灵,由静宁、会宁、庄浪、隆德 4 县商人集股,改为官商合办。

是月 西北羊毛改进处成立,总处初设岷县,后迁兰州。并在夏河、永昌等地设推广站。

5 月

14 日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率归国慰劳团到达兰州,开展慰问活动,受到兰州各界人士欢迎。25 日,陈嘉庚离兰经西安赴延安。

25 日 清水县国立十中师生为反贪污、反饥

饿,举行罢课,并走向社会。40余名代表到天水请愿未果。是日,1200余名学生徒步赴天水。行至天水七墩时,遭军警镇压,两人中弹身亡,学生被囚禁。3日后武装押返。6月9日,国民党当局又派军警包围学生,进行大逮捕,学生领袖邱水泉等6人被拘押。

是月 国民党甘肃省府重新厘定各县等级,全省辖县共分六等。计:一等5县、二等6县、三等22县,四等15县、五等16县,六等3县;肃北、卓尼2设治局不列等级。全省共辖67县,2设治局。

6月

6日 中共甘工委组织遭破坏。李铁轮、罗云鹏、惠光前、赵子明、樊桂英先后被捕。7月,甘工委暂由郑重远负责,罗扬实、吴治国协助工作。一些暴露的党员撤离兰州。甘肃地下党的工作处于抗日以来最困难时期。

△ 国民党甘肃省党部通令各校教职员必须加入国民党。

△ 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修建兰州电池支厂,有职工140人。1941年7月1日正式投产。年产日月牌A—B干电池约1.5万只。单节电池1.2万只。1945年8月停办。

7月

7日 庆阳“抗日阵亡烈士纪念馆”落成。1947年4月,国民党政府军胡宗南部侵占庆阳后被炸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建于烈士陵园内。

△ 兰州各界举行抗战建国三周年纪念大会,为抗战阵亡将士树立纪念碑。并举行“七七”献金运动,献金总额16万余元。

是月 陕甘宁边区银行陇东分行成立,并附设分店,代理金库。

9月

18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庆阳创办的陇东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为该校题词、书牌。学校设初中、师范、地方干部班、妇女班。为当时陇东解放区最高学府。

△ 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召开临时参议会,刘仲邻、段德彰被选为正、副议长。会议通过“三七”减租和豁免1939年底以前农民所欠地租的决定。

10月

15日 兰州各界举行反轰炸大会,并募款筹购“反轰炸”飞机。

28日 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为压制人民民主运动。重申各团体举行各项集会均须预先呈报。由该部派员“指导”。

是月 国民党“中统局”在泾川开办“甘肃省陇东党务调查人员训练班”。两期共训练特务182名。

11月

15日 国民党政府免去朱绍良甘肃省府主席职务,由谷正伦继任。12月6日,谷正伦兼任甘肃全省保安司令,甘肃军管区司令。

△ 国民党甘肃省府公布壮丁“纳金缓役办法”及“缴纳缓役金办法”。

12月

9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1941年度各分区、县党政军机关(不含保安部队)除粮食外,只发给3个月生活费作为生产资金,经费实行自给。

是月 苏联驻华武官、蒋介石总军事顾问崔可夫去重庆赴任途中到达兰州。

是年

△ 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在兰州建立西北医院,设病床80张,张查理任院长。西北医院为当时西北重要医疗单位和医学教育场地。



华池节日民俗

盖彩凤 姜琳娟



除夕 农历腊月三十(小月二十九)为除夕。此日清晨,全家人皆早起,整天都很忙碌。男人们洒扫庭院,张贴神像、符咒、钱马、对联,悬挂祖影,奉陈家谱,设置香案,摆献供品。所贴神像,有门神秦琼、敬德,灶神张奎等。所贴对联,灶龕两旁多用“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横额为“一家之主”;卧室炕(床)对面墙上贴“抬头见喜”或“对面生财”;老人们的炕墙上贴“老者安之”或“百病不生”;庄院门外贴“出门见喜”;院子里贴“满院春光”;粮囤上贴“粮食满仓”;畜圈贴“槽头兴旺”。各房(窑)门上的对联不甚统一,但一般选写三四幅对联,横额多为“辞旧迎新、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吉祥如意”等。旧时大多买红纸请人书写,现今多从街上购买印刷好的春联,十分方便。女人们主要在厨房蒸馒头、炸油货、煮肉、擀长面。女孩子剪贴窗花,换床单、被套,打扫房间、窑洞,帮助贴年画;小男孩跑前跑后,互相嬉戏、打闹、放鞭炮取乐。下午,家庭男性成员上祖坟,焚烧纸钱祭奠祖宗。

傍晚,点亮灯笼,鸣放鞭炮,由男性最长者洗手净面,主持敬神,点蜡、上香、烧表(黄纸)、叩拜,从灶神开始,门神、土地爷等全要敬到。敬过各神后,全家人吃一顿细长面,名为“拉魂面”,一般都吃得很少。入夜,城镇居民前往十字路口,面朝故乡,划个圆圈,为先人烧纸,口中念叨“爷爷、奶奶拾钱来,爸爸、妈妈拾钱来……”;农村人则在祖影、家谱香案前燃烛焚香、叩头祭拜。敬毕祖影,全家人按长幼依次叩拜行礼,称“辞岁”;家长给晚辈逐个散发“压岁钱”,亦称“押魂钱”。辞岁后,将各类吃食端上桌(旧时多在炕上),有暖锅,意为全家团圆,吃肉骨头,意为“啃鬼”。各种酒、菜、年糕、油货、核桃、花生、红枣、瓜子、苹果、橘子、香蕉、梨等,任由大人、小孩挑选,尽情吃喝。

除夕夜要点长明灯,全家人围坐一起,打牌、下棋、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等,通宵达旦,彻夜不眠,谓之“守岁”,亦称“坐夜”。现时以观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为主。新年钟声敲过之后,各家争相出门,点燃鞭炮、礼花,辞旧岁,迎新年。此时,所有城镇、乡村,鞭炮齐鸣;礼花升空,万紫千红,通天透亮,老少欢呼,山鸣谷应,除夕庆典达到

最高潮。之后,打牌的人们一直坚持到天亮,多数人便渐次进入除夕梦乡之中。

春节 正月初一,也叫“过年”。春节是汉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旧时,华池人大年初一讲究早起,近处有庙宇的必先到庙中敬神祈福。家家户户争烧头炉香,以求全年吉利。敬过庙神后,便在自家各处神位、祖宗牌位前上香焚表,叩头礼拜,鸣放鞭炮,迎接诸神归位。

春节早饭要吃得早。饭前,长者坐于炕上,子孙按辈分磕头作揖,谓之“拜年”。早饭以吃饺子为主,也有暖锅等其他美味佳肴。

早饭后,邻里互相拜问“年过得好”。小辈向邻居长者行礼叩头,也是春节“拜年”的一部分。拜年时相约群集出门,各家都用最好的酒菜招待。

破五 正月初五为破五,谐音“泼污”。古时,华池人从初一到初四不能乱倒脏水,这几天的垃圾、污水要积攒起来等到初五才倒出去,否则会冲犯初一接回的财神、灶神、春神等神灵。

破五又叫“五穷”,这日邻里之间不互相走动,防止把穷气带给人家。

人七 正月初七为“人七”。相传“人七”形成于西汉,《东方朔占经》解说,正月初一到初八每日各占一物: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人七”即“人日”。旧

时,华池人深信“占经”所云:“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阴则灾。”此日,如全天晴朗无风,则人人健康平安;如天气阴暗多风,则预示本年度人口有灾。若早晨阴暗有风,则孩童多灾;上午晦暗起风,则青年人多灾;中午阴暗,则中年人多灾;下午阴晦刮风,则老年人多疾患。华池人还将正月初七视为人的灵魂回家归窍之日。这天讲究亲戚邻居互不走动、串门,怕把灵魂丢在外边,或灵魂回家找不着主人,故有“七不出,八不入”之说。人七还禁放鞭炮,也不梳头,怕灵魂受到惊吓不能回家归窍。夜晚,点长明灯,敬献灶神。有的人家还为全家人叫魂,前面一人边敲碗边呼唤“××回来”,后面一人应“回来了”,从十字路口一直叫到灶神前结束。

元宵节 正月十五,是继春节之后又一盛大节日,亦称“上元节”、“灯节”。元宵节张灯始于东汉,盛于唐代。此习俗早已流传本县各地,历史悠久。元宵节早晚敬神及饭食的质量等,均不低于正月初一的规格,有“小初一,大十五”之说。这天,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门前高挂红灯,在各神位、各门口、畜圈、粮囤、碾磨盘等处点粘面灯或萝卜灯,屋内点长明灯。

元宵节闹秧歌、耍社火在华池十分盛行。早在根据地时期,华池“正月十五闹社火”就闻名遐迩。改革开放以来,从正月十四到十六,县直各单位及若干乡镇每年都要参与在县城举行的全县社火会演。正月十四和十六,各社火队分头串单位,给机关单位和老红军、老干部及少数个体户拜年、攘院。正月十五是社火队正式编队游行演出的日子。元宵节“饭后看社火”,已成为县城居民的习俗。元宵节之夜,县城火树银花,彩灯齐放,争奇斗艳,各呈异彩。各家各户扶老携幼,上街观灯,人山人海。各式各样的礼花,腾空而起,声震山川,光华四射,五彩缤纷,让游人目不暇接。同时还举办灯谜晚会、秦腔大戏、皮影戏、公演电影、说书等活动。元宵节这天,华池人还有全家出游的习俗,称之为“游百病”。这一古老的习俗,现已融入人休闲保健的新内容。

燎疖节 正月二十三为燎疖节。华池民间传说,“疖”是一种顽疾,只有用火烧才能祛其邪恶。旧时,华池人燎疖仪式特别隆重,常持续三日之久,正月二十一为迎疖日,二十二为正疖日,二十

三为送疖日。现在多于正月二十三日一天举行。人们将野外捡回的蒿草、树枝和过年时燃放鞭炮积攒的纸屑等,堆放庭院或院门之外,于夜幕降临时点燃,再拿出锅盖、箢篱、勺子、筷子及枕头、衣物等日常用品逐一在火上燎一燎,以驱除邪气,烧燎病菌。然后,全家大人小孩轮番从火堆上连跳三次,幼儿则由大人抱着跳过。待柴禾烧至将尽时,人们用木棒捶打火灰,边捶边说:“捶谷子哩,捶糜子哩!”最后,用铁锨将余灰扬起,观看火星形状,以卜来年收成。火星似麦花则麦成,似糜花则糜成。孩童们还将未燃尽的柴禾头,或者用土块粘上火星,欢跃着抛向空中,谓之“甩红眼”。正月二十三也是送神送祖的日子。此日晚上,各家各户焚香叩拜之后,便将祖影、家谱、香案等一切敬神祭祖的器物收拾起来,表示春节已经过完。

春龙节 农历二月初二,亦叫“龙抬头日”。在此前后,冬眠的小动物开始苏醒。农家最怕蝎子、蚰蜒等虫子。这天清晨,华池农村各家各户都要打扫炕头炕角,边扫边用棍子敲打,口中念道:“二月二,龙抬头,蝎子、蚰蜒不抬头,一棍打入地里头。”有的农户取南墙的黄土块在炕周围的墙壁上画圆圈,称之为“圈臭虫”。华池人还讲究这天不能担水,并于清晨折回桃树、柳树枝条,将桃柳条放在门楣上,用桃木削刻成小巧而精致的花棒槌,用柳木削成小刀,桃木棒,柳木刀均系上彩色丝线做成的穗子给小孩佩带,以驱鬼除邪。华池人多在二月初二剃头理发,寓意“龙抬头,人也抬头”。民间传说,此日理发,一年四季头脑清醒,身体健康。

长寿节 华池俗语:“三月三,擀长面。”传说三月初三为王母娘娘寿辰,故华池民间此日吃细长面以祈长寿。农历三月初三,本县多处逢庙会,故当地人还有“三月三逛庙会”的习俗。

清明节 清明节为当地祭祖、扫墓节。清明祭祖这一据传始于先秦的习俗,在华池民间流传已久,遍及城乡。这一天,不论穷富,都要到祖宗墓前焚香烧纸,敬献馒头、干果、水酒,有的则祭献全猪全羊。为祖宗树碑仪式也多在清明节举行。祖宗墓穴如有水毁、塌陷之处,也在此日取百步之外的黄土填实,叫“堰坟”。夜晚,城镇居民多在十字路口

为家乡的祖先划圈烧纸。

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也叫“端阳节”。华池有民歌唱道“五月里来五端阳,软糜粽子蘸蜂糖。”当地人过端午节,以食用软糜子(黄粘米)或糯米、红枣等蒸煮而成的粽子最为盛行。现今城镇和乡村农户以粽子互赠邻里,已渐成习俗。

端午节亦为华池农村卫生节之一。清晨,各家各户采回艾蒿,架于门窗之上,以避邪消毒;打扫院落、房屋,清除积垢。这天,成年人要饮雄黄酒,并给小孩的耳孔、鼻孔、肚脐、肛门等处涂抹雄黄,以防毒虫侵入。

端午节戴荷包,是华池最有特色的风俗。节前几天,巧手妇女们便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以绸缎、五彩丝线、香料等,精心制作各式各样的荷包,亦叫“香包”或“耍活”,以供自家儿童在端午节佩戴。近年来,许多农户还将荷包拿到市场销售,成为华池端午节一大景观。端午节清晨,家庭主妇又将用彩色线合成的花绳“续命绳”,拴在小孩的手腕、手指、脚踝、脚趾上,据说能保长命,但响雷时一定要解下来。

晒衣节 农历六月初六为晒衣节。华池民间俗谚云:“六月六,晒丝绸。”午间,各家各户将夏季不穿的绸、缎、皮、毛衣裳及床上被褥等拿到院中晾晒。传说这一天晒过的衣物一年不被虫蛀,且有益健康。

乞巧节 农历七月初七,亦称“七夕节”、“女儿节”。华池民间传说,七月初七为牛郎织女渡“鹊桥”相会之日。在华池民间,织女被尊为“巧娘娘”,是女孩子崇拜的偶像。七月初七之夜,姑娘们将事先在水中生好的豌豆嫩枝嫩叶,掐成小段抛浮水碗中,在灯光下观看影像,谁掐的花繁、影实、美丽,谁就乞得灵巧。是夜,姑娘们还于暗处比赛穿针,先穿上者为巧。“七夕乞巧”这一习俗近年来还被一些城乡男女青年赋予了东方“情人节”的含义。

荞麦节 相传农历七月十五为荞麦生日。其时正值荞麦盛花期,本县北部农民在这一天要到荞麦地头焚香、烧表,祈求五谷神消灾灭虫,保佑荞麦丰收。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亦称“团圆节”。华池

人对中秋节历来十分重视。当地农家素有自己蒸月饼的习俗,这天,各家各户的主妇们,先将起面擀成若干由大到小的薄饼(一般为单数),各层垫上芝麻、椒叶、食盐或冰糖、红枣、核桃仁、青红丝等做成的馅,捏上花边入笼蒸熟。是夜,当月亮升起时,各家在庭院摆设香案,供献月饼、西瓜、鲜果、猪头等多种食品。全家人围坐一起,边吃团圆饭,边赏中秋月,边谈天说地,尽享天伦之乐。“每逢佳节倍思亲”,华池人在赏月的同时,还要祈祷身在远方他乡的亲人吉祥平安。

现今市场出售的月饼种类繁多,形色各异,品味不同,价格差异较大。除了农家,华池城镇居民多到市场选择,购买自己喜欢的月饼过节,已很少有人自己蒸月饼了。

寒衣节 农历十月初一,亦是祭祖之日。

华池民歌所唱“十月里来十月一,家家户户送寒衣”,这天华池人都要上坟祭祖化纸钱,送寒衣,一些不能上坟祭祖的城镇居民则在天黑之后,于十字路口画个圈,烧化纸钱及各种彩纸糊成的衣帽鞋袜,给故去的亲人送去御寒衣物,让他们安度严冬。

腊八节 腊月初八为腊八节,这天华池民间早饭多用荞麦面粉、黄米、红豆、绿豆、黄豆、豌豆、核桃仁、杏仁等熬煮成一种混合饭,称“腊八粥”,在太阳升起之前食用。“腊八粥”除当天食用外,还要留一部分,以供此后多日掺着吃,即所谓“腊八腊八,要吃八天”。当地人用荞麦面捏成麻雀头状面疙瘩与粥煮在一起,称“吃雀头”。其中一颗或两颗面疙瘩中包有铜钱或分币,传说吃了雀头,来年麻雀就不会危害庄稼,谁若吃出包有铜钱或分币的雀头,谁就是有福之人。在华池,腊八节还有冻冰坨的习俗,即在前一夜,于水碗中加糖并放入一枚系线的铜钱,置于屋外,腊八早上观看,若哪一方冰面凸起,则预示来年哪一方庄稼丰收。观看之后,小孩子将线提起吮吃糖冰坨。

送灶节 腊月二十三,为华池民间又一个“卫生节”。从这天起,广义上的过年就开始了。远在外乡者即陆续回家。俗定本日打扫庭院,清除垃圾。农家要挖炕灰,扫窑顶,擦洗家里的坛坛罐罐、箱箱柜柜,拆洗被褥、衣物等,总称(下转第80页)

碧血丹心，矢志不渝

——追述丁益三炼狱生活始末

张德馨

丁益三，原名丁尚谦，1919年与同乡张一悟、张亚衡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和北京学生一起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参加演讲团和国货维持会，发通电，撒传单，上街讲演，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同学，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北京大学毕业后，丁益三去日本留学，1923年回兰州，创办了一座罐头加工坊，他的外号“丁罐头”由此得名。1926年丁益三先加入国民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14日被选为国民党甘肃临时党部执行委员之一。在此期间，丁益三积极宣传以“三大政策”为核心内容的新三民主义，随后又成为王孝锡、胡廷珍建立的“青年社”第一批社员。在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以兰州女子师范学校为集合地点，以兰州一中校刊为阵地，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向国民党右派展开尖锐、激烈的斗争。他还热情支持“藏民文化促进会”的工作，住在拉卜楞寺，帮助藏族同胞学习汉文、汉语，对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作了一定工作。

被捕入狱

1928年2月，国民党甘肃军法处查获了一封署名“杨秀英、杨瑞云妹收”的信件，检查人员便持怀疑态度撕开这封信，发现寄信人是共产党员杨和鑫，他是当时军法处通缉的要犯，军法处按信封

上收信人的地址逮捕了杨秀英和杨瑞云。

那年，杨秀英20岁，杨瑞云也只有17岁。面对军警们的种种提问，姊妹俩始终摇头，拒绝回答问题。军警们便将姊妹俩分别绑到柱子上，用皮鞭在脸上、身上狠劲抽打，打得她俩脸上鲜血直流，姊妹俩仍昂首挺胸，一字不吐。后来，气急败坏地军警们喊道：“扒光她俩的衣服，烧焦皮肤，看她俩说不说？”年幼的杨瑞云情急之下脱口而出：“去我家的有丁罐头……”。

其实军法处早就知道丁益三的一些情况，只是苦于没有真凭实据。这次得到杨瑞云的“口供”，便直奔罐头坊，抓捕了丁益三。

狱中受刑

军警们将丁益三逮捕入狱，反捆在长条凳子上，在胸部放一根木杠，在两端狠劲下压，这就是酷刑之一的“压杠子”。边压还边审问：“你什么时候入的共产党？你的领导人是谁？你在共产党里都干了些什么？”丁益三除了痛骂敌人，不吐丝毫秘密。敌人便以更猛的力量压下去，只听胸部沉闷地响了几下，三根肋骨便断了，丁益三晕了过去。敌人把丁益三从牢门口扔进了牢房。

第二天，军法处继续审问。他们将丁益三绑在一个特制的凳子上施刑，俗称“坐老虎凳”，用刑拷

问,丁益三咬紧牙关,不吐半字。敌人便在他的双足下垫块砖,青年学生丁益三哪能经受这般折磨,他又昏了过去。

第三天,军法处第三次审问,因为丁益三肋骨断了几根、腿部骨折,已被折磨的有气无力了,但他面对敌人的声声质问,仍一声不吭,只是摇头,拒不回答任何问题。敌人连续几天都没有问出一句“口供”,有点无计可施。军法处长咆哮道:“用红柳梢狠狠打,把脊背打烂。”士兵抱来一捆拇指般粗的红柳梢,把丁益三吊在屋梁上。军法处长亲自拿起红柳梢,在丁益三背上使劲的抽打起来,每抽一下,背上的皮肉上就会出现一道血印,鲜血顺着伤口流出……丁益三整个人便血肉模糊,不醒人事了,敌人又将丁益三扔进牢房。

第四天,丁益三从昏迷中苏醒,嘴唇干裂,胸中发烧,内伤外伤的剧痛,使他面色蜡黄眼冒金星,他想喝口水,但牢房中没有,只有不断的咽唾沫。同“号子”的难友们向看守要水,军警训斥说:“哪有水,撒泡尿喝去!”面对非人的境遇,丁益三以其顽强的毅力又一次活了过来。

接着,穷凶极恶的敌人又给丁益三灌辣椒水,这种酷刑是将弄碎的猪鬃拌上辣椒再用水调和后往犯人嘴里灌,灌了这种辣椒水的人,不死内脏也会坏掉,敌人见丁益三不能再打了,就点着整把子的香,拿通红的香头戳到丁益三脊背上,他脊背上的肉几乎被烧过了,连骨头都能看见。就这样,丁益三又一次昏迷了过去,清醒后,难友们都说他“不中了”。

敌人在这皮开肉绽骨头不软的铁汉子面前已是黔驴技穷,他们见从丁益三口中得不到任何口供,只得把他关押在狱中长达三年多。

狱中斗争

在狱中,丁益三虽遭受了百般酷刑,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却仍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他以顽强不屈的革命斗志和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鼓舞着狱中的革命同志。当时他被关在一间小小的牢

房里,屋子小得站不起睡不下,铺着潮湿的草,昼夜不见光线,初遭毒刑后,遍体鳞伤坐卧均感困难,但他坚持和一起被捕的20多名同志顽强的和敌人进行斗争,同难友们咬紧牙关进行绝食斗争。在他所在的牢狱中,没有一个人叛变革命。每当有革命同志被拉出去处决,他必整理衣冠,严肃以待,视死如归。为了鼓舞狱中同志团结斗争,他抄写了许多革命诗歌在难友中传递、吟颂,丁益三知道残酷无情的国民党反动派不会轻易放过他,心里作好了随时被敌人押赴刑场的准备。他和同志们用生命和鲜血诠释了共产党员,保护了党组织。

丁益三早年留学日本专攻农学,精通农艺、果树栽培、食品罐头加工等,归国后从事农业改进工作,曾任甘肃省农业改进所所长。作为学者,为了使自己多年所学和创办罐头加工坊的经验能够传给后人,造福社会,他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一丝不苟地写下了《农艺》书稿,丁益三还酷爱书法,至今人们仍然能够从他的遗作《农艺》中欣赏到他那功底扎实、风骨硬朗的书法风格。

丁益三同志在狱中所写的《农艺》和诗抄,是他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1952年,这些诗抄连同那件见证了烈士坚贞不屈精神的血衣一起由甘肃省文物保管委员会收存,后转至甘肃省博物馆。而遗作《农艺》在历经八十三年风雨之后,于2011年6月被榆中县党史办公室发掘并影印出版面世。《农艺》是丁益三烈士用毕生心血撰写的介绍食品制作技艺的专辑,它揭开了甘肃乃至西北地区现代食品工业制造的序幕,是甘肃食品工业制造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

流芳百世

1937年丁益三因狱中所留伤残复发逝世,遗体葬于榆中县丁官营村。2011年4月2日,榆中县人民政府批准,为丁益三在兴隆山烈士陵园立纪念碑,让烈士英灵在苍松翠柏间永驻。

(作者单位:榆中县委党史办)

历史上的真相难觅

中国的历史，有太多的扑朔迷离；中国的现实，有太多的扑朔迷离。然而，社会需要真相，公众需要真相。因为真相关乎正义，关乎公正，关乎社会文明。然而，把真相拿出给公众，留下给后人，又何其难哉！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翻卷着追求真相和制造假象两朵浪花。

造假：讳文化当是源头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语出《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这是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的原则和态度。这一态度是儒家“礼”文化的重要内容。

孔子的讳原则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讳莫如深，深则隐。”所谓尊者，就是那些有身份地位的人，他的丰功伟绩可以大讲特讲，而他们干过的不太体面的事或者坏事不能提，不能讲。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的缺点、错误、罪恶，成了碰不得的禁区。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会有性命之虞。

事实上，要“讳”的还不止这些，连“大人”们的名字都要“讳”。

唐太宗名字叫“李世民”，因此观世音便成了“观音”，史书中的“民”字便写成了“人”字。

好在历朝历代皇上只一人，虽造成许多麻烦，但还可忍受。只无奈，此风蔓延天下，为众多“大人”“尊者”们所效仿，造成许多古文令后人不知所云。

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俗语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本此。一个小小的郡守，一个芝麻

绿豆大的州官，居然如此威风八面，如此文化土壤能产生的“真相”，也只能是“官家”的“真相”。

据说，世间坚守真相者，首推文人。此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有些道理。但古代文人为贤者讳，把孔子的“丘”字，念成“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司马迁把《史记》中所有讳其父的“谈”字都去掉。可见，“讳”文化的根深蒂固。

由于“讳文化”在中国有着正宗的地位，遂给历史造假提供了合法依据，造成绵延不绝的假种流传，于是，真相扑朔迷离，追求真理的真诚被戕害，学术风气甚至做人原则都被毒化，贻害无穷。

名利：隐藏真相的动机

真相明明白白，说出来很容易，隐瞒真相，很难。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事件发生后，会选择隐瞒呢？无非是保官位、保名誉、保利益。

春秋时，齐庄公，姜姓，吕氏，名光。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后，便设计杀了庄公，立庄公的异母弟杵为君，是为景公。崔杼也自封为相国，飞扬跋扈，专断朝政。但他对弑君之罪十分惶恐，怕丢了高官厚禄，担心被史官记录于史，留下千古骂名。于是他下令将专管记载史事的太史伯找来，说道：“昏君已死，你就写他是患病而亡，如若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

齐太史伯不慌不忙地拿起竹简，提笔而书。书罢，他将竹简递给崔杼。崔杼接过竹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崔杼谋杀国君光。”崔杼大怒，命人杀了太史伯。

崔杼召来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说：“你要把我的话记入简册。”崔杼的双目透着杀气道：“就写：‘庄公以疟疾歿’。”

太史仲冷静地摊开竹简，依旧提笔写道：“崔杼谋杀国君光。”崔杼怒不可遏，又杀了太史仲。

“叫太史叔来！”崔杼怒气未消，又令人召太史伯的二弟进府。

“太史叔、太史季已在府门外等候召见。”侍者说。

太史伯家兄弟四人都是史官。仲被崔杼召走

后,叔、季二人知道仲不会将伪史写上简册,必死在崔杼刀下,于是一起来到左丞相府前等候崔杼的召见。

太史叔站到崔杼面前蔑视地问:“左丞相召我,是为庄公之事吗?”

“是,你想怎样写?”

“与兄同。”

崔杼被气得七窍生烟,咬牙切齿,把太史伯的三弟碎尸万段,令太史季补缺。

太史季把竹简摊开来递给崔杼,崔杼一看,依旧是那几个字,叹息一声,让太史季退下。

太史季在回史馆的路上,遇到史官南史氏持简匆匆赶来。

“季,崔杼弑君之事怎样了?”南史擦着额上的汗问。

“已记到简上了。”太史季打开简册说。

南史慨叹道:“我听说你们兄弟四人都被崔杼杀死,担心崔杼弑君之事无人记载,便匆忙地赶来。看来我已不用死了。”

由此,史书上便留下了:“周灵王二十四年,齐庄公六年,春三月乙亥,崔杼弑齐庄公于其府……”。

崔杼以残害史官的手段没能阻止真相留存于世,由此可见文人的气节。这一千古佳话其实恰恰证明了坚守真相的史官属凤毛麟角。

宋太祖似乎熟知此典。

宋太祖经常在皇宫的后园打鸟玩。一次,有几个臣子有急事求见,宋太祖虽在兴头上,但还是召见了。但召见之后,见他们上奏的都是些很普通的事情,于是很不高兴地问:“为什么用此等小事打扰于我?”

一个臣子回答说:“臣以为这些事情比打鸟更紧急。”

宋太祖更加生气了,顺手抄起斧子,用斧子柄打那个人的嘴,打掉了两颗牙齿。那个人慢慢弯下腰,把牙齿捡起来,放在怀里。

太祖大骂道:“你揣个牙齿,是想保留证据告我呀?”那个臣子回答说:“臣是不会告陛下的,但史官会把这件事情记下的。”宋太祖忽然大笑起来,

赐了那个大臣一些黄金锦帛安慰他。

“伏清白以死直。”(屈原《离骚》),不将伪史入册,敢于为正义献身,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美德。

理念:也能使事实失真

《左传·宣公二年》曰:“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这样的记载,显然与事实不符,然“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孔子何以对董狐“伪史入册”大加赞扬呢?因为,这样的记录符合当时政治道德的“真实”。

相关链接

董狐,春秋晋国太史,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灵公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作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这样的“假”,才是当时的“真”。

忠告:社会需要真相

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稳定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不计代价追求真相的社会。一个没有真相的社会,一定谣言丛生并且肆意蔓延,导致人心惶惶、无所适从。社会一旦失去公信力,国人便会失去安全感,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建设和谐社会,让真相明明白白是基础。

(摘自《党课》)

嘉峪关市市委书记郑亚军 专题调研市地方志工作

2012年4月16日上午,嘉峪关市市委书记郑亚军率领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梁洪涛,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毅及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行到市志办公室专题调研志编鉴工作。

在听取市志办公室主任杨生宝同志关于市志办公室基本情况、二轮修志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后,郑亚军书记指出:近年来,嘉峪关市修志工作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认真贯彻志书编纂的相关条例规定,加大工作力度,调动各方力量,特别是在人员少、任务量大的情况下,顺利推进二轮修志、年鉴编纂、大辞典编纂、古志校注、地情资料收集等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在讲到史志工作时,他特别强调史志工作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尊重历史、准确完整、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要能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

郑书记就充分发挥市志办公室的职能,做好地方志编修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要树立大局意识。地方志是记录人文历史、传承文化文明的重要载体,编修地方志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修志人员一定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始终站在全局和历史的高度,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和加快发展主题开展编修工作,全力做好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切实发挥地方志记载历史、传承文明、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二要树立精品意识。质量是志书的生命,要本着严肃认真、经世致用的积极态度,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做好修志工作,志书编纂要充分体现嘉峪关的水平。要实施精品战略,按照质量第一、服务发展的要求,大范围征求意见,严把审稿程序,切

实把精品意识贯穿于志书编修的全过程,不断提高修志水平,努力促进市志工作上水平、上台阶。市志办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提高志书编纂出版的质量,确保志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要严把志书编修的政治关、史实关、文字关,确保志书立场坚定、观点正确、内容翔实。要在“建名城、出精品、出名人”上做文章,加强对嘉峪关市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使历史资源成为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要加强历史文献信息的搜集和历史基础理论的研究,保证各类文献资料的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真正使志书成为嘉峪关的“百科全书”和文化精品工程。

三要树立责任意识。要遵循地方志编修的基本规律,时刻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扬“求实、创新、协作、奉献”的精神,加强学习、提升素质,不断增强地方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坚持求真存实、详略得当等修志工作原则,确保志书史料真实、客观公正。要认真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依法规范修志行为,细化具体措施,完善编修流程,提高编修质量,确保志书编修不出纰漏,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四要树立服务意识。要牢固树立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领导决策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意识,紧紧围绕形势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编纂地方志书,增强服务发展的主动性。要准确掌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密切关注各行各业发展的新变化,加强基础性研究,为全市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提供服务。要主动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积极作好资料征集、整理、编撰、研究等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历史资料。紧跟发展形势,使

志书编修工作更好地适应建设特色文化强市的需要,在推进文化旅游跨越发展、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中发挥资政作用。认真做好史志成果传播,开展史志资政咨询,强化史志资源开发利用,全面服务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五要树立创新意识。要紧密切合华夏文明传承、关城文化旅游景区建设,不断解放思想,树立创新意识,按照反映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的要求,深入研究地方志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推动地方志编修工作始终保持鲜明的地域特征。要创新志书内容,对各类资料进行认真梳理,做到点线面相结合,充分展示地域特色和文化品牌。要积极应用网络等现代科技手段,作好地方志

工作的开发利用工作,为读志用志提供新的载体和手段。要积极建设研究平台,通过外引内联等多种方式,吸引知名专家学者参与志书编修工作,使志书编修有深度、有创意,同时要积极宣传地方志出版成果,不断提升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要创新工作方式,不断挖掘整理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断拓宽工作空间,真正使市志工作有作为、有影响、有成效,为促进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嘉峪关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梁洪涛主持了工作汇报会,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毅参加了汇报会。部分参与修志编鉴工作的老同志围绕如何作好地方志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

天水市市县(区)综合年鉴编纂工作 多措并举、全面展开

2011年以来,天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年鉴编纂工作,市县地方志办公室建立健全机制,履行管理职责,1部市级综合年鉴、6部县级年鉴已出版发行,实现了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赢得了较好的声誉。

一、完善工作机制,依法编纂年鉴

2010年天水市地方志办公室组建后,就着手安排年鉴编纂工作,多次向市上领导汇报、协调解决年鉴编纂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下发了《中共天水市委 天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年鉴编纂工作的通知》,认真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进一步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年鉴编委会组织,地方志办公室实施,各县区、各部门、各单位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把年鉴编纂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整体工作,统筹谋划、统筹安排。明确分管领导,确定承办科室,指定专门人员,使年鉴编纂工作按计划、分步骤、有序进行。

二、采取有力措施,规范资料征集

一是年鉴工作纳入市政府地方志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年初市政府与县区政府、市直部门签订地方志工作目标责任书,年鉴编纂作为重要工作,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年底,市政府成立地方志目标管理责任考核领导小组,分管副市长为组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为副组长,由有关领导带队,分组考核7个县区和123个市直部门和驻市单位。进度快、质量高的予以表彰,进度慢、质量较低的指出问题,有力地督促年鉴资料的征集工作。二是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出台了《天水市地方志工作资料报送办法》,明确和规范了年鉴资料报送范围、形式、程序和要求。三是加大督查力度。组织调研督查组到市直单位了解年鉴编纂情况,采取以会代训的形式,及时召开了组稿会议;坚持年鉴编辑部工作制度,加强了年鉴组稿、编辑工作的进度,确保各编辑按时完成任务。四是县区采取了比较强硬的行政推促措施督促资料征集工作,把行政与业务工作有机结合,加快了进

度,提高了效率。

三、落实岗位责任,突出年鉴特色

天水市地方志办公室积极推行地方志业务项目牵头负责制和科室岗位责任制,靠实责任,有力地调动单位职工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形成干事创业的工作局面。比较早地提出了《天水年鉴(2011)》编纂框架设计方案和编纂提纲。2011年年初及时成立年鉴编辑部,确定了主编、副主编、责任编辑的职责任务和经费支配自主权等,起草编辑部工作方案,明确了任务分工。形成了强有力的组织管理,资料组稿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完成,经过夜以继日的编辑,形成了初稿。10月中旬总纂基本完成后,报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省史志办审定,天水市统计局核对有关数据。年鉴编辑部按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省史志办提出的修改意见,反复修改,编辑成书,年底正式出版发行。《天水年鉴(2011)》区域特色和年度特色突出,在公益彩页中设置城市名片、数字天水、天水市歌—天河热土,分类设置“工业强市”、“农业稳市”、“商贸活市”、“旅游富市”、“科教兴市”等栏目,突出反映了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五大发展战略。专设“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反映了天水的区域特色。正文专

设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麦积山风景管理区等年度特色分目,全面反映了2010年天水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晋升为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升级为天水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麦积山风景管理区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等情况。

四、加大审稿力度,确保年鉴质量

年鉴编纂的质量是年鉴的生命。因此,天水市坚持“三审制”和校对制。一是以市政府办公室文件下发了《关于印发天水市地方志审稿验收实施方案的通知》,进一步规范了年鉴的审稿程序,明确了审稿人员的职责。二是天水年鉴编辑部主编、副主编、责任编辑对年鉴稿反复审核,以严肃的态度,严谨的编辑作风,认真核对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标点符号,精益求精、注重质量。三是积极指导县区年鉴编纂出版工作。经常督促县区年鉴的编辑进度,多次与县区志办主任沟通交流年鉴编辑的新经验和新思想,上下互动、共同努力,及时审定县区年鉴终审稿。分别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审稿意见,各县区予以采纳和借鉴。《武山年鉴》、《清水年鉴》、《甘谷年鉴》、《秦安年鉴》、《麦积年鉴》、《秦州年鉴》2011卷已出版发行。

(上接第73页)

“扫舍”。晚间要在灶前焚烧香表,敬献糖果,送灶神上天,送灶神,尤以奉献粘性很强的米糖为主,据说灶神的嘴被米糖粘住,上到天上就不会说人间的坏话了。

扫尘节 腊月二十四为扫尘节。各家各户继续清洗家具,拆洗被褥,扫除尘垢,迎接新春,所以,华池人把这天也叫做“扫尘日”。华池民谚说:“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元旦 “元旦”最早始于三皇五帝。古代,元旦即农历正月初一。华池民间过“元旦”,即为春节。唐

代房玄龄等所撰《晋书》载:“颛帝以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朔旦立春。”即农历正月为“元”,初一为“旦”。古代把日月相会叫“朔”,这天就是“朔旦”。为别于其他月份,后人便将元月的“朔旦”改称“元旦”。

辛亥革命后,公历1月1日为元旦,华池民间称之为“阳历年”。每逢元旦,本县机关单位张灯结彩,互相慰问。公职人员法定放假一日,城镇居民家庭多聚餐。青少年在元旦之前,多购买贺卡相互赠送。是日,青年职工多婚嫁。

(作者单位:华池县地方志办公室)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李虎深入甘谷县 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调研活动

5月11日，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李虎和副主任车安宁带领有关处室同志，深入到联村联户、为民富民的联系点，甘谷县大庄乡杨家坡村进行调研，并与乡村两级干部座谈，共商帮扶措施。在杨家坡村村委会，李虎一行和乡镇、村干部进行了座谈，具体了解了村上的基本情况、存在的实际困难以及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等。通过与乡镇、村干部的座谈交流，了



解乡情、民情，摸清制约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全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探讨交流致富产业新思路。随后李虎一行深入联系户李双全、李爱红和李智杰家中，与联系户促膝谈心、拉家常、看实情、谈发展，积极向群众宣讲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具体内容和措施方法。详细了解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户养殖种植情况、子女上学工作、就医养老等情况，认真听取村民的意见建议。

李虎表示，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是省委的一项重要决策，是一项民心工程、德政工程，



要因制宜、因户施策。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将根据杨家坡村的实际情况，找准制约贫困户脱贫致富的难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方案，派出干部驻村蹲点，一定让杨家村的群众早日脱贫，走上致富奔小康的路子。

调研期间，李虎一行还在甘谷县地方志办公室进行了调研指导。

阎万贵 油画作品赏析

阎万贵，男，甘肃庆阳人。甘肃省农牧厅正处级干部，高级工程师。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油画尤擅风景，国画见长于花鸟画。曾多次获得有关方面奖励。部分作品被国内外单位或个人收藏。

